

2925
2nd set.

12610

歷史教學

6
1958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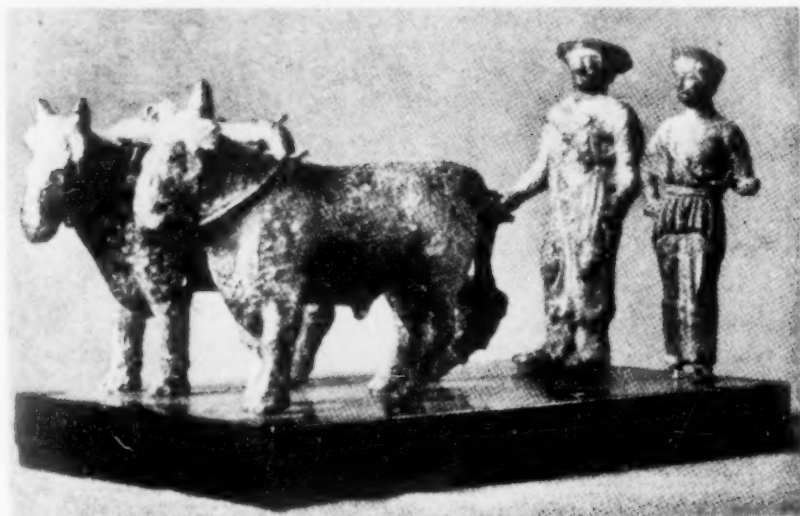
1

23 JAN 1958

1958

世界歷史參考圖片 (二十四)

古代羅馬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說明

圖一 伊特魯里亞的農民（公元前六世紀銅像）。兩農民驅使牛犍耕犁，進行耕種。犁系木制，具有鐵鋒。采自羅斯托采夫：“古代世界史”第二冊，頁28。

圖二 羅馬共和國初期的戰士（公元前四世紀）。兩個戰士披甲戴盔，全副武裝，共同抱持着一個陣亡的戰友。采自羅斯托采夫：“古代世界史”第二冊，封面后插圖。

圖三 羅馬古廟（公元前一世紀）。此建築今仍存在，在羅馬城台伯河畔。采自羅斯托采夫：“古代世界史”第二冊，頁96。

圖四 古羅馬的凱旋門（公元后一世紀）。古羅馬人好修建此種堂皇富麗的拱門來紀念軍事勝利或其他大事。此門在今法國南部，尚很完整。采自羅斯托采夫：“古代世界史”第二冊，頁278。



社 論

在偉大的革命宣言鼓舞下勝利前進..... (2)

理 論 學 習

关于“共产党宣言”一書的介紹提要..... 范若愚 (6)

× × × × × ×

印度的起義..... 卡爾·馬克思 (16)

卡爾·馬克思“印度的起義”一文的讀后記..... Л.С.加馬猶洛夫 (18)

教 學 參 考

关于甘肅远古文化的一些新論据..... 安志敏 (20)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清政府的洋务运动..... 王仁忱 (24)

一九二五年的广东战争..... 顧 林 (32)

日俄战争的发生、原因和性質..... Н.И.普羅科賓科 (37)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选輯(五)..... 耿淡如 黃瑞章 譯注 (41)

教 學 問 題

关于历史課貫徹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問題..... 湖北省教育厅教研室历史組 (45)

在历史課中进行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体会..... 湖南長沙四中历史教研組 (50)

我們搜集和运用乡土历史材料的点滴收获..... 浙江黃岩中学历史教研組 (52)

× × × × × ×

圖 片 中国历史参考圖片(三十七)、世界历史参考圖片(二十四)..... (封底里、封底; 封里)

問 題 解 答

1. 北德意志联邦究竟成立在1866年还是1867年?..... 暢 (53)

2. 普魯士在德意志帝国中的領導地位表現在哪些方面?..... 如 (53)

历史教學

• 月 刊 •

一九五八年一月号

(总第85期)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历史教學月刊
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天津市报刊推广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訂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印刷者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

定价每册 0.30元

预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0.90元

半年六期 1.80元

全年十二期 3.60元

本期印数1—30,600



在偉大的革命宣言鼓舞下胜利前进

为庆祝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齐集苏联首都莫斯科。他們在参加庆祝典礼之后，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們首先举行了会议，通过了一项宣言；随后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們又举行了会议，通过了一项和平宣言。这两个宣言是偉大的团结和革命的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发表，是当前世界政治中的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两个宣言，是繼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和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发表的宣言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三次共产党宣言。

在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里，首先指出当前世界历史的特点是“由俄国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始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过渡現在已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并且到目前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又已經强过于帝国主义体系。毛主席向中国留苏的学生講話时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轉折点，兩个人造衛星上了天，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轉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毛主席又说：“社会主义陣营和资本主义陣营之間的斗争不是西風压倒东風，就是东風压倒西風。現在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將近十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爭取独立或者爭取完全独立以及帶有中立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陣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們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現在不是西風压倒东風，而是东風压倒西風。”可以这样说：人类历史已經到了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的轉折点，人类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可完全結束了。

我們回顾一下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会看到历史发展的步伐是如此地符合于馬克思主义科学所指示的方向。当着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发表“共产党宣言”时，有的人还認為共产主义是个“怪影”，或者还仅只是一种理想。經過六十年后，尽管共产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敌人用各种陰謀詭計反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但在1917年終於发生了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标志了人类历史社会主义新紀元的开始，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新社会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了现实。尽管世界帝国主义瘋狂仇視世界上誕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直想絞杀它，但它冲破了敌人的反对和干涉，克服了前进途中的种种困难，經過反法西斯的世界第二次战争的严重考驗，証明它确实是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大战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偉大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社会主义陣营进一步强大了，这是人类历史一个重大的轉折点，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削弱了，社会主义力量强大了。到目前又躍进了一个新的轉折点，那就是“东風压倒西風”的时代。十月革命以后的四十年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表明，共产主义运动是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帝国主义旧世界冲击，已經在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土地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了。共产党的組織已

2

經几乎普遍了全世界，共产党员的人数从共产国际成立时的二、三百万人发展到现在的三千三百万人了。这是一支偉大的不可战胜的共产主义大軍，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成为百战百胜的物質力量了。这种历史事实表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全世界人民來說，共产主义已是人心归向，帝国主义則是“时日曷喪”了。帝国主义的內部分崩离析，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已經到了死亡的末日了。

这种世界历史进程表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已經来临了，我們不能不对共产主义这样偉大的胜利而欢呼，不能不受这新的历史轉折点鼓舞而奋勇前进！

我們知道，历史上的私有制、階級剝削和压迫是人們貧困和痛苦的根源，无穷无尽的战争也起因于私有制的階級社会。历史上曾有多少人咀咒这种階級社会，憧憬未来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但他們找不到达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道路，只有馬克思主义誕生以后，才給人类指出通向共产主义大同世界的科学的道路。到今天共产主义已經成为当代的实际，階級社会已經面临最后的寿終正寢的結局，人类將真正进入一个无階級、无剝削、无压迫的極乐世界，人类將真正进入一个偉大的共产主义时代了，这是怎样一个偉大的历史变革啊！

在社会主义力量大过帝国主义力量、东風压倒西風的当前世界形势下，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又发表了和平宣言。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有足够的力量还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武装进犯，但社会主义是一面和平的旗帜，在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起，即“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和平的口号，并始終忠实于它”。現在，社会主义力量是优于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已經摆脱了帝国主义体系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兴起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和平的要求，圍繞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一核心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和平陣綫，这就表明我們更有力量堵塞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缺口。和平宣言号召我們：“只有一切珍視和平的人們一致努力，提高对战争挑撥者的陰謀的警惕，并徹底了解到要更加努力保衛还处在威胁之下的和平是自己的神聖职责，和平才能够保持住。”我国人民已經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我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我們需要世界和平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对保衛世界和平还負有重大的責任，因此，我們必須加速我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进程。在十五年内我国工業水平超过英国，苏联工農業生产水平按人口平均超过美国，那时世界面貌將要更为改观了。

×

×

×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會議宣言和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对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团結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宣言中指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之間以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相互关系的基础，是为生活所考驗过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是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在这种原則指导之下，要求世界各国劳动者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以支持，是符合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在这种原則指导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除了平等相待、互相尊重以外，还需要遵守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精神，互相团結，互相帮助，而且大家都要承認以苏联为首的陣营，社会主义各国都要以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結合的精神教育各国的人民。同时在宣言里又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設的經驗概括成为共同的規律，并指出这些共同規律适用于走上社会主义的各个国家。尽管各国家有它的民族的历史的傳統和特点，应予以重視，但这些共同的規律普遍地起着作用。这样就避免了修正主义的影响。用这些原則和精神，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牢不可破的团

結，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将开辟一个新阶段。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即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因为资产阶级是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要想冲破资产阶级陣綫，也需要联合起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曾說到：“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只在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底斗争中，他們始終特別重視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斗争所經歷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他們始終代表着整个运动底利益。”这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的原则。馬克思亲自于1866年創立了第一国际，开始了国际共产主义組織的联合；第二国际在沒有背叛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場以前扩大了国际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共产国际成立，标志了无产阶级的国际組織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了。到今天社会主义已經成为世界体系，共产党的組織已經普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队伍更加扩大了，而共产主义的国际团结达到空前的高度，这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一步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証。

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間的团结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明确以苏联为中心的团结作用，这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毛主席对中国留苏学生說：“帝国主义力量有个头，就是美国；我們社会主义陣营也必須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如果沒有头，力量就会削弱。”而苏联在社会主义陣营中也确有資格当一个头，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經歷过严重的考驗，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經驗和建設經驗，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也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利益的。

共产主义的事業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業，宣言总结了近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提到空前未有的自觉的高度，对于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胜利具有極其偉大的意义。我們再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說过的一句话：“讓那些統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

×

×

×

宣言又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結合的原则，作了扼要的闡述。宣言指出：“列宁曾經多次告誡，必須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視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脫离生活，脫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業遭受損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脫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業遭受損失。”这就明确地指出来在革命理論陣綫上要展开兩条战綫的斗争，也就是說，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在革命理論陣綫上展开兩条战綫的斗争，就必须掌握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即辨証唯物論。宣言又特別指出，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展开理論战綫上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宣言还指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須注意到在目前条件下，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險。宣言并分析了修正主义的阶级实質和它的历史根源，列举了目前修正主义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論点，这就使人們对修正主义提高警惕，不使它魚目混珠、損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潔。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义从誕生之日起就是批判的战斗的革命学說。从“共产党宣言”起就对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别进行了批判。从1848年无产阶级开始革命斗争到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经过这一个革命的風暴时期，正如列宁在“馬克思学說底历史命运”一文中所說的，“馬克思以

前的社会主义死亡下去”了，这就是說，馬克思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是經不起阶级斗争考驗的，这也就同时証明了批判的战斗的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从1872年到1904年是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取得了全胜的时期，列宁在同一文章中說：“历史底辯証律是这样：馬克思主义在理論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也換上一套馬克思主义者的衣衫。內臟腐朽了的自由派，企圖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們把准备力量去进行偉大战斗的时期解釋成放弃这种斗争。”这就是說在馬克思主义胜利发展途中，必須与歪曲和反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才能爭取自己的进展。馬克思主义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已經証明了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已經把历史上各色各样的反馬克思主义理論摔到历史发展的后边了。今天世界共产主义取得了如此的輝煌胜利，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成为百战百胜的学說，目前的修正主义也必将像过去修正主义一样，在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的斗争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被历史的进程所否定。

此外，在宣言中也論述了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两种形式和在今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統一战綫的理論，并指出已經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各个国家必須进一步地依靠人民群众，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揚人民群众在建設社会主义事業中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也都具有理論和实际的重要意义。

×

×

×

我們国家經過反右派的斗争，已經取得了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我們目前又正进行整風运动中的第三阶段，以整頓作風和改进工作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速社会主义建設的步伐，以便能够在十年或十五年内，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業并举的方針，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業和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我国人民当前的任务。

我們历史教学工作，正面临着世界历史一个新的轉折点和我国全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时候，我們对这种国内外局势應該有更深刻的認識。我們應該認真學習这两个偉大的宣言。这两个宣言對我們講授历史发展客觀規律是具有極大的鼓舞和现实意义的。不仅在世界近代現代史和中国近代現代史的教学中可以結合两个宣言中所启发和指示的方向对青年学生进行生动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而且在整个历史課程中，都可以結合进行生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教育和人类社会走上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阶级社会行將結束的教育，这无疑將启发青年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觀規律及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論，对爭取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爭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会增强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將起着理論一掌握群众就变成物質力量的作用。本着“教育人的人必須先受教育”的指示，我們也應該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宁主义，站穩工人阶级立場，努力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具有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工人阶级知識分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科学去教育青年一代。我們在历史教学工作中應該努力以劳动創造世界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人民群众創造历史的观点教育青年一代。我們要通过历史教学，把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知識和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这是我們偉大而光榮的历史任务。

讓我們大家共同在偉大的革命宣言鼓舞下胜利前进吧！

理论学习

关于“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介绍提要

范若愚

195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一百一十周年。在一百一十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里用天才透徹的笔調叙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一百一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胜利发展的历史，燦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学习“共产党宣言”这一偉大的著作，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特别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对于我们提高自己的認識并加强历史課教学的思想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帮助历史教师学习“共产党宣言”，我們特刊出范若愚同志的这篇文章，供大家学习时参考。

这篇文章原是范若愚同志的一个講稿，我刊发表时作者曾做了若干修改和补充。

——編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綱領性的文件。一百多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經驗，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四十年以来的經驗，証明“宣言”中的基本原理至今仍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列宁所說：“这本书篇幅虽小，但价值却不亚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的全体有組織的奋斗的无产阶级。”（“論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51頁）

当前，我国正以全民大辯論的形式进行着政治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这个时候，“宣言”这本书是更有必要被人一讀再讀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开宗明义的著作，无论对于徹底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无论对于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也无论对于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都会有很大益处的。

一 在“宣言”的几篇序文里应该注意到的几个問題

马克思和恩格斯給“共产党宣言”的各国版本先后写了七篇序文，現在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宣言”里一一都有。学习“宣言”的时候，这几篇序文也是不可不讀的。

我們且不从一般意义上詳述这几篇序文如何重要，而只从有助于我們学习“宣言”的意义上，略說

一說讀这几篇序文有什么好处：

第一，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們指出了“宣言”这一文件的性質。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和1888年的英文版序里都曾指出，“宣言”是当时国际工人組織的一个“周詳的理論和实践的党綱”，是全世界工人“公認的共同綱領”。如果我们注意到序文所指出的“宣言”的这种性質，就可以知道“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宣言”是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綱，是理論与实践相結合的典型，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完整的、有系統的闡述^①。我們注意到“宣言”的这些特点，也就可以知道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著作，对于想着比較系統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是如何的必要了。

第二，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們指出了“宣言”的任务。在“宣言”的1882年俄文版序里指出：“共产党宣言底任务是宣告現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行將灭亡。”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要胜利的意思，正如“宣言”第一章結尾所說，“资产阶级底灭亡和无产阶级底胜

^① 列宁說：“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說，是在1844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而于1848年出版問世的共产党宣言，已給了这学說一个完整的，有系統的，至今还是最好的闡述。”（“論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70頁）

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宣言”的任务是宣告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那么，我们学习“宣言”的主要目的，也就在于要弄明白为什么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

第三，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指出了“宣言”的基本思想。在“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和1888年英文版序中都会指出：“宣言中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从此发生的社会结构，便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自从原始公共土地占有制解体时起）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即社会发展各阶段上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被支配阶级与统治阶级间斗争底历史；在这个斗争现今所达到的阶段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为要摆脱掉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已非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以及阶级斗争不可了。”序文所指出的“宣言”的基本思想，正如人们常说的“像一条红线一样”地贯穿在“宣言”全书里。后来，列宁论及“宣言”这一著作时写道：“在这部著作里用天才透徹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有社会生活在内的徹底唯物论，作为最完备最精深发展观的辩证法，论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全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17页）如果我们注意到序文所指出的“宣言”的基本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准确地理解“宣言”所说的一切。

第四，在这些序文里，“宣言”的作者们指出了正确对待“宣言”的态度。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里，“宣言”的作者们一方面指出：“虽然最近二十五年来的实际情形已有过重大的变更，但本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至今还是完全正确”；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基本原理在实际方面的运用，正如宣言本身所说，是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宣言”的作者们要求人们对待“宣言”所必须有的这种态度，也正是我们学习“宣言”所必须有的态度。现在，“宣言”虽然已经历了一百一十年的时间，实际情形已有了更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有理由认为：“宣言中所发挥的基本原理整个说来至今还是完全正确。”当然，在实际运用这些基本原理的时候，必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本身所要求的那样，“随时随地都要依现存历史条件为转移”。如果忽视了各个民族的具体历史条件的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革命事业遭受损失。

二 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说明了什么？

“宣言”在开头的几行短短的引言里，首先露露一声地说：“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①这句在当时甚至现今还有人觉得是一句

① 了解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这一术语，要注意恩格斯在“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中以下的一段话：

“然而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终究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间以社会主义者见称的有两种人：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并且他们都已经变成了不过是些渐渐死灭的宗派；另一方面便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他们都答应要用各种补缀办法来医治一切社会病症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士大夫’阶级请求援助。至于当时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却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种共产主义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但它却探索着最主要之点，因此它在工人阶级中间竟是充分有力，终能创立出一种空想的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底共产主义，在德国有机特林底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间，社会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是在大陆方面——乃是一种‘讲体面的’东西，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底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就丝毫没有怀疑究竟应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我们后来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从这段话里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是要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非工人阶级的所谓社会主义严格区别开的，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所以“宣言”选择了共产主义这个名称；第二，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以外，还包括了当时“还是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后一种共产主义虽然是空想的，

“但它却探索着最主要之点”，它是代表着“工人阶级中那些确信单纯政治变革全然不够而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分子”的思想，由于这种空想的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因而也被资产阶级看作是“怪影”而遭到迫害。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中，曾叙述了资产阶级对于这种空想的共产主义的迫害，并指出：

“这一迫害根本没有消灭共产主义，反倒给它带来了好处，它使所有操德语的国家对它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以前在德国几乎谁都不知道的共产主义，由于这些事件，在那里却成了众目所瞩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第588页）

“駭人听闻”的話，其实是形象化地說明了“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宣言”发表的前夕，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已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日益尖锐，工人运动已经日益发展，因而共产主义的思想已开始传播起来。在旧社会的统治者看来，以前的一切什么什么“主义”，都没有这个共产主义更可怕。还在1843年恩格斯就写道：“德国的君主和执政者就在认为共和运动已被永远镇压下去的时候，发现从政治运动的灰燼中間又冒出了一个共产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新学说比那个似乎已被击溃因而曾使他们欢欣鼓舞的学说还更危险、更可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文版，第590页）因此，一提起共产主义来，就使剥削阶级“谈虎色变”。只要看看旧统治者——上自皇帝，下至警察，所有文官武将、宗教政党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张惶失措的样子，就可知道他们对共产主义害怕到何种程度。他们由于害怕共产主义，因而制造出了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用种种罪名来迫害共产主义者。在1845年，维尔特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是那些受尽一切诽谤的‘罪恶的共产主义者’之中的一个，这些人的唯一罪状就是因为他們维护那些颠连无告的、被压迫的人，而且准备为此进行殊死的斗争。让那些私有者老爷们惶恐不安吧：人民的强大巨掌是在我们这方面，各国的先进思想家日益转到我们的阵营中来了。在这些先进的思想家中间有我热爱的朋友——从巴门来的恩格斯。他写过一本维护英国工人的书，完全公正地严厉斥责了工厂主……我认为恩格斯是一个真正杰出的人物，他有着非凡的敏銳的智慧；他非常紧张地、不倦地为工人阶级的幸福而斗争着。”（见康捷尔著：“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9页）由此可知，所谓“共产主义底怪影”，乃是反映了反动势力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他们为了迫害共产主义者而制造的神话。一种刚刚露头的、当时还只拥有人数尚少的信仰者的共产主义，竟使反动势力害怕成那般样子，这就说明了“共产主义已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是一种势力了”。“宣言”的引言并没有从正面去说共产主义怎样有力量，而只是通过反动势力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情况，生动地反映出共产主义的力量来。

然而，仅仅使人知道共产主义已被各种势力公认为是一种势力，这还不够的，还必须使人了解共产主义这一势力的真相。这一方面是由于共产主义被所谓怪影的神话所诬蔑、所歪曲；另一方面又是由于当时宣传共产主义的人①还有许多极其模糊的观念。恩

格斯在1844年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曾逗留科伦三天，而为我們所展开的巨大宣传所吃惊。同志们都很活动，但缺乏一种应有的后盾是很明显的。如果不就向来的观点和以往的历史，写几本书，将诸种原则加以逻辑地和历史地发挥，并作为这种历史必然的继续，那一切都将陷在半昏迷状态中，而最大多数的人仍会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3页）因此，共产党人就必須向全世界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和意图，这样，就产生了“共产党宣言”。“宣言”驳斥了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也回答了当时共产主义者所提出的许多根本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令人可笑的是，現今的一位修正主义者主张无原则地施行“仁政”，提出一种什么“人道社会主义”来，这位“人道社会主义”者写道：“一个怪影最低限度在东欧游荡着——人道社会主义的怪影。”我們知道，“共产主义的怪影”原来并不是怪影，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的产物，而“人道社会主义的怪影”，倒真正是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滑稽可笑的怪影。

三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論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論

“宣言”第一章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敌对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其斗争之前，首先指出了从原始公社解体后的社会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論是找寻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一条基本线索②，“宣言”就是以这条基本线索，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行将灭亡的规律的。

① 从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几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当时共产主义宣传的一些情形。1844年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说：“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页）“无论到哪里，总碰得到共产主义者。”（同上，第5页）1845年，恩格斯又写信告诉马克思说：“易北菲尔这里有奇迹出现。我們昨天在本城第一等旅館最大的餐厅开第三次共产主义者会议。第一次有四十人参加，第二次有一百三十人参加，第三次至少有兩百人参加。整个易北菲尔和巴门，上自金錢貴族，下至小商人，都有人出席，只有无产阶级除外。”（同上书，第18页）又，列宁曾說过：“当时共产主义底主要宣传者，……就是善心好意的资产者，多少有点愤恨政府的人。”（《論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59页）

② 列宁說：“马克思主义給我們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使我們能在这种仿佛迷乱混沌的状态中找出一种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論。”（《論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26页）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不仅仅在于承认社会划分为阶级和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主要贡献，是在于它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特点^①。先前各个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掉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而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要根本消灭阶级、消灭压迫条件、消灭阶级斗争的。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说明：阶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是随着人们的愿望在什么时候制造就可以制造出来，也不是随着人们的心愿想在什么时候废除就可以废除的。在原始公社时代，由于当时人类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还没有剩余产品出现，因而那时也就没有阶级，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分工、交换和私有财产的出现，于是就出现了阶级。“当社会劳动的生产总量用来供应社会全体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难得有所剩余的时候，当劳动差不多占据着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全部或差不多全部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这个社会必然分成各个阶级。”

（恩格斯：“反杜林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6页）可是，当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废除阶级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然。因此，阶级的出现，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但不是永远的现象。“宣言”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分析中，得出了和先前各个历史时代的阶级斗争的不同结论，这场阶级斗争的最终结局乃是消灭阶级、消灭阶级斗争。“宣言”首先提出“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正是要说明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之后，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开始了。“宣言”首先扼要地叙述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阶级情况，正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和以往社会里的阶级的不同情况。“宣言”首先指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结局，正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以往不同的结局。因此，从“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开始，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两大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点的分析，经过对这两个阶级间斗争的分析，达到了“代替那存在有阶级以及阶级对立性的资产阶级旧社会而起的，将是一个以各人自由发展为大家自由发展条件的协会”的结论，这就是“宣言”关于阶级斗争论的邏輯。

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当阶级还没有消

灭的时候，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熄灭。当前，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在继续着，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在进行着，而右派分子却说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了，他们想用这种说法来欺蒙那些阶级斗争观念淡薄了的人，企图达到他们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揭破右派分子的阴谋，必须教育广大人民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都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才能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

四 从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看出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

一个从中世纪农奴中间产生出来的受压迫的城市居民等级，怎么会一步一步地爬到近代社会的统治者的地位呢？“宣言”在第一章里揭破了这个谜。原来，“不可一世”的资产阶级，乃是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封建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复适合于业已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着生产。它们已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不免要被打破，而它们果然被打破了”。资产阶级正是依靠了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成家立业”的。“宣言”科学地总结了资产阶级的过去，就科学地预见到资产阶级的未来，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终于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规律，对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一视同仁”地起作用的，所以生产力反叛生产关系的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演出了。“宣言”说：“为了证明这点，只要指出周期重复

① 马克思在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至于谈到我呢，那末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52页）

发生而愈益凶猛地危及全部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这是因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不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底发展；恰恰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在阻碍着生产力底发展”。于是，“先前资产阶级用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种武器，现在却对准着资产阶级自身了”。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合乎规律地一定要被打破。目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国家里经济上暂时还保持着比较景气的现象，因而助长了资本主义国家部分工人中的改良主义的幻想，以为资本主义不再有危机了。但是，应当知道，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暂时的景气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军备竞赛和其它暂时因素的不巩固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避免新的、深刻的震动和危机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是动荡不稳的，在帝国主义各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尖锐化了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所处的境地，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他们摆脱灾难深重的处境的唯一出路。

“宣言”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的分析，对于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分析，我们是始终不应当忘记的。资产阶级的一部“盛衰兴亡”的历史，必须从生产力的发展去看，必须从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的规律去看。使资产阶级曾赖以打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必然被无产阶级所打破的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并不是出于某些人的幻想，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资产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但他们企图抗拒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一切蠢举，最后都不能不以失败告终。我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妄图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向党大肆进攻，不过是徒劳的垂死挣扎而已。

“宣言”叙述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增长一步，就有一定的政治上的胜利与之相适应。最后，当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了封建所有制的统治时，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代替了封建的国家的统治，而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凡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它的作用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当前，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迫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更多地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这就使得某些修正主义者认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某一阶级的机构，不再反映和维护这一阶级的

特殊利益了”。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政权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丝毫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因而也没有丝毫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愈益表明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作用了。无产阶级若不推翻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的国家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便无法实现社会主义。

五 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资产阶级的必然灭亡，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必然胜利，这两件事正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宣言”第一章继续指出：“资产阶级不仅炼好了致自身于死命的武器。它同时还产生了运用这一武器来反对它自身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也经历了各种发展阶段。“宣言”说明了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劳动力购买制的掩盖下，无产阶级如何饱受着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痛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已经有人描写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指出有帮助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指出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由于它的痛苦的生活条件使它必然要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斗争，它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它本身存在的那天就开始了的。但是，无产阶级是在不断的斗争中，才逐渐有了自己斗争的最终目的，才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最初，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多半还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反抗行为。后来，一次接着一一次的斗争，锻炼和教育了无产阶级，他们觉悟到个别的工人乃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一员，他们休戚相关，他们应当团结起来，而且能够团结起来；同时，他们也觉悟到他们的斗争对象，不仅是个别的资本家和官吏，而是整个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于是，个别的工人对个别资本家和个别官吏的斗争，就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对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斗争了，这个时候的一切斗争就成为政治斗争了。斗争的发展，不仅使工人群众觉悟到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且使他们认识到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宣言”指出：“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因而组织成为政党一事，常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这种组织总是继续不断地重新发生，并且每次都来得更为有力，更为坚固，更为强大。”

这样，“宣言”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说起，通

过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说明了无产阶级怎样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宣言”从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中区分出无产阶级来，指出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者的不同，并不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者对立起来，而是要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特殊的社会地位，要无产阶级自觉地担当起领导其它劳动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历史任务来。无产阶级的这种历史任务并不是像右派分子说的那样是“自封”的，也不是什么人能给予它的，而是它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下层的阶级，是受尽旧社会的一切奴役的阶级，它要伸腰，它要抬头，它就必須把压在它身上的一切东西一起推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另一著作中又写道：“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不废除它自己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不废除那集中在它自己情况里面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生活的条件，它就不能废除它自己的生活条件。”

“宣言”叙述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之后，就接着指出：“当我们叙述无产阶级发展中那些最一般的阶段时，我们也就循序考察了现存社会里多少是隐掩着的国内战争，一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那时无产阶级就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每一个新社会代替旧社会，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而造成的，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时候，当新社会要代替旧社会的时候，强力总是起着“产婆”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也就用强力来夺取。当然，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如果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从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人就应当力图实现这种可能，因为这对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对全民族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在剥削阶级不愿让出政权并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就必须用强力来夺取政权。因此，无产阶级通过和平方式还是用强力取得政权的问题，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说，“与其说是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决定于反动集团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抵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这一或那一阶段上这些集团是不是采取暴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恩格斯所著“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也得到同样的解答，恩格斯写道：“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来废除私有制？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并不想反对这种办法，共产主义者知道得很清楚，任何密谋都

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他们知道得很清楚，革命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也不能定做，革命在任何地方都是完全不以个别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又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大受压制，共产主义者的反对者这样做无异是想尽方法引起革命。因此，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终于被迫起来进行革命，那末，共产主义者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像他们现在用言语来捍卫它一样。”

六 关于共产党的性质

“宣言”第二章首先作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对一般无产者的关系的声明。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手准备建立共产党的时候，欧洲各主要国家已经有了一些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组织，但是当时要在某一个国家内单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都还缺乏一些必要的条件。那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刚刚形成，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它（无产阶级）仅只模糊地感觉到了自己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深刻的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它当时仍然还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附庸。”（“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28页）至于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当时许多人虽然接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的、科学的共产主义，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受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抽象词句和空想共产主义个别方面的影响。这些人还不了解经济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还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出现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而认为是由人类理性所发明的、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纲领。对于英、法两国社会主义运动者这种在理论上的不成熟的情况，恩格斯曾写道：“我并不认为当时在整个同盟里哪怕有一个人是读过一本政治经济学书籍的。这不是不幸处：‘平等’、‘博爱’和‘正义’曾有助于占据任何理论高峰。”（“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41页）鉴于上述种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力求建立一个作为国际组织的共产党，这个党，要把英国的宪章党和德、法两国工人运动团体和社会主义运动团体内的先进分子逐渐吸收进来。为了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就要团结这些国家已有的工人运动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并在这些团体内展开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因此，为了团结各国已有的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团体，“宣言”声明：“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

的原则来试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为了进一步说服、教育各国工人团体和社会主义运动团体中的先进分子接受科学共产主义，并且把他们吸收入党，“宣言”又指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这样，“宣言”在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一般无产者的关系的声明里，也就对于共产党的性质作了以下的说明。

第一，“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在各国无产者底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当然，如果把这个原则理解为共产党人不应关心自己民族的正当利益，不必注意自己民族的特点，那是错误的。可是，现今的修正主义者却要抛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例如，有人竟把苏联为了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帮助匈牙利扑灭反革命暴乱的国际主义的正义行动说成是“武装干涉”，是“违犯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重申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利益的国际主义原则是十分必要的。正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一致，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兄弟关系和友谊，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社会主义各国间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完全可以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第二，“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他们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底利益”。当然，共产党人如果忽视斗争中各个阶段的特点，不去解决当前斗争阶段的问题，只是幻想一举而实现整个运动的利益和最终目的，那是错误的；可是，现今的某些修正主义者却在当前斗争阶段上忘记了整个运动的利益，忘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他们只强调党的任务是参加当前的人民斗争，而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个利益，对于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或者是一字不提，或者是含混其词。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不符的。第三，“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

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可是，现今的修正主义者却主张党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例如，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不能再坚持说共产党人是“得天独厚”的，不能说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引导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总工会，这个总工会不仅对政府和资本家是自主的，对党也是自主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有人反对党去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只要实行物质利益的原则，群众的实际行动和共产党员就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发展民主的障碍。我国的右派分子，也正是用类似这样的一种说法来攻击党，他们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其实他们是仇视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如果说，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不应该脱离群众，在党与非党人士之间不应该有墙有沟，这是对的；如果认为党同群众没有区别，甚至同资产阶级分子也没有区别，这类说法，其目的都是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企图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第四，“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底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就是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指导思想的。由于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因而党才能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长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及一般结果。可是现今有些修正主义者却借口反对教条主义，竟主张要从党纲中删去他们认为“过了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字眼，这显然不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而是拒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我国的右派分子也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们也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又一次庄严地驳斥了这种谬论，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反映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遍发展规律，适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第五，“宣言”指出，共产党的最近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因此，党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是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是一个革命的、战斗的组织，可是，现今的一些修正主义者却主张把共产党改变成一个从事选举的组织，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组织。显然，修正主义者的这些说法，是企图要改变共产党的性质的，可是，共产党的性质是由历史所决定的，是由无产阶级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当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当历史还需要

共产党存在的时候，共产党就要存在下去。当共产党还存在的时候，它的性质就不能改变。

七 对反共言论的批判本质上是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理论对维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的“理论”的批判

“宣言”在第二章中声称，在一定意义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一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资产阶级所以制造了无数诬蔑共产党人的谣言，喋喋不休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难，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共产党人所说出的一切恶毒的言语，总归是为了这样一件事：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宣言”对于资产阶级反对共产党人的言论的批判，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权这个根本问题下手的，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反对消灭私有财产权，“宣言”也从各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要消灭私有财产权。

资产阶级装出一付不胜为人类前途忧虑的神情，说什么消灭财产私有制，就是要消灭人们用劳动挣得的财产所有权，就是要消灭人们的自由、个性，就是要消灭教育、家庭、民族、永恒真理等等，总之，按照资产阶级的说法，消灭私有财产权，就是消灭一切。“宣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家庭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因而指出，消灭私有财产权，乃是要消灭少数人占有社会集体劳动产物的现象，消灭了私有财产权，从而也就消灭了少数人有自由和个性而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个性不能发展的现象，也就消灭了已往教育中的种种用以奴化人民的性质，也就消灭了无产者被迫独居生活和正式的、非正式的娼妓制，消灭了民族间的敌视关系，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思想，总之，随着私有财产权的消灭而消灭的不是别的，只是由私有财产权造成的一切祸害和弊端。在“宣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里，集中地反映了关于维护私有财产权和消灭私有财产权的一场大争论，在这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争论中，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第一次地遭受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目前我国反右派的斗争，也正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反映出了消灭私有财产权和企图恢复私有财产权的斗争。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不甘心情愿，他们说，现在是“党天下”，不民主，不自由，人民生活不如从前好，统购统销搞糟了，科学水平落后了，共产党员“六亲不认”了等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这一切叫嚣，也无非是重复了一百多年前他们的欧洲前辈早已唱过的老调，说什

么消灭了私有财产权就消灭了自由、个性、教育、家庭等等而已，除了这些，他们还能说出些什么来呢？

八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及其条件

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达诸国的情况，“宣言”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十条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其中一至六条是作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办法；七、八两条是作为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办法；九、十两条则是为了消灭城乡的对立、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办法。“宣言”在提出这些办法之前，曾作了以下三点极为重要的说明：

第一，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其实施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条件。“宣言”指出：“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不论任何旨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的前提下，才能指望实施。可是，现在有些自称还是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条件下，也能采取旨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有效办法，这些人忘记了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本来就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而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则是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如果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也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之点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不是“过时”了吗？我们不知道这些自称还是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究竟还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什么？

第二，无产阶级的国家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要一步一步地去消灭。“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有些办法，例如征收高度累进税，废除继承权，起初“在经济上似不充分和似脆弱，但在运动进程中却会超出其本身范围”。

第三，“宣言”所提出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的办法，对当时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国家来说，是几乎都可以采取的。但“宣言”的作者们曾一再说明，这些办法仍应依据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而有所不同。“宣言”在提出这些办法的时候就指出：“这种办法在各个不同的国度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在“宣言”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又指出：“第二章末尾所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孤独自在的意义。在现今的时候，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要写得不同了。”

“宣言”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办法的这些说明的正确性，在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获得了充分的证明。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所以能够获得胜利，首先就是由于我们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所以能够尽量少破坏地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由于我们采取了一步一步的改造的办法，即从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到部分公私合营又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转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步骤。而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又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制定的。

九 怎样认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

“宣言”第三章批判了当时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各种和共产党人相对立的理论。原来，在资本主义的矛盾暴露之后，被资产阶级“取而代之”了的封建贵族、经常处在资产阶级威胁之下度着苟延残喘生活的小生产者、以及有一部分妄想废除资本主义的弊害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己，都用“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来发泄自己对资本主义或多或少的不满，倾吐自己的心事，表白自己的利益。这样，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派别，而每一种“社会主义”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定阶级的利益，都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列宁说过：“共产党宣言”中，“对种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是在某种某种生产关系中寻找并找到这些理论的根源的”（“列宁全集”，第一卷，第122页）。因此，了解了种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根源，即了解了种种社会主义的阶级根源，大致就可以了解种种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实质是说的些什么了。

“宣言”把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当资产阶级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时，“不胜今昔之感”的封建余孽也出来向资产阶级致罪声讨。他们一方面为自己早被挤出历史舞台而哀鸣，一方面又对那个曾经把他们挤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现在也要被人挤出历史舞台的处境而嘲笑，他们装模作样好像是忘记了自己的利益而指责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其实他们是重弹封建的老调，埋怨资产阶级在代替了他们的统治之后，结果是统治出一个要把全部旧社会制度根本推翻的无产阶级来，这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小生产者无可避免地日益趋于破产。担惊受怕的小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己岌岌

可危的地位，也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批评资产阶级制度，可是他们总是从小生产者的观点出发，他们虽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若干矛盾，但是他们主张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却是想恢复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他们不是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却是要把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已容纳不了的生产力，硬塞进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落后的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里去，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实现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开始暴露情况下的德国小资产阶级，他们既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消灭了小生产者，又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根本消灭了私有制，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为当时德国专制政府服务的道路，既反对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想把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德国的哲学胡说协调起来，提倡用“爱”来解决阶级社会的矛盾。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亲嘴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这就是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宣言”在揭穿了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之后，接着又揭穿了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在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制是最好的制度，因此，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要巩固这个制度，因而想把这个制度的弊害废除。他们既然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才想去废除它的弊害，那么，废除这个制度的弊害手段，必须以毫不触动这个制度的存在为原则。他们丝毫不敢说明，若不经过阶级斗争废除近代社会一切弊害所由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不能废除由于这个制度存在就必然要产生的弊害，而却说资产阶级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企图使阶级调和起来，消除阶级斗争。恩格斯说：“想保持现代社会一切弊害的基础，而同时又想废除这些弊害，——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本质。”

“宣言”对于“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对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社会主义，采取了同对于反动的社会主义与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态度。“宣言”一方面揭破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一方面指出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批评的意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点，主要在于他们没有找到用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真实力量，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不

是一个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因此，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什么人物——不论是皇帝或者是一个大商人，接受了他们的理想，就可以帮助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了。但是，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斥责了剥削者的罪行，并提出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特征，其中虽然有些不免是幻想但有些却是天才的揣测。总之，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既不像保守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样，是为了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像反动的社会主义那样，是要恢复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只是昧于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把他们理想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无产阶级。对于这一点，“宣言”也指出，这是由于“尚未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自己所处的那种生活地位”所造成的。由于当时无产阶级还处在萌芽时代，还不能进行独立的政治运动，它当时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等级，还没有表现出是一个有力解放自己的阶级。“这种历史的情况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底创造者底观点。不成熟的理论，适应着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成熟的阶级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既然还在不发展的经济关系之中隐藏着，所以不得不从头脑中发明出来，创造出来。”（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0页）可是，这些曾经有过进步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到了他们的门生手里也堕落为一种反动的学派了。

当前，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般地不仅不提反对社会主义，而且口头上都声称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却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有的右派分子还说，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等于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读了“宣言”的第三章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会是什么“社会主义”呢？那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者是空想的社会主义。

十 共产党的策略原理

“宣言”第四章规定了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斗争中的策略原理。列宁说过：“共产党宣言论及政治斗争策略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他们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所谓“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底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就是说共产党人不能坐待自己的最终目的实现，也不能不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如何，希望自己的最终目的在顷刻之间就能实现。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逐步地以清除实现自己最

终目的的障碍物。因此，共产党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支持那些反对陈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各国民主党派间的团结和协议。目前，在许多国家里，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还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任务。在这些国家里，就有必要建立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爱国民主力量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就是说共产党人在从事当前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和其它党派团结的时候，也不能放弃对他们有不利于革命行为时的批评权利。

我国革命的经验，生动地证实了“宣言”关于共产党人的这一策略原理的正确。毛泽东同志指出：

“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599页）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如果没有这种联合和这种统一，党就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就是不能“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如果没有独立自主，如果放弃对其它党派有不利于革命行为时的斗争，党就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瓦解，因而也就不能做到“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运动的将来”。

“宣言”在指出共产党人的基本策略原理时，不仅指出了共产党人要同还能采取革命行动的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指出了在推翻封建之后就立刻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未成熟，无产阶级还处在萌芽时代，那时，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当然不可能立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可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熟，无产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在这种条件下，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就不需要有长期间断的状态，因而也就有可能从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宣言”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停顿的革命”的思想，即从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下转第19页右栏）

卡尔·马克思

印度的起义^①

倫敦，1857年八月十四日

的里雅斯特七月三十日的电报和八月一日的印度邮件傳來印度的消息^②，当时，我們根据这些报导的内容和日期，馬上指出德里的占領是一个恬不知耻的騙局，和令人难忘的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虛报同出一轍，不过手法差得多罢了。然而，誰也猜不透約翰牛（英国的綽号——譯者）是那么容易受騙，以致它的部長們、股票投机商們和它的報紙居然能使它相信：在那些分明透露出巴納特將軍处于防御地位的报导中，竟包含着全歼敵軍的确証。这个錯覺逐日加深，到后来連特·雷西·伊凡斯爵士——一位对这类事件極有經驗的將軍——也只好在八月十二日夜里，在下議院的欢騰声中宣称：他相信占領德里的消息，不是謠傳而是事实。然而，剛剛当众发出这个荒謬的声明，揭穿西洋鏡的时机就已經成熟了。第二天，八月十三日，印度邮件还没有寄到，便接二连三的来了的里雅斯特和馬賽的电报。它們毋庸置疑地报导了以下的事实：德里在七月二十七日依然屹立无恙，巴納特將軍仍处于防守地位，并因經常受到守軍的猛烈出击，他对于自己能把陣地維持到那个时候还覺得十分高兴哩。

我們認為下一次邮件大概會帶來英軍敗退的消息，或者至少提供一些材料，預示这种撤退。显然，要人們相信那么長的德里城，可以处处有效地設防，是不可能的。相反，它会招致敌人集中兵力进行奇襲。不过巴納特將軍对于設防的城市、圍攻和炮击，仿佛帶有欧洲人的那种老看法，在作战上，他墨守成規，像查理·納庇尔爵士用来威懾亞洲人的那种神出鬼沒，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术，他是不善于运用的。据說巴納特將軍的兵力已經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左右，其中欧籍兵七千名，“可靠的士兵”五千名；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不容否認的，起义者方面每天也有援軍开到，所以我們完全有可能假定，攻守双方在人力对比上沒有发生变化。此外，巴納特將軍要取得一定成功，只有奇襲莫臥兒皇宮；这个皇宮居高临下，但是在雨季（那时大概雨季已經来临了）沿着河向皇宮進軍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从克什米尔門与河岸之間的地方去攻打，要是打不下，恐怕就要遭受最惨重的伤亡，將冒最大的危險。最后，雨季的到来无疑会使巴納特將軍把維持運輸綫和退路作为他的作战的主要目标。总而言之，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会用他那还不充足的兵力，在最不利的季节里，冒險去做他在有利得多的时候都不敢去实现的事情。尽管倫敦的報紙昧着良心，千方百計地掩盖事实，欺騙自己，最上層人物却已經感到严重的不安，帕麦斯吞勳爵的喉舌“晨报”（Morning Post）証实了这一点。該报被養着的紳士們告訴我們：

“我們甚至怀疑，我們是否能从下一次邮件中得到占領德里的消息，不过我們殷切地希望，一当已在途中的、配备有足够数量重炮的增援部队抵达时（目前我們仿佛还没有重炮），我們能收到叛軍的坚固据点陷落的消息。”

十分明显，由于不列顛將軍們的懦弱、优柔寡断和疏忽，他們竟把德里当做印度起义的政治和軍事的中心。英軍在長期圍攻后的撤退或甘心处于防御地位，都將被看成是絕对的失敗，它会給全印度发出起义的信号。此外，它还会造成英軍中可怕的死亡率。在圍城期間，頻繁的出击和

遭遇战必然使兵士人人振奋，同时他们希望对敌人雪恨，这些使他们到目前得以避免那样的命运。至于说印度人漠不关心，甚或同情不列颠的统治，这些全是胡说。王公们——正如真正的亚洲人——正在窥伺着良好的机会。整个孟加拉管区的人民——在那里他们没有受一小撮欧洲人的管治——在过着幸福的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他们就是起义，也没有可反对的对象。希望印度的起义具有一次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就是可笑的错误。

在馬德拉斯和孟买兩管区，既然军队还没有表示态度，人民当然不会行动起来的。最后，旁遮普直到現在仍是欧籍军队的駐防重鎮，而当地的军队則被解除武装了。要使它动作起来，鄰近的半独立王公們必需大力援助，使力量对比起基本变化。但是，孟加拉军队中暴发的那种有蔓延性的陰謀，如果缺乏本地居民暗中的同情和支持，是不会具有这样波瀾壯闊的規模的；这同样是很明显的，英国人在取得供应和运输方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这是他們的军队集中緩慢的主要原因——正說明农民对他们是不怀好感的。

电报傳来的其它消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告訴我們，在旁遮普最遙远的区域——白沙瓦——也暴发了起义；在另一方面，起义正从德里向南蔓延到孟买管区，席卷了詹西、薩加尔、印多尔和毛渥等衛戍区，最后一直达到了距孟买东北方只有一百八十英里的奧蘭加巴。我們还可以指出，彭特尔康特的詹西是一个設防的城市，因此可能成为軍事起义的第二个中心。在另外一方面，据报，范·考特蘭特將軍在从西北方前去跟德里（他距德里仍有一百七十英里之遙）城下的巴納特將軍的部队会师时，已在途中击败了所薩地区的起义軍。他必須經過詹西，在那里他仍然会跟起义軍发生战斗。至于說到英国政府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帕麦斯吞勋爵似乎認為最迂迴的航綫才是最短的，所以他宁可繞道好望角而不通过埃及来运送他的军队。而几千名預定开往中国的士兵被截留在錫蘭，并被命前往加尔各答（第五步兵团确曾于七月二日抵达加城）。这椿事却給帕麦斯吞一个好机会：他可向他的忠順的、但仍然敢于怀疑他发动的对华战争是“一笔横財”的那些下議院議員們，开一个不小的玩笑。

馬克思写于1857年八月十四日

刊載于“紐約每日論壇报”第5104期（1857年八月十九日）

第一次用俄文刊印的譯文是根据該报原文从英文譯出的。（按：中譯文是从英文原文譯出，并参考了俄文譯文。——譯者）

① 这里第一次用俄文刊印的馬克思論1857—1859年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的文章，是苏共中央直屬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在編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筹备过程中發現的。

这篇論文以“印度的起义”为题發表在当时的美国进步报纸“紐約每日論壇报”（New-York Daily Tribune）上，作者沒有署名。馬克思在他的1857年的“筆記簿”上所做的注釋，无可置疑地証实了这篇文章是他写的。

“印度的起义”一文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7年七月十五日到1858年十月十五日这段时間內随著印度起义事件的發展而写作的，發表在“紐約每日論壇报”上的一系列論文中的一篇（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一卷，第一分册，第213—341頁）。

“印度的起义”一文將編入苏共中央直屬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第十二卷，本卷的主編是С.З.列維涅娃，編輯是А.С.杰尔古洛娃和З.В.辛洛維也娃。

苏共中央直屬

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

② 这里指的是关于占領德里的假报导。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十一卷，第一分册，第229頁。——編者

卡尔·马克思“印度的起义”一文的讀后記

1857——1859年印度的起义在全世界許多国家，首先在欧洲各国引起了很多的反应。人們对起义的进程、有关軍事行动的新聞以及很多在当时引起大量書刊进行討論的一般性的問題，都发生了極大的兴趣。欧洲各国的評論家們試圖說明印度起义的原因和性質，起义对印度和英国的命运的后果、英国殖民制度的性質、不列顛在亞洲統治的意义，特別是試圖說明这次起义对印度究竟有利还是有害的問題。从对这类問題的提法，便可看出各国内部不同政治派系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各种流派的斗争，并反映出当时的国际形势。很自然，在当时不存在一致的“欧洲社会輿論”，而就在欧洲的英、法、俄三国之間，也沒有一致的社会輿論。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非常注意印度发生的事件。马克思对印度的兴趣跟他理論的和实践的革命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凡是和马克思同时代在印度发生的所有重要事件，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到反映。他确定了对印度中世紀研究中的一些主要問題，这就使有可能来评价英国征服印度的客观意义及其結果。马克思曾研究了有关印度变为英国殖民地問題的主要方面。马克思把印度作为典型的殖民地来研究并以对印度的发展的研究材料为基础，解决了許多具有普遍性的問題，例如，亞洲国家变为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的意义和結果、奴役东方国家在世界史发展中的意义、对印度和其它东方国家的殖民奴役在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中和在解决这些矛盾的革命行动中的作用等。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非常同情印度人民，他們对1857——1859年的印度起义特別注意。在起义前几年，马克思就曾在一篇論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来結果的文章中作結論說，爭取民族独立和摆脱外国統治是印度面臨着的主要历史任务。马克思認為1857——1859年事件是直接反对不列顛統治的起义。1857年八月十四日，即在起义后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写道：“以后还会显露出一些別的事实，它們甚至將使約翰牛都相信，被它認為是軍事叛变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民族起义。”^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論文中总结了印度各民族解放斗争的軍事經驗，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形势，起义的原因、它的性質和动力。马克思写道：“在此以前印度军队中也曾发生过叛变，但这次起义不同于以前的叛变，它具有不同的性質和特別危

險的特点。在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土兵团杀死了他們的欧籍官長；回教徒和印度教徒忘掉了相互間的仇恨，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主子；‘在印度教徒中首先发生了騷动，后来竟把一个回教徒皇帝拥上了德里的宝座’；起义并不局限在少数地区；最后，英印軍中的起义跟偉大的亞洲各民族所表現的反对英国統治的普遍不滿是分不开的，因为孟加拉軍的起义，无疑是跟波斯和中国战争紧密地联系着的。”^②

马克思指出，印度的民族起义不是孤立的現象。印度的起义、太平天国革命（1857——1864）以及伊朗的巴布教运动（1842——1852），应被看成是历史上相互关联的現象，并且是对奴役东方各民族的资本主义列强，首先是其中最强大的英国的一个回答。所以，1857——1859年的印度起义是許多亞洲国家解放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提出了欧洲革命問題，提出欧洲革命跟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发展以及跟这些国家各民族的解放斗争之間的相互联系問題。从这种联系出发，马克思把1857——1859年的印度民族起义看成是欧洲革命的同盟者。他在1858年一月十四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將使英国消耗大量人丁和黄金的印度，現在是我們最好的同盟者。”^③

前面用俄文第一次发表的“印度的起义”一文，对1857——1859年起义的性質問題提供了特別重要的意見。“至于說印度人漠不关心，甚或同情不列顛的統治，这些全是胡說。王公們——正如真正的亞洲人——正在窺伺着良好的机会。整个孟加拉管区的人民——在那里，他們沒有受一小撮欧洲人的管治——在过着幸福的无政府状态的生活；他們就是起义，也沒有可反对的对象。希望印度的起义具有一次欧洲革命的特征，那就是可笑的錯誤。”马克思在以前的几篇論文中分析这次偉大的印度起义時曾指出，起义震撼了全国。在本文中，马克思重新強調道：“孟加拉军队中暴发的那种有蔓延性的陰謀，如果缺乏本地居民暗中的同情和支持，是不会具有这样波瀾壯闊的規模的……。”马克思指出，英国人在鎮压起义中遇到的困难“正說明农民對他們是不怀好感的”。他又指出王公們都采取观望态度，等待着良好的机会以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一分册，第228頁。

② 同上書，第214頁。

③ 同上書，第二十二卷，第290頁。

行止。馬克思着重指出人們對不列顛統治的普遍不滿，駁斥了那些說印度人對國內大事漠不关心的荒謬論點。

馬克思指出，期望“印度的起義具有一次歐洲革命的特征”是沒有根據的。這一點具有極大的原則性意義。亞洲各國民族起義所面臨的任務，同歐洲革命所面臨的任務是不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亞洲各民族的解放鬥爭看成是歐洲革命的同盟者。

在這篇文章里還觸及與印度起義的進程相關聯的一些問題。

馬克思在1857年七月十五日寫的文章中指出：“德里的起義者，顯然在經過不很長時間的抵抗後就會投降的”^①，而在1857年八月四日的文章中他更寫道：“……德里的陷落消息旦夕可期。但是下文怎樣呢？假如印度帝國的傳統中心被起義者無可置疑地占領了一月之久這件事發生了最有力的酵母作用，完全分解了孟加拉軍，把軍隊的叛變和逃亡從加爾各答向北擴張到旁遮普，向東到拉奇普他那，從印度的一頭到另一頭動搖了不列顛的威權，那末，德里的陷落雖然會在士兵陣營中造成驚慌，如果認為這就足以撲滅起義，阻止它的進展，或者恢復不列顛的統治，那就大錯特錯了。”^②馬克思在1857年八月十四和十八日發表的論文中指出，儘管英國人樂觀地宣布德里攻克有期，但這個都城仍然沒有“從史頁中勾去”。他把占領德里的謠言描繪為“占領塞瓦斯托波爾的出名神話的再版縮圖。把馬德拉斯報紙上所載事實和日期加以粗淺的分析，就足以說明問題，而這些企圖自欺欺人的好消息似乎正是從這些報紙里散布出去的”^③。

必須指出，馬克思在這篇文章里也駁斥了英國人散布的占領德里的謠言（德里實際上是在1857年秋季才淪陷）。“的里雅斯特七月三十日的電報和八月一日的印度郵件傳來印度的消息，當時，我們根據它的內容和日期，馬上指出，德里的占領是一個恬不知恥的騙局，和令人難忘的塞瓦斯托波爾陷落的虛報同出一轍，不過手法差得多罷了。”

在結束時，還必須提到，馬克思在被我們探討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在印度和中國發生的事件的相互關

系。“而幾千名預定開往中國的士兵被截留在錫蘭，並被命前往加爾各答（第五步兵团確曾於七月二日抵達加城）。這樁事卻給帕麥斯吞一個好機會：他可向他的忠順的、但仍然敢於懷疑他發動的對華戰爭是‘一筆橫財’的那些下議院議員們，開一個不小的玩笑”。

Л.С.加馬猶洛夫

（陳文林譯自“蘇維埃東方學”，1957年第五期）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第一分冊，第216頁。

② 同上書，第217—218頁。譯文參閱周一良譯：“印度的叛變”一文，載“歷史教學”1953年五月號。

③ 同上書，第十一卷，第一分冊，第229頁。

（上接第15頁）

× × ×

“共產黨宣言”是1848年二月間發表的，在這部著作出版問世的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幾個月，我們讀到了“1957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我們今天能夠把共產黨的相隔一百一十年的兩個宣言拿來一起去讀，這是一種莫大的幸福。一百一十年以前的共產黨人，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還只能是“向全世界公開說出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意圖，並拿出本黨底宣言來對抗那關於共產主義怪影的神話”，而現在的共產黨人，也正如“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宣言”所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成長壯大了，它經受了許多嚴重的考驗，並且取得了一系列光輝的勝利。共產黨人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在世界範圍內向勞動人民証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生命力，証明了自己不僅能夠宣傳而且能夠在艱巨的實踐中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理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這兩次偉大宣言之間的一百一十年里，共產黨人擊退了反動勢力的種種迫害，已經在占人類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中把社會主義從理想變成了事實，這就更加說明除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外，現代人類是別無它路可走的，除了共產黨以外，是別無他人可以領導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的。

教学参考

关于甘肃远古文化的一些新論据

安 志 敏

甘肃地区的远古文化遗存是丰富多彩的，从1923年起便在这里有了很多发现，并根据它作出所謂“六期”的分期工作。这种分期是片面的唯心观点，只是从器物的形态和紋飾上出发，完全缺乏地層上的証据。近几年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也曾針對着上述的錯誤观点进行过一系列的批判，由于資料的限制，虽然击中它理論上的要害，但仍缺少实际发现的証明。目前只有个别的人还在“抱殘守缺”，而大多数的人却感到旧的已被批判，新的尚未建立，遇到这类問題，常常是难以处理。

甘肃远古文化的内容是异常复杂的，决不是由某一种單純的文化連續发展的結果，而是不同的文化在該地区經過长期发展的过程。如果想解决甘肃远古文化的一般性質，就不能把它們当作一种單純的文化系統来处理。至今甘肃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这也反映了远古文化复杂性的一部分真实情况。过去的主要錯誤是把甘肃远古文化作为由西方傳來的一支，并且想它的分期应用到全国范围中去；另外也忽視了各种文化基本因素的不同，而認為它們是出自同一个根源。这些錯誤的看法是必須予以澄清的。

所謂“六期”的說法是有它的历史基础的，在我国考古学的初期阶段影响很大，从專門論文以至于历史教科書中都多少承襲了它的錯誤，甚至于有人还把它加以扩大与补充。因此必須摆出事实来才能予以徹底击破。本文即根据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在甘肃刘家峡水庫調查中所获得的新証据，結合前人的研究，来揭謬所謂“六期”說的錯誤，并說明我們对甘肃远古文化的看法，以供古代史教学中的参考。

1923—1924年，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帶

作調查工作，根据他的采集、盜掘和購買的材料，在1925年所发表的“甘肃考古記”中，把中国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半山）、馬厂、辛店、寺窪（卡窖）、沙井”六期，并定出絕對年代，認為它們是开始在公元前3500年，連續发展，而每期的延續期間是三百年。他在1943年所发表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中，依然維持着以前的看法，只不过修正了絕對年代，把整个向后推迟了一千年。仅仅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看出它純粹是毫无根据的唯心估計。現在把安特生的分期及其前后所估計的絕對年代数字列表如下：

时 代	分 期 (相对年代)	絕對年代(公元前)	
		1925年的意見	1943年的意見
石 器 代 晚 期	齐家	3500—3200	2500—2200
	仰韶（半山）	3200—2900	2200—1900
	馬厂	2900—2500	1900—1300
青 銅 器 时 代	辛店	2500—2300	1300—1000
	寺窪（卡窖）	2300—2000	1000—700
	沙井	2000—1700	700—500

从表面上看，安特生的分期好像是很整齐紧凑，事实上是破綻百出的。首先1928年龙山文化的发现，便把所謂“六期”說突破了一个缺口，接着1944年在甘肃广通自治县半山的陽窪湾发现齐家墓葬的填土中有仰韶陶片，証明了齐家确是晚于仰韶的。这样安特生的分期理論就已經基本动搖了，至于其他部分也还是站不住脚的。最近在刘家峡水庫的发现更提出了新的証据，使安特生的分期理論陷于基本瓦解，因此也必要提出一套新的看法来代替它。

1956年春天，黄河水庫考古工作队在甘肃刘家峡

水庫区沿着洮河、大夏河及黄河的一部分进行调查。调查的规模及面积仅次于1955年秋季及1956年春季所进行的三门峡水庫区调查工作。

在这里共发现了住地和葬地一百七十六处，計包括甘肃仰韶四十七处，齐家六十五处，寺窪一处，卡窑三处；另外还有一处新的发现，我們暫称它为“唐汪式”陶器。在这次调查中除了采集到大量的陶片、石器以外，还从群众中征集到完整的陶器二百八十三件，这些对了解各种文化的性質大有帮助。其他的重要发现，是根据一些遗址中的地層关系，解决了不同文化的相对年代。在这里发现了辛店層叠在齐家層的上而，而齐家層又叠在甘肃仰韶層的上而，因此我們得到关于甘肃远古文化相对年代的新論据，更进一步証明了安特生的推測是基本錯誤的。

另外解放以后，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配合修建铁路及基建等工程中也做了很多考古工作，那些丰富的发现都帮助我們对甘肃远古文化的性質得到更多的認識。

上述新发现的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下面加以綜合的介紹。

二

(1) 甘肃仰韶文化

甘肃、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一般和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有显著的不同，为了便于区别起見，我們暫称它为“甘肃仰韶文化”。它包括安特生所分的“馬家窑”、“半山”和“馬厂”三期，据他的推測是以甘肃临洮馬家窑为住地的代表，而以甘肃广通自治县半山和青海政和馬厂沿为葬地的代表。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單純，虽然住地和葬地的出土物有着一些区别，但也偶有互見的，例如永靖三坪葬地出土的一件陶罐，无论器形、花紋都是属于馬家窑式的（圖一）；另外我們在許多住地中采集到少量的半山式的陶片，上面有安特生所謂的“丧紋”（鋸齒紋——圖二）。据目前的材料观察，我們可以相信馬家窑、半

山和馬厂三者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文化，住地的馬家窑是代表了較長的阶段，它可能相当于半山和馬厂兩期。葬地的“半山”和“馬厂”可能是代表着早晚不同的时期。但过去因为缺乏科学的发掘，它的分期只是單純地从标型学上着眼，沒有地層或成組器物为依据，这种分期标准还不能够完全信賴，在发掘出来的陶器中有的很难归到那一期里去。我們暂时采取这种分法，真正的标准还要等待将来的发掘和研究去解决。

所謂“甘肃仰韶文化”虽和“仰韶文化”非常近似，但并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統。前者主要分布在洮河、大夏河、河西走廊及青海一带；而后者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以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省。在这兩种文化的接触地带也互有交錯，例如我們在刘家峡所发现的四十七处遗址中便有三处是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系統。*另外在水天附近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含有少量的“甘肃仰韶文化”陶片，而临洮馬家窑遗址中也含有少量的“仰韶文化”陶片，这些究竟是共存的，还是在时代上有先后关系，都有待于今后的发掘来解决。从文化性質和地理分布上来看，“甘肃仰韶”和“仰韶”当属于不同系統的两个文化，它們的时代可能相等，或者仰韶文化的年代会較早一些，但还缺少充分的証据。

(2) 齐家文化

过去認為它是新石器时代較原始的一期，只不过是在广通齐家坪的地面上发现过仰韶彩陶片，而齐家層中也有紋飾簡單的彩陶片，于是認為其年代早于仰韶文化。但是在它本身的性質上便具有很多可疑点，中国考古工作者曾提出反对的意見。夏鼐先生在广通半山陽窪湾发现齐家墓葬的填土中混有仰韶彩陶片，这样給齐家晚于仰韶的相对年代上提供了有力的証据。另外从文化性質上观察齐家应是一个单独系統的文化，因此我們称它为齐家文化。

在刘家峡水庫的调查，于永靖刘家峡发现了地層上的証据，齐家層叠在甘肃仰韶層的上而，这样更証明了齐家文化确是晚于仰韶文化，而以前的推測是完全錯誤的。

据我們所采集的标本中似可分为彼此不同的兩群，可能会有时代先后的关系。同时我們还发现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非常近似，特别是和陕西境内的龙山遗址更为接近，說明兩者之間当有較密切的关系。

齐家文化是晚于甘肃仰韶文化，但也接受了一些影响，例如在齐家層中也有少量紋飾簡單的彩陶，我們还征集到一件完整的“安佛拉式”彩陶（圖三），这也是一件比較珍貴的标本。至于过去認為是“齐家”



圖一 甘肃仰韶文化彩陶（馬家窑）



圖二 甘肃仰韶文化彩陶（半山）

特征的“篦紋陶”，在六十五处遗址中仅发现了兩片，証明它并不是齐家文化的主要产物。

(3) 辛店文化

过去認為辛店是直接承襲馬厂发展来的，后来我們認為它和甘肃仰韶文化不同，不仅彩陶变得粗糙簡單，也产生了銅器，因此定名为“辛店文化”，至于和其他文化的关系一时不能确定，只好暂时把它附在甘肃仰韶文化的后面。

通过刘家峡水庫的調查，在永靖張家嘴和吳家都发现辛店層叠在齐家層的上而，因而也改正了以前的錯誤看法。

在刘家峡水庫区内有丰富的辛店遗址，据所采集到的标本也可分为兩群：甲群是典型的辛店遗址，分布范围也較广；乙群仅分布于永靖县的附近，它的特征接近于將要在后面介紹的“唐汪式”陶器。至于年代可能是乙群較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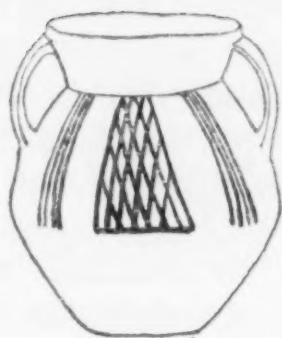
辛店文化不仅有銅器共存，遗址的分布也有地理上的限制，仅見于洮河、大夏河及黄河的一部分地区。至于渭河上游則是周代層压叠在齐家層的上而，但不見辛店遗址的痕迹，因此我們推測辛店文化可能与周代同时或者稍早。

(4) 寺窪文化

寺窪文化也是青銅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和其他文化并无承繼的关系，过去認為它是繼承着辛店而发展的一期是根本錯誤的。

据現有的資料这种文化的分布并不广泛，似仅限于洮河流域。过去仅在临洮寺窪山发现葬地，这次在临洮石家坪也发现了葬地，但到現在还没有找到住地。

寺窪文化陶器的主要特征以馬鞍口式为主



圖三 齐家文化彩陶



圖四 辛店文化彩陶



圖五 寺窪文化陶器

(圖五)，沒有彩陶（过去的購買品中可能是骨董商人添繪的）。在我們发现的辛店文化陶器中也有一些是馬鞍口形式的（見圖四），說明兩者可能互有影响。因此，寺窪文化可能是和辛店文化同时存在的兩種不同系統的文化，在今后发掘工作中將会找到更明确的証据。夏鼐先生根据葬式（火葬）来推定它是属氏羌族的原始文化，这个意見是非常正确的，对了解寺窪文化的性質有很大的啓示。

(5) 卡密文化

卡密文化仅分布于青海湟水以及甘肃黄河的沿岸，也是帶地方性的一种文化。虽然在陶器中有馬鞍口式的，但形式不显著，数量也少，过去把它归入到寺窪文化也是与事实不符的。

这个文化具有較多的青銅器，在陶器中也不見鬲、鼎等器形，它的年代可能晚于辛店和寺窪文化。

(6) 沙井文化

沙井也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和以前的各种文化并没有甚么承襲关系。这里虽然有彩陶，但陶質、制法、花紋以及器形上都和甘肃仰韶文化、辛店文化有所不同，同时还有丰富的青銅器共存。

这个文化仅分布于河西走廊的民勤、永昌和古浪等县，在刘家峡水庫区内并没有类似的遺存。沙井文化的住地已經出現了城廓（如三角城）可能是与辛店、寺窪同时或較晚的不同系統的文化。

(7) 唐汪式陶器

在东乡自治县唐汪川山神发现了一处遗址，并征集到十九件完整的陶器。这些陶器是属于一个新的类型和其他文化的陶器有显著的不同，我們暫称其为“唐汪式陶器”，除此而外在辛店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些同样类型的陶片，它很可能是所謂“六期”以外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統，但还缺少充分的証据，希望在今后的发掘中能够获得解决。

这个类型的陶器具有許多特征：陶質粗糙，表面磨光，有紅色或褐色的陶衣，所繪的花紋以螺旋紋为



圖六 卡密文化陶器



圖七 沙井文化彩陶

主，在器形上既类似甘肃仰韶和齐家，也近似于辛店文化，充分表现了它的性质的复杂性。



圖八 唐汪式彩陶

过去安特生在青海西宁十里堡也曾发现过同样的遗址，但他误认为是属于马厂期的住地，并且把这里的彩陶花纹来和特里波列来比较，而定出马厂期的绝对年代，其他各期的年代也都是以这里为基准向前后推算的。事实上十里堡遗址是属于典型的“唐汪式陶器”，和马厂毫无关系，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安特生分期的绝对年代的依据也是根本错误的。

关于“唐汪式陶器”的年代还不容易解决，但是它的某些器形近似甘肃仰韶和齐家，同时在辛店遗址中也偶而有这类陶片，因此我们推测它可能相当于齐

家和辛店之间，早于辛店或者与辛店同时。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虽然安特生创立所谓“六期”的说法，企图解释中国远古文化的发展过程，由于他没有掌握充分的资料和严密观察，特别是没有地层上的证据，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根据我们新的发现与观察，可以知道甘肃远古文化是异常复杂的，这些不同的文化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或如安特生所主张那样的继承顺序。事实上甘肃远古文化的发展是：甘肃仰韶→齐家→辛店的顺序，其他的都是另外系统的文化可能与辛店同时或稍晚。安特生的主要错误是既颠倒了它们的相对年代，又把它们当作了顺序发展的同一个文化系统，这种错误的理论是必须予以批判的。

另外甘肃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文化性质上是比较接近的，可能它们是属于同一个范畴，但各具有一些地方性。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在物质文化面貌上具有颇大的一致性，也进一步证明了它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发展，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上所存在的各项问题将逐步获得解决。

（上接第40页）大大有助于这种群众的革命教育。

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使沙皇专制政体在这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战败的口号。沙皇制度在这次非正义的战争中失败，是对党和人民最好的结局，因为它会削弱反动当局的力量，揭露沙皇制度的腐败无能，并因此而便利工农群众推翻沙皇制度的任务。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口号，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并且它不仅是对俄国的工人和士兵提出的，它同时号召日本的工人和士兵为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失败而斗争。

布尔什维克采取了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以祖国真正的爱国者的资格进行活动。列宁提出使沙皇制度在这次战争中战败的口号，并不止一次地着重指出，沙皇制度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决不意味着俄国人民的失败，反之，沙皇制度的失败加速了专制政体的解体与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专制政体的解体，替俄国人民群众扫清了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的道路。作为祖国真正的爱国者而进行活动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力求以革命复兴国家。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的卫国立场，不是号召瓦解军队，叫士兵们放下武器；反之，它教育士兵在政治上觉悟起来，使他们掉转枪口反对自己国内的敌人——

地主和资本家。

只有推翻了沙皇专制政体，才可以保持国家的独立，把它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奴役下拯救出来，争得工农群众真正的祖国。

沙皇专制政体在这次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由于工农群众不愿为深恶痛绝的专制制度流血。毫无疑问，这种反战情绪在沙皇制度的失败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存在而决定的国家在技术和经济上的落后。

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指出，专制政体以它愚蠢罪恶的殖民冒险行为，已把俄国引上了绝路，只有人民自己，只有以推翻专制政体的代价，才能把俄国从这条绝路上拯救出来。“对革命最无信心的人都开始相信革命了”，列宁写道，“对革命的普遍信心，已经是革命的开始”①。

沙皇专制政体打算借战争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它的打算落空了。

（李文俊摘译自И·И·普罗科宾科：“日俄战争·革命的开始”一书，1956年莫斯科大学出版部版）

① “列宁全集”第八卷，俄文版，第36页。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清政府的洋务运动

王 仁 忱

自鴉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时代，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烈的变动，阶级关系开始显著的变化，则是从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在这个期间，清政府开始重用汉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洋人也开始进入了朝廷，清政府的机构为了适应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外关系的变化，也开始有某些变动，同时又唱出“办外交”“以求中外和好”，“兴工业”以谋“富强”，于是开始了所谓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对中国政治经济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封建统治阶级中有人曾把这个时期说成是“同治中兴”，买办资产阶级称赞它是中国的“工业化”开始，这都是站在反动阶级立场歪曲了历史的真相的调调。我们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国内革命运动震撼下推行一种半殖民地化的政治经济运动，企图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经济上加速中国半殖民地过程的作用。但历史是按照辩证法发展的，在“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新工业产生了，新阶级产生了，西洋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输入了。客观的历史进程是向前进了一步。

一 清政权的改组与洋务派的“自强”

(1) 清朝统治的两个新支柱：资本主义列强与汉族地主武装力量把清统治从太平天国革命及捻回苗起义的冲击中挽救出来。很显然地太平天国革命在十六省广大地区与清朝武装斗争了十四年，继续着捻回苗的起义又在广大的西南西北和中原地区与清朝斗争了十年，这就给清政治经济军事予以重大的打击，已经掘松了它的统治基础，在军事上，清朝统治的力量已被削弱殆尽。太平革命自金田起义后的胜利进军中，攻破大小城寨无数；在建都天京后进行的北伐战役中，又历经五省，攻占大小七十余城；在西征的战争中，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均被太平军所占，把清朝大半江山的统治权给捣毁了，杀死了无数的贪官污吏，很多清将如围困江南北大营的向荣、和春、张国

樑均先后战死。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曾国藩在1861年的奏摺中说：“现在浙苏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抵已固”。在1864年奏请豁免皖省钱漕中又说：“安徽八府五十九州县陷于粤逆者十居其七，被于捻匪叛者十居其三”。1865年清军大將僧格林沁被賴文光领导下的捻军击毙。1868年云南回民起又占领全省五十余城，可说是丧城失地，损兵折将了。清政府在财政上的消耗已经是罗掘俱穷。赛尚阿在广西用的军费一年計将八百万兩，每日要用三万兩。在1856年曾國藩奏文中說到清軍軍餉困难的情形是：“腊月餉，即系搭放鈔票一半，当此攻战吃紧，口食不保，深恐飢疲潰散，大局决裂”。清史稿食貨志說“咸丰初年，粵匪驟起，捻回繼之，国用大絀，迄于同治，岁入之項轉以厘金洋稅为大宗。”原江南富庶之区，为京倉粮源，在1863年曾國藩奏摺中说：“臣伏查咸丰十年以来，苏浙淪陷，南漕运京，为数寥寥”。说明清财政所依靠的田粮賦稅，米为收入大宗，现在經二十五年的全国起义的震动为之破坏了。当时清统治者已处在風雨飄搖，惶惶不可終日之势。但它终于在簽訂1860年的美国条約——北京条約以后，得到外国侵略者的帮助和汉族地主武装力量的支持，把起义軍鎮压下去，渡过了它的危險。原来清朝的皇族統治却大为削弱了。在它的政权里要讓出一些重要的位置給洋人及汉族地主勢力的代表們进去。这就是清統治者在七十一——八十年代的两个新支柱。

(2) 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天津和北京两个条約的簽訂标志了洋人勢力的进入清朝廷，国内的封建反动势力与外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携起手来，在共同鎮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

第一、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的設立：清政府設有理藩院及禮部，專为管理及接待藩屬国的貢使，現在已在天津条約第五条款載明：“大清皇上特簡內閣大学士尚書中一員，与大英欽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見“中外条約彙編”第6頁）。而在第三条款中说：“大英欽差各等大員及

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本国諭旨遵行,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于欽差大臣作为本国全权大員,謁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惟大英君主每有派員前往泰西各与国拜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以昭划一肃敬,至在京师租賃地基或房屋,作为大臣等員公館,大清官員亦宜协同勤办,雇覓夫役,亦体其意,毫无阻攔。待大英欽差公館眷属随員人等,或有越礼欺藐等情弊,該犯由地方官从严惩办”(同上引書)。从这两条中規定了外国公使駐京和与各国相待以平等礼节,而且在天津条約中規定了許多清朝对西洋資本主义国家的深入和扩大侵略須尽帮忙的义务,所以原有的理藩院及礼部对待属国“下邦”的机构是不能适应天津条約簽訂后的局面了。于是在1861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上奏摺說:“若就目前之計,按照条約,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陰示羈縻……酌拟章程六条”。第一条就是請在京師設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第二条就是請在南北通商口岸設通商大臣。在他們的奏摺中也說明請設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的理由是:“各国公使駐京以后若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办理延誤,未能悉协机宜”。設南北洋通商大臣的理由是:“开港日多,南北相去七、八千里,仍令其旧五口通商大臣办理,不独呼应不灵,各国亦不願从”。于是清政府在1861年四月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將旧鑄錢局改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門,費用二千兩,这两个外交衙門,完全是天津条約和北京条約的产物。是为了接待外国駐京公使和为了帮办各国“通商”而設的,也可以說完全是为招待各国侵略大臣和为各国經濟侵略而設的。总領其事的就是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戶部左侍郎文祥。他們都是在滿洲貴族中首倡“中外和好”之人。这个衙門成立以后,各国公使相繼于1861年内入駐北京,各国公使逐漸地就过問清朝的内政外交了。而在地方設的南北洋大臣为直隶兩江总督兼領,照例是湘、淮軍閥势力專有,北洋通商大臣設于天津,南洋設于上海,后迁南京,是为了貫徹天津条約第七款:“大英君主酌看通商各口之要,設立領事官,与中国官員于相待諸国領事官最优者,英国亦一律无异。領事官署領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領事官署副領事及繙譯官与知府同品,視公務应需衙署相見,会晤文移,均用平礼。”各港口的領事官都与清朝所在地的長官平等移文会晤。实际上各港口的領事官逐漸成为清地方政令的干涉者,像曾國藩“查办”天津教案就是显著的例子。在1857年清政府竟派了一个美国卸任的公使蒲安臣与英人柏卓安、法人安德善充协理,并以志刚、孙家谷为会办,組成代表

团訪問欧美各国,据清史稿邦交志:“緣蒲安臣充美公使最久,中外交涉,总署深相倚任,故特派往”。这个奇怪的例子很可說明洋人势力已經深入了清廷。

第二、英人赫德任了清政府总稅务司——自太平天国革命发展到長江流域,把清朝的粮源稅源給杜塞了,清政府在財政上很大的程度都要依靠海關稅收入。自五口通商以后,各口皆設海關,各海關都設有海關監督,一向都是清駐該地督撫道台兼任。上海海關於1853年由于小刀会起义,上海道台吳健彰即把海關讓給英法美三国領事來管理,由英人李泰国負总責。后来各港口都照上海海關例子,由李泰国做总稅务司帮办各口海關,1863年李泰国返英,即由曾任宁波領事、广州領事繙譯官、和上海海關稅务司的赫德繼任,1865年在北京設总稅务官署,直属总理衙門,各口海關稅务司均用外人,向赫德負責,形成一个洋人集团,由中央到地方的財政均受其支配。实际上外人掌握了中国海關,也就是中国財政完全操縱在外国人手里。

赫德在英国侵略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取得奕訢的信任和李鴻章的依靠。1863年他建議購買軍艦,奕訢即听命了。1866年他帶了同文館学生三人游学英国法国。派蒲安臣訪問各国也是他的提議。1866年他作了一本“局外旁觀論”,其中一言内情,一言外情,表現他对清朝政治的参預。他曾 是 李 鴻 章 的外交助理。中法战争时他派一个稅务司金登干到巴黎乞和,1867年清朝的云貴四川总督的派遣都出于他的建議。他曾接受清政府的官銜按察使、布政使,受清賞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八国联軍以后,晋封太子少保,最后加尚書銜,在中国做官达五十年。他是一个实际上支配清内政外交的一个紅人。摩爾斯“中华帝国关系史”中說:“总理衙門在那时还没有經驗,所以在一切国际問題上,从商議一个条約到解决一个土地糾紛,都常听取在北京的总稅务司的意見及帮助,各省的总督巡撫道台也經常和各地的稅务司商議,听取其意見而行动。各国的外交人員也总是支持他的威信,赫德爵士及其属下人員由他們的工作而贏得了中国人与外国人的信仰。”

第三、同文館的設立:1861年奕訢奏設总理各国事务衙門的同时,于奏摺中的第五条說到:“臣等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于是籌設同文館,即在总署衙門旁作好館址,令广东上海督撫分派通解外国語言文字之人,携帶各国書籍來京,又选八旗子弟資質聰慧年十三、四岁者入学。計选学生十人,广东上海未派來教員,后由英公使參贊威妥瑪介

紹通汉文的英人包尔騰充当教席，年薪一千兩，后又請汉人教师徐树琳年薪九十六兩，开始學習各国文字。其后由于李鴻章的請求又在广州上海兩地設立外国語言文字学館（广方言館）。美教士丁韪良于1864年譯“万国公法”，总署为其出版，以之作同文館課本。万国公法凡例之四說：“是書之譯为汉文也……視其理足又备，思于中外不无裨益。”所以这些館的設立，其目的是为培养通曉外国語言文字的人，以便于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得更加周到，也可以說是为了培养洋务买办的人才。这里表現清朝誠心实意地开“中外和好”之局。

（3）洋务派的兴起：原来在第一次鴉片战争以后，清朝統治階級曾極力地收拾被外国侵略者所冲击的殘破的封建国家，以咸丰为首的頑固派，純封建性的政治势力，包括滿洲贵族、官僚、紳士、地主及八股士人，都是極力反对維新思想的人，坚决鎮压人民革命的人。但他們遭受了洋人的打击及太平天国的冲击，他們在政治上与洋人和汉族地主武裝势力携起手来，而在思想上學習“洋人”，模仿“洋人”，則仍保持封建自大性，主要是在中国人民面前不肯摔掉它那原有的封建“家法”和威風。同治时的大学士，倭仁上書說“天下之大，不患无力，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西太后那拉氏也是这个人物，咸丰死后，她就承襲了頑固派的首領。但这时的頑固派在政治上主張同侵略者携起手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在财政上依賴关税，在生活上喜好舶来品，这些又都与新兴的洋务派是一致的。他們通过洋务派来为侵略者服务，已經开始了“中外和好之局”。

洋务派的兴起是第二次鴉片战争以后的产物，它的萌芽应由耆英开始，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有了租界，华官、洋官、华商、洋商的交往頻繁了，政治經濟联系密切了，这就是洋务派的社会基础，天津北京两个条約就是洋务派的政治基础，在共同鎮压太平天国中又有了合作的基础。頑固派是不能再以对待耆英賜以自尽的方法来对待洋务派了。小刀会在上海的起义，太平天国革命燒到上海的边緣时，华官、华商依靠上海租界作为避难所，当第二次鴉片战争发生的时候，上海一群“华官”如陆建瀛、吉尔杭阿、吳健彰、薛煥、楊文定等都主張对侵略者投降，及天津条約簽訂以后，北京方面就亦出現如桂良一类的滿洲贵族，主張“联夷”以制內；同时在鎮压太平天国陣綫上的汉族地主武裝曾國藩等，在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咸丰飞召南軍勤王，他竟拒絕派兵，要咸丰“撫夷”，等到簽訂北京条約以后，頑固派对侵略者投降，取得侵略者与之合作共同鎮压太平天国，在这

一种絞杀人民革命事業上，洋务派就正式抬头了。頑固派轉化为洋务派，在北京朝廷方面，恭亲王奕訢主張中外合作，鎮压太平天国革命；在地方实行的是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曾國藩促成洋兵助战，而李鴻章、左宗棠等就亲自率領军队与英、美、法侵略者所組成的所謂“常胜軍”、“洋槍队”联合起来与太平天国共同作战了。所以，这些洋务派包括汉人地主軍閥、清贵族官僚和买办，他們在取得洋人支持及共同絞杀太平天国及捻回苗起义中，越发显得它在清朝反动統治政权中政治比重上是提高了。

清朝廷在对外投降之后，取得“洋人”支持，帮助它把太平天国革命鎮压下去以后，具有实力的汉族地主武裝的洋务派在“洋人”支持之下，走进了遭受革命風暴襲击的垂危的清朝廷，把它支持起来。所謂“同治中兴”正是一股反动的逆流，企圖強化反革命的秩序。开始了向“洋人”学本領，以便对内鎮压。

（4）洋务运动——洋务派的“自强”；

清統治由于汉族地主武裝势力的支持及洋兵的助战才从人民革命起义襲击的危險状态中救了出来，又歌唱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了。一时頗为驕傲自滿，盛唱“同治中兴”的論調，以欺騙人民，实际上，自太平天国革命失敗以后，清政权是由資本主义列强和汉族地主武裝軍閥势力两个大台柱子支撑的反动政权。这就給侵略者更好地开辟了深入侵略的路徑。

第一、外国資本主义繼續深入的侵略：自1860年北京条約簽訂以后，資本主义各国一方面帮助清廷絞杀中国人民革命的起义，另方面根据天津、北京两个条約，趁着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之下所开展的“中外和好”局面繼續他們深入和扩大的侵略。在这个时候，外国資本主义已經用不着战争来取得他們的条約了。1869年又訂了中英新約十六款，善后章程十款，1868年訂了中美續增条約八条附解釋，与俄国又訂了几項东北西北方面划界的条約。1860年以后，还与普魯士、葡萄牙、丹麦、荷蘭、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奧匈、秘魯等都簽訂了新約，他們也都得了領事裁判权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起的国家像日本也于1871年要求清廷与他訂了通商条約三十三条。这些条約的簽訂都有关于內地通商如何便利，收購中国土产如何减稅，洋貨入口如何减免稅項，以及有危害主权划界之事。資本主义各国不但根据条約在中国有了沿海的航行权，而且也有了內河航行权。1865年英国商人在中国設立广州香港澳門輪船公司航行省港及江西，1867年又成立中国航業公司（后称为太古公司），1877年又成立印度航業公司（改称怡和公司），1875年日本的邮船会社即航行上海橫濱之間。这不但是資

本主义国家垄断中国的航業，而且大大地便利于它們的商品輸入內地，可由內地夺取原料运出海外，也开始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进行直接的投资了。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亦在中国开设銀行，1845年英国在香港开设东方銀行，1853年又在香港设麦加利銀行，1857年它的分行即设于上海，1865年匯丰銀行设于香港，1867年它的分行也就设于上海，这两个銀行在中国进行金融的活动，清政府为了剿捻、回、苗起义即向其借外債，他們又成为清政府的债权人，支配清朝的財政，实际上这两个銀行的設立就是对中国进行經濟侵略的主要机关。

第二、洋务派的“自强”运动：所謂“中外和好”局面虽然形成，但资本主义列强經濟政治势力也迅猛地伸入清朝的心房內腑，逐漸地感到清政府不能很有效地为他們繼續扩大侵略服务，而发出怨言来了。英公使参贊威妥瑪在与总理衙門办交涉时竟斥責奕訢說：“中国自周秦以来常說內修外攘，試問至今，內修如何？外攘能否？今不改变一切，恐終不能自立。非独我一人意見，各国官民皆如此說……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又說：“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他又嘲罵总署大臣說“总理衙門大臣，皆喃喃学語小兒耳，击之则号哭，撫之又驕慣，左手打之，右手摩之，乃对中国外交家之善法也。”（类鈔）赫德也作“局外旁觀論”以諷之。这說明资本主义侵略者已經对“中外和好”、“同治中兴”的局面不耐烦了。他們希望对清朝統治按照他們侵略的要求加以改造，使它更能起为侵略者服务的積極作用。他們这种要求在看到奕訢在北京訓練旗兵的样子“只看到半打的射击手在城外打着二十碼远的靶子，那种样子好像十八岁的姑娘一样。这真叫我們国内的射击俱乐部的会员都羞于看見，但中国政府为了鎮压叛乱而有了这样的工具，已頗自滿”（英使館参贊米特福說，引自“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49頁），使他們对自1861年以来以奕訢为首的滿洲貴族洋务派所开始的貴族“自强”的“新政”，大为失望了。威妥瑪說“总署向来遇事，总云从容商办，究是一件不办，說來說去，无非空談。”这时资本主义侵略者看到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軍閥在與他們联合鎮压人民革命起义过程中之傾心“洋化”，举办一些“洋务”，这一点使资本主义侵略者把他們要求改造清朝統治的希望就放在这些人身上。希望把这些人支持培养起来，把清朝的腐朽的統治按照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要求而納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軌道上来。就在外人这样支持和鼓励

之下，曾、左、李等洋务派首領，便踏着屠杀人民的血路，走进了清朝統治陣营，戴上了总督、大臣、大学士等等“高貴”的头銜，一心一意地拜洋人作老师，学統治中国人民的“新本領”，开始他們的所謂“自强”的洋务运动。

在鎮压太平天国及捻、回、苗起义的經驗上及所謂“中外和好”的北京条約簽訂的經驗上，这些搞洋务的軍閥官僚买办們对资本主义各国有兩点基本經驗总结：一是对外信賴，曾國藩說：“洋人入京，不伤我宗庙社稷，可灭不灭，实为大德。”大学士桂良說：“洋人管理海关，每年收入数百万兩，交滿清政府充軍餉，可吞不吞，实在是‘公平’。奕訢說：“逆夷貪利逞强，然以貿易为性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与內地逆匪盜兵作乱者不同。”实在是“犹可信义籠絡，馴服其性。”根据这种信賴，曾國藩作出結論，是“皇上登極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賴守定和議，絕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鄰好，万不得已而設備，乃取以善全和局。”（曾國藩：“奏稿”）这就是对外坚决信賴和投降的結論。另一个就是認識了洋槍火炮的厉害，他們深切認識鎮压太平天国革命及絞杀捻、回、苗起义是使用洋槍火炮的效力，李鴻章說：“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而有余。”又說：“中国欲自强莫如學習外国利器，欲學習外国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具。”（同治三年致总理衙門电）曾國藩、李鴻章及左宗棠这三个地主階級的代表在屠杀中国人民革命起义中成了地方軍閥及洋务派的領袖，在清反动統治中業已勳高位重，他們就依靠他們鎮压人民革命起义的經驗和凭着他們在清朝統治中的政治地位，在“洋人”支持之下，为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秩序，开始了反动的“洋务”运动。

他們办“洋务”應該說是自1860年北京条約簽訂开始。首先就是李鴻章开始洋化他的淮軍：1862年四月李鴻章淮軍八千人由英国輪船七艘运到上海，他曾到英法提督兵船上參觀說“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及。”因之李鴻章就决心“洋化”他的淮軍，他說“惟深以中国軍器远遜外洋为耻，日戒將士虛心忍耐，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又說“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見1863年李致曾國藩書）由此可見李鴻章对“洋化”虔誠膜拜的程度了。于是李鴻章就用黄金雇用洋人数名，分遣各營教練，召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購办制炮器具，又托英法提督代購大炮数尊自其国内寄来。在1862年曾國藩于安庆設一軍械所，造一只小輪船，

順水四小时可达南京，逆水七小时可达安庆，这是造船的开始。1863年由于赫德的建議又由李泰国回国代購軍艦七只，運輸輪一只，請英法軍大尉为軍艦副統，价一百零七万兩。1864年李鴻章就在苏州設立西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得英人机器厂一座能修船炮，价四万兩，后与西洋炮局合并称江南制造总局，自造槍炮，1867年造輪船一只名吉恬。1863年时曾國藩派容閔赴美，1866年回国，由美購買一百数十种机器，均交上海制造总局。1866年左宗棠于福建馬尾設船政局，器材材料由法購来，正副監均为法人，造大小輪船十五只，后来編为南洋水师。恭亲王奕訢在1866年奏請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疏中說：“識時務者莫不采西學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鴻章等深明此理，坚持其說，时在奏讀中詳陳之。”李鴻章自己也自負地說：“今日喜談洋务乃聖之時，人人怕談、厭談、事至，非張皇即鹵莽，豈不誤國。公等何不喜談，鄙人若亦不談，天下賴何术以支持耶？”可見曾、李、左熱切于“洋务”的情形。

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設立機器制造局，同年李鴻章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1869年福建機器局購机建厂，1870年李鴻章扩充天津機器制造局，分設四厂，1877年丁宝楨在成都設四川機器局，1878年左宗棠在蘭州設機器制呢厂，聘德人为技师，制造軍品及普通衣料，1881年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器局。

以上这些都是軍事工業的性質，也都是官办的性質，又是雇用外国技师，由外国帮助而办的。它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洋槍火炮輪船及軍用品以武裝汉人地主軍閥的武裝，藉以鎮服国内。在造船造炮上也有一些成績，但單是这些是不够的，主要地还是由外国購入軍火战艦，就是在国内制造的槍炮輪船的材料也須外国購入，洋人是不會把真正的制造技术交給他們的洋奴的，况且这些官办工業又都是在腐朽的官僚制度管理之下，无不营私舞弊，各飽私囊，而且成本高，質量差。同时由于这些工業的創辦，使得地方軍閥實力加强，清朝頑固守旧派頗不自安，也對他們給了許多掣肘之处，內爭也就火熱起来。初期是頑固派与洋务派之爭吵是否須向洋人學本領的問題，如倭仁一类的人反对“師事夷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等到这些洋务派已經搞起来軍事工業了，西太后那拉氏掌握中央朝政則有意識地放縱頑固派“清議”，并挑撥湘淮兩系軍閥的矛盾，特別是曾國藩于1872年死了以后，李鴻章与左宗棠相互抨击，左宗棠說“李鴻章一門，助伐既高，依附者众，当时随从立功，身致富貴者又各有其亲友，展轉依附，实繁有徒。”李鴻章說：“左宗棠曾國基丙政十載，湘楚旧部視如家乡，

而随宗業者尤多且久。”而李鴻章对清中央那拉氏也有牢騷，他給郭松燾書中說“都中群議，无能謀及远大，但以內輕外重为患，欲收將帥疆吏之权”。1885年左宗棠也死了，李鴻章就独居洋务派的首領，而且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内政外交，得洋人支持，成为晚清几十年的紅人。他的洋务买办事業，在后一期則着重在所謂“致富”，实际上买办的性質越来越强了，也越扩大了，一直繼續到甲午战争前夕。

在洋务运动初期制槍制炮造船中，中国境内出現了第一批的新式工業，但这些新工業由于它的性質及特点，对中国社会經济发展沒有多少影响。

二 洋务派的“致富”

这仍然是洋务运动的繼續，1872年李鴻章接受容閔的建議設立輪船招商局，招收商股。政府特許運漕米，空船減稅等待遇。这在洋务运动中表現了由制槍制炮造船的直接軍事工業轉而开始创办交通運輸事業，这就与社会經济发生联系作用。1878年李鴻章在天津設开平矿務局，資本二十七万兩（1882年加至一百二十万兩），1880年又設电报局，1881年开平矿務局就修筑鐵路二十里，后来延長到六十里，1881年吳大澂在吉林設機器局，1882年李鴻章又奏請在上海設機器織布局。很显然地新工業在扩大中，逐漸超出狹窄的直接的軍事工業的範圍，逐漸地与社会經济发生多一联系。从这里可以看出洋务派由以对内鎮压为目的的軍事“洋化”的“自强”轉到所謂“致富”的“自强”。这是不是洋务派关心了人民的生活呢？不是的，洋务派的“新政”轉到“致富”是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中国社会經济的破坏

自天津北京两个条約簽訂以后，外国的洋貨及鴉片入口更加增多，如英国棉織品在1845年輸入中国价值为一千零七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兩到1876年就达到一千七百三十七万兩，增加了百分之四十。根据海关統計：1864年外貨輸入總額是五千一百二十九万三千五百七十八兩，到1880年已經增至七千九百二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二兩，而且是每年增加，这十七年中有六年出超，而出超仅数百万兩，而入超則达千万兩以上。在入口的价值中有五千万兩是鴉片，对农业及手工業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起着破坏的作用，而且这种破坏由于多开商埠，內河航行，关税减低，已不限于沿海一带而及于內地，已不限于南方，而且也到了北中国。这样就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及手工業結合的小农經济在广大国土上不能維持了，再加上清政府苛捐杂稅的搜刮，这种情形就愈加严重。清史稿食貨志說：

“道光二十二年岁入銀三千七百一十四万兩，岁出銀三千一百五十万兩有奇，咸丰初年，粵匪驟起，捻回繼之，国用大絀，迄于同治，岁入之項轉以厘金洋稅为大宗，岁出之項，又以善后籌防为巨款。”洋關稅1862年为六百六十三万兩，至1881年为一千四百六十八万兩。厘金制度是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誠所創，初在長江流域实行，1855年后遍及全国，紹興一府竟有分局七，卡二十六，驗卡二十二，截船十五，1855年湖北設的厘卡即有四百八十余处。洋稅增加則表示外貨入口的增加，岁入兩項都是吸取中国人民的膏血，岁出的以善后籌防为巨大开支，正是开“中外和好”的善后和“洋务”的开支了。光緒繼位之初，戶部条陈整頓錢糧之策說：“溯自捻髮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錢糧，期可漸复原額，乃考正杂賦稅額征总数，岁計三千四百余万兩，实征仅百四十五万兩，賦稅亏額如此，財政不在国，又不在民，大概为貪官墨吏所侵蝕。”（食貨志）这又說明清廷在鎮压人民革命起又以后，曾經在广大地区作过减低田稅或豁免錢糧的欺騙措施，但到光緒时所謂“正杂錢糧，期可漸复原額”，这正是反革命势力又恢复其剝削程度的表現，所謂貪官墨吏也正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对人民的剝削压迫更加沉重了。而清中央既感国用大絀，則又增加鹽課及厘金。这种沉重的剝削，使生产率大为减低，1877年江督沈葆楨奏：“兵灾之余，乡民自种自食，每戶不过十数亩而止，余地招募客民給以資本，費資多，而交租少，大約从前收米一石者今祇收稻百斤或七、八十斤，碾米不能四斗，稍加催索，則席卷潜逃。”（經世文續編）这不但說明生产率低落，而且地主階級都把农民剝削到了弃地逃荒了。

在反革命破坏下，在反动統治剝削下，在外国經濟急剧的侵略下，在光緒初年即1876年到1879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1876年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湖南五省遭遇水灾；1877年山西、陝西、河南发生旱灾，安徽、江西、直隶又发生蝗灾；1878年广东又发生風灾，江西又有水灾，直隶省的永定河是經常氾濫成灾，死于这几年的灾荒人数統計約有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

中国人民在这样沉重的剝削及灾荒的襲击下，他們还遭受外国資本势力入侵的威胁，这种入侵已經由城市扩展到乡村了，这种入侵是以排山倒海之势，由交通運輸，到商品販賣，到教会的橫行。連反革命大劊子手曾國藩都自供出来中国人民痛苦的情形：“洋人来中国也，广設埔头，販運百貨，亦欲逞彼腹剝之詭謀，隘我商民之生計，軍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五口通商，長江通商生計日盛，小

民困苦无告，迫于餓殍。今要听洋人行鹽，則商場運販之生計穷矣，听洋人設棧，則行店囤積之生計穷矣。听洋人輪船入內河，則大小舟航水手航工之生計穷矣。听其創办鐵路，則車驛任輦，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輪船鐵路等事，自洋人之行之，則以外国而占內地之利。自华人附和洋人者行之，亦以豪强而占貧民之利。”中国人民生活的痛苦，于此可見一般。王邦璽陈时弊疏中說：江西“近因迭遭兵灾，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損傷无算，更兼生計艰难，丁壯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嬰率多溺死，是以閭閻生齿远不逮从前之繁庶。”1878年曾國藩奏“山西壯丁轉他乡，老弱填委溝壑”。这些情形都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業生产力遭受破坏的程度，中国社会經濟遭受到內外反动势力的破坏，使他們把中国作为殖民地商品銷售市場，和使中国劳动人民作为他們納稅人受到障碍，就是說中国人民太穷了，既买不起外貨也无力繳納錢糧了。槍吃子彈，兵吃餉，也就說生产軍火洋化軍隊的洋务运动須要从老百姓身上要錢，可是社会生产力破坏得不堪了，老百姓身上錢从何处来？这是洋务运动“自强”所碰到的問題。当时李鴻章給丁宝楨的信上說：“中国积弱由于患貧，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財賦动以数万計，无非取資于煤鉄五金之矿，鉄路电报信筒丁口等稅。酌度时势，若不早圖变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受其弊者。”正是触到了所謂“致富”問題的本質。

（2）侵入中国的外国資本主义經濟势力要求改造中国封建的經濟結構适应他們侵略的要求：在1866年四月英公使阿礼国与恭亲王奕訢有一次会談，据英使參贊米特福說：“鉄路、电报、違背条約等等，这一切老話已經談过一百次了，恭亲王很煩燥不安，他像一只野兔子似地躊躇，繞圈子，迴避。”这說明他們要求清政府建立鉄路电报，有了鉄路电报这样新的交通工具，对他們商品运入內地既迅速又价廉，电报对他們的商業活动及外交活动更是有力的消息灵通的工具。并且通过这些新事業，他們又可以向其投資，同时这些新事業又可以吸收广大破产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以便于他們榨取这些人們的劳动和把这些人們变成他們商品的消費人。他們既支配了清政权，这些新事業官方办起来，对他們向中国发展势力是有益的，他們恨清政府官員們不善于体会他們的意思，对于鉄路电报这样新事業兴趣不高，他們感到失望。他們現在虽然不能用战争鞭撻清政府，但是在外交上給清政府一个“眼色”，叫这些腐朽的官僚們清醒一下，再給热心洋务的李鴻章一个支持，使通过洋务派扩大一些洋务事業，使封建的經濟結構有

进一步改变，能够把官僚地主商人阶层与这些洋务新事业联系起来，也就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势力联系起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按殖民地方式与外国资本势力联系起来，这样才更有利于他们侵略势力的发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从与洋人合作到洋化自己的地方军阀的实力，已经干了一番军事工业的事情了。但他们干的这些事情遭到清顽固派的非议，顽固派竟把1876年英国商人自己筑的上海吴淞间的轻便铁路说是“怪物”，用二十八万两贖回拆毁了。顽固派不但怕见铁路而且也怕李鸿章这些人实力太大，发生内轻外重之患，想给他们一些阻碍。但这些顽固派是彻底地怕了洋人的“在天津教案时，法国一用战争威胁，顽固派首领那拉氏西太后就把曾国藩请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上来，接着李鸿章也就继续曾国藩而上台了，从此李鸿章就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二十多年，包办外交，天津成了事实上的政府”任高权大。到1872年曾国藩死了，李鸿章就独自担当洋务派的事业了，李鸿章反动的政治地位日高，顽固派也就日益在洋人教育之下而软下来，李鸿章的“洋务”也就更顺利了。

从1882年李鸿章奏请设上海机器织布局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大买办盛宣怀办上海华盛纱厂，这十几年间又增加一些新工业。1882年有商人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十万元，制造各种机器，完全是商办的工业。1884年张之洞在广州设缫丝局，1887年他又设立机铸制钱局及银元局，这都是官办的。1888年贵州青谿县设贵州制铁厂，为官商合办。同年李鸿章又请英国技师建造津浦铁路，长一百七十五里，招集商股，并暂时借外债及官款，为官督商办的事业。1889年漠河金矿官商合办，同年张之洞在广州设广东织布局及制铁厂，为官办的。1890年上海伦章纸厂官商合办。1891年张之洞在汉阳设铁政局及枪炮厂，开采大冶铁矿及萍乡煤矿，完全是官办的。同年上海道台唐松岩在上海设机器纺纱局，官商合办。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设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官办。1894年盛宣怀在上海设华盛纱厂，官督商办。同年湖北又设有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官商合办。

在这十几年间各地新办工业（建厂）二十多个。这些工业是超出了军用工业的范围，而带有商品营业的性质。这里一方面是辅助军用工业如煤矿、铁厂和纺织厂，全与制造军火有关系；另一方面这些工业带有商品营业性质，可以营利，以营得的利润再发展军事工业和向国外购买武器。由于各种工业的兴办，交通运输就必须与之相应地设立，因此有铁路的修筑和轮船招商局的扩大。招商局的船在1877年已经有了十二

只，又从美国旗昌洋行买了六只，共十八只。由于一种工业与另一种工业之间的联系而随带的发展，由于营利而与社会生活需要的联系，这样就必然牵连社会经济有某些变动。为了适应兴办工业的需要，商人祝大椿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就出现了，火柴制造厂也出现了。由于纺织局的设立，而纺纱和缫丝也就出现了，这样一来货币流通量也就增大了，用机器制铸钱也就创办了。随着这些新工业的兴起而外国进口的机器也就增多了，据海关报告的统计，1887年入口三十九万八千四百零七海关两，1890年是四十一万零三百四十八两，1891年是九十万零五百两，1893年是九十三万零六百五十一两。这都说明这时的新式工业是在发展中，中国社会经济在起着变化。

在这些工业创办中的另一种情况，那就是这些工业一大部分还是官办的，张之洞办的全是官办，这些官办工业都是浪费大，营业不好。因为都是官僚主持的“惟好为排场，任意挥霍”，俞赞“卹商论”上说“即如机器织布局，沪上兴办已十余年，今年招股份，明年添资本，屡易其人，无不亏空，而未尝织成一布一事也。”张之洞办的也是局面大耗费多。这里说明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经营不善，贪污自肥的根源，也是促使这些事业失败的原因。梁启超说“世人竟传李文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商铺银号全属其营业云。”同时在这些新事业中也出现另一种性质的工业，就是有私股加入，这总算为封建经济结构中地主官僚大商人开辟一条资本的出路。但因为是官督商办，经营管理及用人行政仍然都掌握在总办、帮办之手，仍然把这种新事业当作个人升官发财的阶梯，所以也无不亏损。“卹商论”里说“故人皆视为畏途，后虽真实可靠者，人亦裹足不前矣。”官办失败，官督商办也失败，于是又出现一类官商合办的，这是李鸿章在1882年倡办机器织布局开始的。官商合办的商也都是与李鸿章一类人物接近的官僚地主商人们，他们依附这些总督大臣“洋务人物”，而这些“洋务人物”借重这些官绅资本成立一些官商合办的事业，但也因官商争权争位争利而不能善其终，普通小商人则是可望而不可及，是被排斥的。最重要的是这时出现了纯属商办的新工业，这就是祝大椿的上海源昌机器五金厂，这是私人资本创办的机器厂，这对于联系中小商人开办小工厂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一类算是中国民族新工业，这一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

在这些洋务的新事业的创办中，还有一种情况出

现,就是技术人才的培养,1872年派遣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第一批派了三十名幼童,繼派一百二十名,1876年李鴻章及沈葆楨又派武弁学生去英、法、德學習海陸軍械技艺,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水師學堂及電報學堂并請丹麥人教授,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即設繙譯館,請洋教士入館繙譯。这样一來西洋科学技术也就随着这些洋务的新事業在很少一部分人中流傳了。

在这个期間造船練兵仍然在进行着,李鴻章1880年在天津設武備學堂,1882年筑旅順港船塢,1885年在天津成立海軍衙門,并建威海衛港,1888年中法战争后李鴻章又成立北洋艦隊,这一切仍然構成洋务事業中的一部分,因此購買外国兵船請外国人教練曾是一时之盛。

最后一点就是資本主义侵略者在創办这些“洋务”的新事業中是怎样的呢?第一、就是他們輸入中国的机器增多了,洋杂貨物入口也增加了。以煤油來說,1880年以前是沒有入口的,到1890年就有了六百万兩的入口,1892年增至七百万兩,这說明城市人口的增加,洋务新事業的需要;同时棉貨入口增加的也很快,1870年是二千二百万兩,1890年为四千五百万兩,1892年就达到五千二百万兩;其他雜貨也增加的很快,1870年是一千万兩,1890年二千五百万兩,到1892年即达三千三百万兩。整个这个时期的入口貨价是:1870年六千九百万兩,1892年一亿二千五百万兩,这說明洋务运动的結果,使得中国吸收外貨的胃口增大了。新的交通運輸工具的兴办,大大有利于外貨入口与广大內地联系起来,到中日战争前夕,連新疆西藏都運銷了洋貨。第二、就是这些洋务新事業依靠外資。1887年李鴻章为了延長津沽鐵路就借外国匯豐銀行一百万兩,在他以前,左宗棠、沈葆楨都向外国銀行借款,这些借款都与兴办甘肅机器織呢厂及扩充福建船政局分不开的。这說明洋务的新事業,外人可以扩大投資。第三、就是这些事業中任用外人。福建船政局正付監督一个是日意格,一个是德克碑,工程師也是法国人,上海江南製造總局即用洋匠八人,它的繙譯館也用英美教士多人,如美教士林乐知,清廷竟賜以五品官級,英国的海軍軍官朗威理即为李鴻章的总教席,汉納根也是他的得力的洋員。这又說明这些新事業的技术管理都操在外国人手里。第四点就是这些事業如有与外人势利发展不利时,他們就給以排挤和打击,招商局即受英太古公司的排挤,他們用減運費的办法使招商局亏本,美国則用它的海关扣留招商局試航美国的輪船。

这样的“洋务运动”,它本身是矛盾百出的,只可說是殖民地化的經濟运动和秩序运动,它的結果是大大

有利于資本主义侵略者,同时也加深了反对它的对立面,它开始时所高唱的“办外交”和“兴工業”的“自强御侮”到中法战争即开始破产,到中日战争时就徹底破产了。所謂外交就是李鴻章的割地外交,所謂工業就是亏本、經濟殖民地化,所謂御侮就是战争的失敗。

但历史的客观进程是按照辯証法发展的,在外国資本主义經濟深入侵略下和官僚买办兴办的新工業的刺激下,中国民族資本主义产生了,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也产生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争將以新的陣容,新的要求推动历史的向前发展。

(上接第52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黃岩县方家楓的方国珍是最先发动起義的农民軍領袖。我們从元史、明史和县志上找到了方国珍在黃岩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丰富材料,并結合教学加以介紹。

教科書上說元統治下的中国社会經濟遭到很大的破坏,灾荒异常严重,县志上就有关于方国珍起義前,黃岩連續发生大旱、大水和疫病的記載。县志上說,“大德十一年(1307年)大飢,民采草根树皮食”;“至大元年(1308年)大疫复飢”;“至正二年(1342年)自春不雨至秋八月”;“至正四年(1344年)秋海滿上平陆二三十里”。这些材料帮助学生具体地理解了教科書上的結論。我們也簡單介紹了方国珍的一些事迹。1348年,方国珍因为繳不出欠租,抗拒元政府的逮捕,就聚众入海宣布起義。起義軍迅速发展,到1352年,歼灭了元台州路达魯花赤泰不华的圍攻部队,泰不华被击斃于黃林港。黃林港就在黃岩北門外五、六里处,是許多学生所熟悉的。

在我們引用了有关方国珍的材料之后,学生們知道了这一次农民起義原来就发生在自己的家乡,对于元末农民起義很自然地产生了特別亲切的感情。

經過这一阶段的工作,我們才比較深刻地体会到卡尔曹夫在小学历史教学法中所講的“我們的周圍尽是过去事物的遺迹。如果能够看到它,那怕是局部看到它,能够直接接触它,对于发展历史兴趣,对于发展爱护历史、并且主要是爱护祖国的情感,有很大的意义”这句话的道理。我們在这方面可做的工作还很多。例如在黃岩双宝珠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宋元以前建筑的县城大寺巷的庆善寺塔,都是講述古代生产工具和建筑术的很有价值的乡土教材。又如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賢兵不血刃地进入黃岩和太平軍余众在黃岩奇田地区坚持战斗到1869年等革命活动都留下不少的傳說和故事。此外,黃岩西乡是解放前三五支隊活躍的地区之一,也一定有許多革命事迹。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搜尋并加以运用的好材料。

一九二五年的广东战争

顧 林

一 孫中山北上前后的广东形势

1925年的广东战争主要包括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战争、平定楊刘的战争、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战争。经过这几次战争，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促进了广东革命政权的軍政、民政、財政的統一，为未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因此，这几次战争表现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如所周知，1924年十月，鎮压商团的叛乱，初步稳定了广州革命政权。是年冬季，中国共产党为了展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起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十一月动身北上，从事取消不平等条约、扫除軍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全国统一问题的革命活动。在这时，广东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巩固的。

当时，广州革命政权内部軍政、民政、財政都不統一。它所統轄的滇軍、桂軍、川軍、湘軍、贛軍、豫軍、黔軍都是外省的軍閥武裝。他們駐于广州的，莫不任意抽捐收稅搜刮人民，甚至開設賭場、烟館，濫取財貨，根本不聽革命政权的命令。他們駐于广东各地的，更是各霸一方，拥兵自重，也根本不把革命政权放在眼中。他們在口头上虽然都表示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实际上却很少不和革命的敌人勾結，成为革命政权的禍患。只有許崇智所率領的粵軍与革命政权的关系較深，但也只不过是一支土著軍閥队伍，并不是革命政权可靠的武裝力量。黄埔軍校那时还没有畢業的学生，直到1924年十一月第一期学生畢業，1925年一月始由軍校畢業生担任軍官組成了两个教导团^①，这两团的兵力才是真正可靠的革命政权的武裝支柱。这样，当时广州大元帅府的实权自然是很有限制的。何况，大元帅府中，孙中山北上以后，代理大元帅的职务由国民党右派胡汉民担任，右派势力相当囂張。一些假左派分子汪精衛、蔣介石之流不是極力和反动势力相妥协，就是正在扩充自己的权势，把革命仅当作一个幌子而已。只有以廖仲愷为首的一小部分左派，才是真正执行三大政策坚决拥护共国合作的革命派，

才是广州政权的真正的革命力量。这样，就连大元帅府内部当时也是危机重重的。

但是，广州革命政权的问题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的革命政权还处在反革命势力的四面夹攻之中。陈炯明占据广东的惠州、潮州、汕头一带，依靠英国帝国主义，并在北京政变之后又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老牌走狗段祺瑞相勾結，时刻准备进犯广州。邓本殷盤据在广东的西南地区，与陈炯明結为党羽，是英国帝国主义謀略广州的另一工具。受日本帝国主义操縱的云南軍閥唐繼堯企圖吞并兩广，独霸西南。在英美帝国主义走狗吳佩孚、孙傳芳支配下的湖南軍閥趙恒惕、江西軍閥方本仁，莫不联合一切反对广东革命政权的反动势力，打算消灭广州革命势力。香港殖民政府更是广州革命政权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積極支持者，处心积虑地企圖扑灭在广东刚刚燃起的革命火焰。

由此可见，广州革命政权的处境，正如当时邓中夏同志所指出的“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形势，仍然是处于内憂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②。这种形势即明显地指出进一步稳定革命政权、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为当时广东革命政权生死存亡的斗争，也是当时中国革命势力能否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国民党右派是企圖和反革命势力完全妥协起来，順着帝国主义和反动軍閥消灭中国革命运动的陰謀办事的。国民党的左派则反对妥协，希望走革命的道路，打破这种危局，但因为缺乏力量，他們也有时犹豫不决。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支持了国民党左派，倡議和领导了1925年的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各次革命战争，使在軍事上胜利完成了这项革命任务，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上述广东战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① 一个战士：“广东前敌通信”，“向导周报”第一一〇期。

② 邓中夏：“省港罢工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7頁。

二 第一次东征陈炯明

1924年底1925年初，英国帝国主义即给予陈炯明以军事援助，指使陈炯明进攻广州；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一方面在北方以善后会议打击孙中山，在广东也给予陈炯明以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由日本东方通讯社大肆宣传孙中山病危，惑乱人心，使陈炯明得以迅速动员推翻广州政府的力量。1925年一月底陈炯明的军队威胁到广州，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共产党人领导了国民党左派反对了右派妥协的主张，在1925年二月一日决定东征陈炯明。这时，共产党人对广东的工人和农民发出号召：

“我们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我们现在更应无条件的帮助广州政府打倒这不知羞耻的叛贼陈炯明”；并向广州政府指出：“你们应完全信任工农，武装工农”，“工农群众是革命的真正保卫者”^①。这就不仅动员了广大工农群众来支持和参加东征战争，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而且也给国民党左派很大帮助，使他们看到进行革命战争的坚实力量，坚定了他们东征的决心。

第一次东征的战争，是在陈炯明于帝国主义指使下企图消灭广州革命政权和扑灭中国革命运动的进犯中进行的，其性质乃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保卫革命的革命战争。在第一次东征的战争中，陈炯明的全部兵力约七、八万人，其中主力军有叶举、洪兆麟、林虎的三部分约三万人。广州政府方面，全部兵力约有十万人，其中服从指挥坚决作战的只有黄埔教导团两个团约三千余人和一小部分粤军。敌人的军事力量是占优势的。当时广州革命政府的布置是分三路进军：左路由杨希閔的滇军范石生、胡思舜部负责经河源、老隆进攻五华、兴宁的林虎防地；中路由刘震寰的桂军和一部分滇军负责进攻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右路由黄埔教导团及粤军负责沿海东进，攻取叶举的防地淡水，进而进攻洪兆麟的防地再夺取潮、汕。但在东征攻势展开以后，左、中两路不仅停顿不前作壁上观，而且有意地配合陈军的进犯阴谋使右路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而被消灭。只有右路军才真正与陈炯明的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史实说明了黄埔学生军这支革命武装，在东征中曾负担了全部的军事任务。

右路军连同粤军总共不过一万多人，何以能负担起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呢？首先就是因为其主力黄埔学生军是在共产党人正确的革命政治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以共产党人为主干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随军作战，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等在战争进行中进行了重大的政治工作。共产党人不断教育这次革命军要保护

工农的利益，要爱护人民；也不断教育各地人民要组织起来，保卫自己保卫革命^②。革命军的青年战士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每次战斗中都起着骨干的作用，表现了英勇无惧的革命气魄。其次，就是因为这支人数不多的革命军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特别是东江农民群众的支援。在战争开始时，东江农民“早已得到彭湃的秘密通知，说东征军不久便要打到东江，打到海陆丰，要总动员起来配合东征军战斗，要打垮军阀、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农民得到这好消息，遂即准备战斗”^③。东征攻势展开以后，“东江农民纷起扰乱反革命军的后方，工人发传单，敬告同伴共起打倒陈炯明”^④。当革命军前进时，有的铁路工人把反革命军队的情况报告给革命军，有的掘毁铁道，直接配合作战。当陈炯明军队溃败时，“英勇的农民到处袭击、尾追，放火烧山，破坏桥樑，漫山遍野飘扬着红旗，轟响了土炮声、枪声、号角声、口号声，革命的浪潮在大地上翻腾了起来”^⑤。第三就是因为这两团学生军“多属工农子弟，有觉悟的贫苦学生，他们所受外力和军阀的压迫比任何阶级要严重，所以革命战斗的精神格外坚决”^⑥。东征主要战役都是这两团人作先锋、当正面出生入死，和顽敌厮杀，有的“打伤了头，扯了自己的衣襟好，伤了腿，解了绑腿紮过，又起来指挥士兵前进”，有的“伤了很重倒在地上不能起，还要大呼前进”。而且，“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嫗妇孺，喜而挤观”^⑦。东江人民都说这是民国来仅见的“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仅以两团学生军为主力的右路军在东征中才能每战必克每攻必取。二月五日取东莞，十日进占樟头平湖，十一日克广九路全线，十五日攻取淡水。在猛攻淡水时，学生军“围攻了一夜还不見敌人投降，便大家性急起来，自願充当奋勇队登城的，片刻間得二百多人”^⑧，結果把叶举所部全

① 和森：“孙中山病后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阴谋”，“向导周报”第一〇一期。

② 参阅张秋人：“广州的青年革命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第89页。

③ 鍾貽謀：“海陆丰农民的八年战斗”，“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一期。

④ 同②。

⑤ 同③。

⑥ 和森：“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向导周报”第一〇六期。

⑦ 同④。

⑧ 一个战士：“广东前敌通信”，“向导周报”第一一〇期。

部歼灭。跟着在二月二十日大战洪兆麟精锐部队于仙人石，二十二日取平山，这两次战役又把洪兆麟部打得七零八落。从此，学生军更乘胜直进，三月六日抵揭陽，同时也攻克了潮州、汕头，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右路军的作战任务。

在右路军胜利前进、洪兆麟部几被全歼的时候，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已经传来，学生军异常悲恸。但这时左路真军却故意后退，让路给林虎部南下增援，企图一举而消灭这支革命武装。“林虎闻学生军奋勇善战，尝笑曰：‘咄！何物学生军，不过小孩子胡闹把戏而已，你们看我杀他个片甲不回’”^①。可是，在三月中旬棉湖一战，学生军以一团的兵力战胜了林虎八个团近万人的兵力，并在第二团和粤军增援后，追敌百里，将林虎部打得溃不成军。学生军以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纪念了孙中山的逝世。林虎在战败后退守五华、兴宁，学生军这时一天行军一百三十余里，在三月十九日乘势占领了五华，又在二十日冒雨攻克了兴宁，林虎部几乎全部被歼，残部逃往江西边界。在东征胜利声中，驻在惠州的楊坤如部便也准备向桂滇军投降。从此，三年打不破的陈炯明反革命势力，已接近完全复灭。这就是第一次东征所取得的胜利。

当时，蔡和森同志曾指出：“这次东江战争的意义，不仅打倒了一个恶劣的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的爪牙，不仅挽回了革命运动的危机，而且开辟了一个革命军事行动的新纪元，使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今后得逐渐离开雇佣军阀的旧关系而确立于真正的革命的武力之上。”^②但由于这时云南唐繼堯联合楊希閔、刘震寰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又加紧布置了另一推翻广州革命政权的阴谋，使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成果没有巩固下来。

三 平定楊、刘的战争

在第一次东征进行之际，1925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云南反动军阀唐繼堯及广州政府内部的一些反动军阀楊希閔、刘震寰等串通一气乘机加紧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唐繼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当他尚未遣兵入桂之前，得到日本大批军火援助”^③。1925年二月孙中山病危，唐繼堯乘机进攻广西占领南宁，这时“其一切军事进行计划，纯系他的军事参谋日本人山原氏为他运筹帷幄”^④。三月以后，唐军一路向梧州、一路向粤南钦廉方面进攻，十七日又突然声言就大元帅府副元帅之职，其进攻广州推翻革命政权的企图已经公开表示了出来。就在唐繼堯开始进军广西的时候，桂系军阀刘震寰曾亲赴云南与唐繼堯勾结起来；而在东征胜利声中楊希閔也与唐繼堯互

相有了联络。楊希閔和刘震寰的军队原来都驻于广州和广州附近，他们在与唐繼堯勾通之后，即开始把军队由东征前线撤回广州，准备充当唐繼堯的内应。因此，唐、楊、刘的反革命联合遂构成广州革命政权的又一重大威胁。英国帝国主义对这个反革命势力也是给予很大援助的，而广东其他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人物更都支持和参与这个反革命的联合，香港就成了他们公开活动计划推翻革命政权的场所。五月十七日左右“联唐派曾在香港皇后酒店六十号开会。楊希閔、刘震寰、馬素（按馬素公开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政客）、陈廉伯（按陈即反革命商团的主角之一）均亲自出席；唐繼堯、段祺瑞、林虎、陈炯明、邓本殷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都有代表参加”^⑤，刘震寰并曾函约孙科、張繼出席会议。这个会议就是各种反革命力量阴谋联合企图进攻革命政府的会议，在会议上楊、刘得到了陈廉伯五十万元的援助。此后广州政府的形势遂日趋严重起来。

广州政府对楊、刘的反革命的活动，是早有所悉的，“东征军克复兴宁时，在林虎司令部内，发现滇军楊希閔等与林虎等陈军私通的密电；此外又发觉了刘震寰亲往云南，约唐繼堯派军队由广西来进攻广东”^⑥。但是国民党右派胡汉民等和假左派汪精卫等却都打着与反革命势力相妥协的主意，不但未即早准备反击的措施，相反“当楊希閔、刘震寰还在香港的时候胡汉民曾派邹鲁（按邹为国民党右派政客、广东大学校长）赴香港劝駕，汪精卫且亲自出马。及楊希閔返广州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按在五月）顾养园连开两次重要会议，出席者有楊希閔、刘震寰、廖行超、赵成樑、胡思舜、胡汉民、汪精卫、譚延闓等，这两次会议十分秘密，其内容外间无从知道，但……总不外是妥协”^⑦。在这种危急关头，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广州政府请愿，要求广州政府下令讨伐楊、刘，肃清内部。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在群众力量推动之下，以廖仲愷为首的国民党左派这时在汕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才决心

① 参阅張秋人：“广州的青年革命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第89页。

② 和森：“广东反革命势力的覆灭”，“向导周报”第一〇六期。

③ 亦农：“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向导周报”第一一八期。

④、⑤ 同③。

⑥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678页。

⑦ 同③。

从东江回师平定楊、刘。

平定楊、刘的战争，因为楊、刘与唐繼堯是反革命联盟，而唐繼堯又处于盟主的地位，所以当时也有人称为反唐战争。这次战争也是以稳定广州革命政权保卫革命为目的的革命战争。当时战争的对手虽然是楊、刘，但楊、刘的联盟者则是英日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反对广州革命政权的中國各派反革命势力。平定楊、刘战争双方的形势是：广州已純然处于楊、刘反动軍閥范围之下；而广州政府则以朱培德、譚延闓、程潛的部队鎮师北江，李福林鎮师河南，李济琛鎮师西江，对楊、刘采取三面包圍的形势，另調东征軍回广州，作为进攻楊、刘的主力。战争开始于六月六日，这时双方已完全立于敌对的状态，但东征軍对楊、刘叛軍的正式进攻则在六月十二日，只經過了一晝夜的激战，便把叛軍全部歼灭了。东征軍在平定楊、刘的战争中所以能这样迅速的取得胜利，固然是由于革命战士的英勇奋战；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广州工农群众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对东征軍給予極大的支援，粵汉鐵路工人罢工截断叛軍的聯絡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此外，当时正是“五卅”爱国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之际，香港工人正在醞釀声势壮大的反帝罢工斗争，也都是这次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平定楊、刘战争的胜利是1925年中国革命势力在广东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第二次有力的打击。它对稳定革命政权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广州政府得到稳定，就给省港大罢工的展开提供了很有利的条件。1925年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罢工正式开始，香港罢工工人总计达二十五万多人，其中有十三万人陸續回到广州。此后他們便和广州工人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战斗队伍，成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最坚强的柱石。

平定楊、刘战争的胜利不仅稳定了广州革命政权，而且促进了广州政府軍政、民政、財政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議下，七月一日把“大元帅府”正式改組成为“国民政府”。同时，国民政府以黄埔軍校学生为骨干，將所有参加革命的部队均改編为“国民革命軍”。国民政府还接管了各軍防区內的財政，此后各項捐稅統一由国民政府征收，各軍粮餉也統一由国民政府供給。广州政府从分裂的局面向着统一的局面发展。但是由于当时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錯誤，国民政府虽改为委員制，但共产党人却没有参加这个政权机关担任負責工作。国民革命軍中共产党人虽担任了各軍、各部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却没有派人担任軍事的领导职位，这些职位仍多由旧軍官所掌

握。这样，也就是沒有确保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又在国民政府內部勾結胡汉民和許崇智进行陰謀叛乱。美国帝国主义曾用“文華堂”的名义，拿二百万元收买胡、許，企圖叫他們发动政变，推翻国民政府。但这一陰謀被共产党人发觉，遂动员省港大罢工工人和广大人民，于八月十一日举行了肅清內奸运动，要求国民党肅清胡、許等反革命分子。但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动摇不定，不敢下手，这就使胡、許的反革命活动更加囂張起来，胡、許的党羽受了香港殖民政府的收买于八月二十日竟然刺杀了国民党左派領袖廖仲愷。此后，国民党左派才在共产党人领导之下，依靠工农群众的支持，解散和改編了粵軍，并把胡、許赶出广东，广州国民政府軍政、民政、財政的统一遂基本完成。

平定楊、刘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一次胜利，而且也促进了兩广的统一。楊、刘的失败，斬断了唐繼堯在广州的魔爪，跟着广州政府就援助广西另一个地方軍閥李宗仁、黃紹竑的队伍在南宁打败了唐繼堯。1925年七月初唐軍退龙州回往云南。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广西李、黃也不能不向国民政府靠攏，1926年春兩广地区遂告統一。

四 第二次东征和南征的战争

“卖国亲日的段祺瑞以大批金錢勾結陈炯明、林虎，运动他們于广东革命政府反唐軍事紧急的时候，反攻东江”^①，因此，陈炯明殘部，乘东征軍回师广州靖乱之际，由刘志陆率領闖回潮、梅一带。惠州陈炯明部下楊坤如本已投降，現在又反了過去，这时候，“逃匿在港澳的和潜伏着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地痞也紛紛的跑回来、鑽出来，勾結陈匪到处杀人、搶劫、敲詐”^②。一时东江一带几又全部陷于陈炯明的白色恐怖之中。但陈炯明終究未能直接配合楊、刘作战，其原因就是他虽然乘机再占东江，却只能占着若干城鎮，广大乡村的农民自衛軍和农民仍坚持与之进行極其頑强的斗争。只海、陆丰一带，农民与反革命势力斗争中，就有三百余人牺牲，农民的領袖共产党员李劳工同志就是在这时英勇牺牲的。

楊、刘平定以后，在国民政府內部反革命派进行

① 亦农：“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向导周报”第一一八期。

② 鍾貽謀：“海陸丰农民的八年战斗”，“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一期。

暗害活动的同时，香港殖民政府又給陈炯明三百万发子弹和大批现款，并使其糾集盤据广东西南的邓本殷和駐北江的川軍（熊克武率領）从东、西、北三面进攻广州，段祺瑞不但助陈軍餉而且还派軍艦兩艘助战。这就是1925年帝国主义指使其走狗妄圖消灭中国革命运动、打垮广州革命政权第三次的主要军事行动。在这次的陰謀活动中，帝国主义和反革命軍閥所使用的手段更为卑鄙和狠毒，他們勾結土匪擾乱国民政府的轄区，并特派了若干土匪在广州專以鬧案子擾乱人心。帝国主义对这次陰謀活动是有着極大的期待的。从此可知，国民政府打破这种局面的战争，也是为了更巩固革命根据地保衛革命的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

国民政府对这次战争的布置是这样的：以主力用于东江方面歼灭陈炯明的全部軍；以四軍十一师陈銘樞部防守南路；以二、三兩軍解决北江的川軍。1925年九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东征，十月四日在广州便扣留了川軍头子熊克武，跟着二、三兩軍乘势將駐于北江准备来犯的川軍击潰。至东江方面，东征軍共分左、中、右三个縱队，中路攻惠州，右翼攻海、陆丰，左翼攻河源。东征軍“組織了偉大的政治宣傳队，設立东征軍总政治部，以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①，負担了对本軍、对敵軍和对民众的三方面的革命宣傳工作。

1925年十月五日东征軍出发。当时，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們即給予重大的支援，“組織运输队，运输輜重，接济前敌；組織宣傳队，随从大軍向民众宣傳；組織衛生队，救护战場伤亡將士。罢工糾察队請纓出征，上陣杀賊，政府責令巩固后方”^②。的确，东征的后方确賴有罢工糾察队而得保安定的。特别是罢工工人負担了运输的責任，一方面使革命軍“不筹餉，不拉夫”的口号得以实践，另一方面也使革命軍行軍神速接济充沛，極大地帮助了东征的胜利进军。

此次东征軍的作战方針是全歼敌人不使逃窜，因此，战争一开始就是非常激烈的。中路軍十月十三日开始进攻惠州，經過激战，十四日“我步兵即由竹梯攀登入城，楊坤如負伤遁去”^③，惠州遂下。跟着，在二十三日便攻占海丰，二十六日又占領了陆丰。在海、陆丰的战役中，“农民奋起截击包圍，在‘搶夺槍械来武装自己’的口号下，勇悍的农民有的徒手搏战，战斗比第一次东征更为酷烈”^④。在第二次东征中，农民这样積極地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又是东征軍战胜頑敌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中路軍占領海、陆丰的时候，右翼軍已进至紫金，左翼軍已进至老隆，所遇洪兆麟、林虎、李易

标殘部，均被国民革命軍歼灭。此后，十一月五日国民革命軍已进驻潮、汕，七日又克饒平，九日再下大埔，陈炯明的殘部自此即被完全消灭，第二次东征遂告全胜。

在第二次东征进行之初，陈炯明令邓本殷由南路进攻广州給予策应。一时，陽江、罗定、云浮等县相繼失守，南路战局頗显紧张。但北江方面川軍很快地被击潰，第三軍即回师南援，东征軍也調回一部参加南路作战，这样南路战事始轉危为安。1925年十二月南征軍繼克高州、雷州、欽州、廉州，邓本殷殘部逃往海南島。次年二月，国民革命軍占領海南島。广东全省遂告完全統一。

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势力为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的胜利，也是进一步稳定革命政权的斗争的胜利。它正是1925年中国革命高漲的主要标幟之一。

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争的胜利是1925年广东战争的碩大成果。通过1925年广东战争整个过程来看，这几次战争不但是中国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与一切公开敌对的反革命势力的斗争，而且也是革命陣营里粉碎内部反革命陰謀的斗争。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国民党的左派、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与一切敌人进行了頑强的战斗，才得到胜利的成果。事实說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1925年广东战争能完成其革命任务——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任务的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当然，中国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員在战争中所起的先鋒作用，革命战士們英勇杀敌的革命行动，曾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迅速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的工人在战争中的强有力的支援，給革命战争树立了取得胜利的柱石；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广东农民群众在战争中積極支持和配合作战，也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1925年广东战争培养、鍛煉和扩大了革命武装，提高了工农群众的觉悟并很大大地发展了广东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推动了国民党左派的进步，完成了革命政权軍、民、財政的統一，也基本上确立了国民政府轄区的比較稳定的秩序，这都为行將到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① 泰濤：“东征紀略”，“政治周报”第三期。

② 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經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2頁。

③ 同①。

④ 鍾貽謀：“海陆丰农民的八年战斗”，“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一期。

日俄战争的发生、原因和性质

Н·И·普罗科宾科

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它最高和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已基本结束了世界领土的分割。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为了重新分割已经瓜分了的世界而进行了疯狂的斗争。

这种斗争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作用。根据这一法则，现代的垄断资本主义力图用剥削本国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破产、贫困的方法，用奴役和不断地掠夺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的人民的方法，用战争和国民经济军国主义化的方法，来保证资本主义的最大利润。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展极不平衡，争取重新分割已经瓜分了的的世界，争取重新分割与国际舞台上已经发生变化的经济和军事对比关系相适应的殖民地、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的战争，就成为不可避免了。

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国家争取统治太平洋区域和分割中国的斗争加强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初期帝国主义战争之一，是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以及力图分割亚洲、确立自己在太平洋区域统治权的列强——美国、英国、日本和帝俄——利益冲突的结果。

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利用日本，这就是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时美帝国主义者远东的政策特征。美国政府在争取美国资本垄断中国、朝鲜和俄国远东的斗争中，力图依靠日本军国主义。

早在上世纪前半期，美国已开始了太平洋区域的扩张政策。证明这点的有：1844年和1858年迫使中国缔结的条约^①，根据这些条约，美帝国主义者使用中国的苦力开展了商业；美国对朝鲜的扩张，并在1882年与它缔结的不平等条约^②；侵占夏威夷等太平洋上的岛屿；企图侵占台湾。这还远没有完全列举出表明这个时期美国在远东方面的政策的种种行动。

从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加紧自己在太平洋区域的侵略政策。1898年，美国发动了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第一次重新分割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侵占了菲律宾。这只是美帝国主义者

侵入亚洲的第一步。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已执行了鼓励日本侵略势力的政策，唆使日本反对中国、朝鲜和俄国。美国执政当局鼓励日本侵略俄国的意图，指望它与俄国——在掠夺亚洲人民的勾当中美国的竞争者之一——发生冲突，指望制止或削弱其他列强侵入亚洲市场，利用日本作为远东的可能的盟国。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政策，是促使日俄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帝国主义者认为俄国是自己远东的主要竞争者，因此，唆使日本反对俄国，指望日本和俄国相互消耗，在远东造成“均势”来保证美国的统治地位。

英、法、德帝国主义者都积极参与了争取统治太平洋区域的统治地位，争取分割朝鲜和中国的斗争。但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强盗——日本，当时在远东表现出最贪婪的侵略野心。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酝酿着建立“大日本”的计划，包括侵占太平洋区域的许多土地，侵占中国沿海、蒙古、满洲、朝鲜、堪察加、库页岛、俄国沿海和外贝加尔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视线，首先朝着当时处于中国主权下的朝鲜。按照日本侵略者的企图，朝鲜必须成为进攻俄国和中国的基地。

日本在它侵略远东的计划中，与帝俄发生了冲突。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俄国也成了帝国主义强国，虽然应该着重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得很快，整个说来，俄国资本主义是落后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落后表现于俄国工业低下的技术水平，表现于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就是发展的资产阶级经济的特征与半中世纪农奴制关系的落后形态，与地主阶级的统治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况，使俄国资本主义以及整个国家经济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对外国资本处于半殖民地的依赖地位。

从阶级观点看来，俄国帝国主义的特征是：“以

① 指中美望厦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译者

② 指美朝条约。——译者

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掌握着政权，他们与获得欧洲空前未有的利润的财政资本巨头紧密地结成联盟，并締結了有利于后者的对外政策的掠夺性条约。”①

俄国的帝国主义大量地結合着国内首先是农业方面的封建农奴制残余。因此，从俄国帝国主义的特征和阶级結構看来，它并不是最新型的典型帝国主义，而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由于壟断和财政资本在俄国的经济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意义，沙皇专制政体在它对内和对外的政策上，不能不估計到这些势力的利益。体现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沙皇政府投入了争取远东国外市场的斗争。

为了这一目的，也为了保障远东地区的国防，在1891年，同时从车里雅宾斯克和海参威兩地兴建长达七千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

西伯利亚铁路建筑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就企图侵占亚洲大陆上进攻中国和俄国的基地。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的封建割据，军事上没有准备，以及朝鲜的人民起义，不宣而战地进攻中国，并迅速地迫使它投降。根据馬关和約，中国不得不把台湾島、澎湖列島、包括要塞旅順口和大連灣的辽东半島割讓給日本；此外，日本又迫使中国偿付共計二万万兩的巨額賠款。法国、俄国和德国干涉了远东的冲突。1895年四月二十三日，俄国在法国和德国支持下，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日本把包括要塞旅順口的辽东半島归还中国。日本耽心与这些强国发生冲突，只好讓步。因此，俄国在1895年干涉了日本对中国的扩张。

俄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实现其侵略计划的主要障碍。修訂了馬关条約后，日本就准备与俄国作战，开始狂热的军备竞赛。从1895年至1903年，日本陆军人数增加到三倍，海军軍艦吨数几乎增加到五倍。

这个重整军备的财政方案，不仅依靠取自中国的三亿六千四百万日元賠款以及居民納稅的增加，而且也依靠希望日本与俄国发生军事冲突的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慷慨援助。美国和英国政府共借給日本七亿二千四百万日元，相当日本进行对俄战争一切費用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日本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島是分割中国的开始。利用中国军事上薄弱以及統治阶级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者开始以租借方式掠夺中国。德国侵占膠州灣，英国侵占中国的港口威海衛。1896年，在莫斯科簽訂了关于反日防御同盟和建筑中东铁路的中俄条約。1898

年，俄国根据条約得以租借二十五年旅順口和大連港。

美帝国主义者因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中国夺取势力范围，就宣布“門戶开放”原則，把它作为自己侵略政策的主要方式。美国依恃自己工业力量的日益增长，企图在这一斗争中排擠其余的帝国主义国家勁敌，占有整个中国市场。

帝国主义强盜的不断掠夺和分割中国，殖民地压迫的加强，引起了反帝反封建运动——义和团起义，这是人民群众对不堪忍受的外国压迫和国内奴役者的抗議。这个运动在1899年开始，而在1901年被镇压下去。它爆发于中国东北部的省份——山东和直隶，那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宰割奴役特别殘酷。起义蔓延到了滿州，建筑在该地的中东铁路遭受了破坏。1900年六月，起义者进入北京，圍攻使館区。正規軍部队也轉到起义者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一起給予中国反动政府最大的帮助，使它不致于垮台，然后把它变作自己的工具。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德国、奥匈帝国、意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联军殘酷地镇压了这次人民反帝起义。首先进入北京的是美国的海军部队。对起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摧殘。中国的首都被占領并且被洗劫一空。

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对中国人民展开了猛烈的沙文主义的攻击。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的强盜行为，被“黄禍”、“中国人敌視欧洲文化”、“文明使节”等伪善的叫囂掩饰了。

在这种猛烈的沙文主义的攻击声中，偉大的列宁表达了俄国无产阶级对中国劳动群众的兄弟般的感情。在他发表于第一期“火星”上的“中国战争”一文中，列宁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关于中国人敌視欧洲人的誣蔑的說法，痛斥欧洲各国政府同沙皇专制政体一起对中国执行的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列宁又着重指出，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之間是没有仇恨的，他們都受着共同的敌人——劳动群众的剝削者和压迫者——的折磨。“因此一切觉悟的工人都負有責任”，列宁写道，“用全部力量起来反对那些煽动民族仇恨、誘使劳动人民忽視他們真正的仇敌的人”②。

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镇压了中国的反帝起义，并没有消除列强之間的根本矛盾。反之，列强之間爭取統治中国的斗争，却更为激烈了。

国际帝国主义在殘酷地镇压了解放运动之后，强迫中国人民接受掠夺性的“最后議定書”，按照議定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俄文版，第111頁。

② “列宁全集”第四卷，俄文版，第351頁。

書，中国必須償付給侵略者一笔巨額賠款。美国等列强取得了在中国若干城市駐兵的权利。

沙皇不愿自己在远东的劲敌——美国和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加强，在北京談判时不支持“最后議定書”上对中国的这些难以負担的屈辱的要求，不仅提議一切外国军队撤出北京，而且首先撤出了自己的军队。从北京撤出的俄国军队沒有参与国际討伐队，这个討伐队迄1901年四月为止，一直在中国干着搶劫燒杀的勾当。

1903年，美帝国主义者公开地走上策动日俄战争的道路。在軍事行动开始前一个月，美国政府正式对日本保証說，美国“在发生战争时，將站在日本一边”。

英、法、德帝国主义者在日俄战争中也起了卑鄙的作用。

1902年，日本和英国簽訂了反俄同盟条約，虽然美国政府沒有公开地参加这条約，但是它暗地支持这个同盟，与这些强国組成反俄統一战綫。

在整个日俄战争过程中，美国 and 英国政府大大地違反了它們所宣布的中立，以借款、煤、石油、武器、战略原料援助日本。

俄国最可指圖获得援助的法国，在战争开始时对日本采取了友善的中立。事实上，法国当局在战争期間以武器供給日本，粗暴地破坏了这种可以称許的友善的中立。

德国当局願意削弱俄国，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德国的外交地位，尤其是在欧洲。德国醞釀着发动奴役和消灭欧洲人民、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計劃。因此德皇威廉二世竭力使俄国在远东受到最大的挫折。

日俄战争是在俄国外交上孤立的情况下开始的。日本发动对俄战争时，它拥有和英国的軍事联盟，又依賴美国的積極支持。

按照它的性質，日俄战争無論在日本方面，或是帝俄方面來說，都是帝国主义战争。

沙皇政府企圖以这次战争扩大国外市場，夺取朝鮮和滿洲为已有，以迎合大资产階級和一部分最反动的地主。恩格斯在1891年談及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时指出，这种政策是与俄国国内市場狹小有关的。

沙皇政府发动对日战争的企圖，被它对国内日益迫近的偉大的人民革命的恐惧加强了。沙皇的部長普列維(Плево)曾宣布，必須参与一次“穩操胜算的小規模战争”。沙皇專制政体打算以这种穩操胜算的小規模战争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制止国内革命的高漲。但是沙皇專制政体的这种打算落空了。战争更加

动搖了沙皇制度，加速了国内革命的发生。

至战争进行时，沙皇專制政体不仅在外交方面，而且在軍事技术方面也毫无准备。軍力狀況反映了俄国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落后。下一事实証明了俄国在軍事技术上缺乏准备：开战以后，俄国陆军參謀本部甚至沒有滿洲和朝鮮的地圖，几乎不得不盲目进行作战。

早自彼得一世时起，俄国的炮队即以射击准确著称，炮手都非常勇敢，但不習慣从掩蔽的陣地进行射击；当时缺乏最合宜于战場地形条件的山炮。炮队仅有榴霰彈，甚至沒有配备炸毀土筑的碉堡用的榴彈。军队沒有足够数量的机关枪，聯絡多半借騎兵通信員維持。

战争开始时，海軍建設方案尚未完成。太平洋艦队中，巡洋艦不足，水雷艇尤其不足。但是列宁曾指出，海上是否占优势的問題，在日俄战争中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这一切都是由于俄国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反动的沙皇制度阻碍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冶金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比較薄弱，决定了低下的軍事工业潜力。

紀律性、坚强、勇敢、机智——所有这些俄国士兵的高貴品質，不止一次地給俄国的武力带来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沙皇政体以它的反动政策使尽一切手段扼杀俄国士兵的这些高貴品質。整个教育制度和軍事訓練制度，都是为了把俄国士兵变作沙皇政策的盲目工具。

在說明帝俄軍事上的落后时，列宁在“旅順口的陷落”一文中写道：

“將軍和統帥都是些庸碌的廢物……文武官僚也同农奴制度时代一样，都是些貪污的寄生虫。軍官們淺薄、低能，未受訓練，与士兵缺乏密切的联系，得不到他們的信任。农民大众的愚昧无知、备受压迫，也可怕地暴露无遺……”^①

战略的情况同样也非常不利：军队、軍服、軍需品、粮食，必須从一万公里外調来。

日本在俄国布置有健全的諜报机关，因此事先就知道，它將面临一个准备不足的敌人，因此毫不畏惧地进行这次战争。

1904年二月六日，日本宣布断絕外交关系，二月七日夜間，日本艦队不宣而战地向停泊在仁川和旅順口外的太平洋艦队襲击。东方的总督阿列克塞也夫(Алексеев)和陆军司令官斯达克(Старк)在保証艦队

① “列宁全集”第八卷，俄文版，第35頁。

的安全方面一点事情都没有做，甚至夜间没有布下避雷网。大部分人员都到岸上去了；船上仅留下年轻的值日官，年纪大些的军官当夜都在庆祝斯达克妻子的命名日。

日本舰队驶至近处，为所欲为地射击太平洋舰队。头等的两艘战斗舰“列特维赞”号（Ретвизан）和“采萨列维区”号（Цесаревич）以及巡洋舰“巴拉达”号（Паллада）顿时丧失了战斗能力。

战争的第一日，巡洋舰“瓦良格”（Варяг）和炮舰“朝鲜人”号（Кореец）在仁川附近遭受袭击。经过了力量悬殊的战斗，巡洋舰“瓦良格”号被舰上人员击沉，“朝鲜人”号被炸毁。日本统帅部向自己提出了任务：争取海上的统治权，借此保障军队在朝鲜和辽东半岛各地登陆对俄国陆军主力作战的可能性。

二月二十三日，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俄国海军引以为荣的海军上将马卡洛夫（Макаров）来到了旅顺口。他使舰队作好了战斗准备，但是在三月三十一日企图作战并突破包围时，马卡洛夫在铁甲舰“彼得洛巴夫洛甫斯克”号（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上和司令部以及舰上人员一起牺牲了。舰队被封锁在要塞中。在两次突围，联合海参威舰队的企图都失败了以后，水兵们并入了陆上的军队，以船上的大炮增强要塞。日本取得了海上的优势，即开始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登陆，以图包围旅顺口。血战开始了，沙皇的军队屡战屡败。

1904年十二月二十日旅顺口在血战以后放弃了。要塞的指挥官斯捷谢尔（Стеessel）是一个叛徒。遭受了数次失败，沙皇的军队最后在沈阳附近被击溃。在这次战役中，双方参加的有六十万人以上。由于库洛巴特金（Куропаткин）将军和卡乌尔巴尔斯（Каульбарс）将军的怯懦和犹豫不决，战役失败了。三十万沙皇军队，在这次战役中伤亡被俘一共损失了十二万人。

接着，从波罗的海调来援助被围的旅顺口的沙皇舰队，在对马海峡遭到了全军覆没。对马海峡附近的溃退，标志着帝俄的整个溃退。战争彻底失败了。

沙皇政府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屈辱的和约。根据朴茨茅斯和约（1905年九月），日本侵占了朝鲜，从俄国夺取了旅顺口、库页岛南部，并与俄国签订了关于在俄国领海内捕鱼租借权的极端不利的条约。由于这次战争，日本也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借此它封锁了俄国通向西方的公海的出口，并且建立了对自己有利的地位，蓄意夺取俄国的远东。

由于自己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落后以及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依赖地位，帝俄在日俄战争中遭到了失败。

专制制度，封建农奴制关系的存在——这一切不

能不阻碍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能不束缚了俄国劳动人民的精神力量。

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中，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愤怒和抗议越来越强烈了。

日俄战争不是俄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战争。它是帝国主义政府之间的战争。在这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中，遭受失败的不是俄国人民，他们不要这种战争，并且知道它对于俄国的害处。在这次战争中，遭受失败的是沙皇专制政体。一旦人民不得不为了专制政体的政策而付出自己的鲜血时，这个政体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利益之不相容，与全体人民的利益之不相容，就暴露无遗了。

俄国军队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失败，在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沉痛的回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的苏联军队忠实于同盟国的义务，在歼灭了欧洲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希特勒德国以后，又在满洲给予日本关东军以致命的打击，迫使它投降。英勇的苏联军队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东方的世界侵略势力策源地，给祖国收回了它原有的俄罗斯土地——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由于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结束导致的完整的我国远东边界，服务于和平事业，并保卫邻国的国家主权。

日俄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一个问题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当时应该怎样对待这次战争呢？

如果说孟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在内，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就是说，保卫“祖国”、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末布尔什维克则相反地对这次战争采取了尖锐的否定立场。

沙皇制度违反工农群众的利益而进行了战争。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证明，俄国正处于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前夜，这种革命必须要消灭沙皇专制制度，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广泛而公开的斗争扫清道路。

沙皇政府指望战争帮助它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帮助它巩固自己动摇的政治地位，从而防止国内革命的爆发。但是它的指望落空了。战争的失败不能不大大地影响到国内的政治局势。前线的失败，国内经济情况的恶化，使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了沙皇制度的腐败。广大的人民群众对沙皇制度的憎恨与日俱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面前摆着一个任务——把人民群众对沙皇政府的政策的自发不满情绪转变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自觉的有组织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对待日俄战争的彻底的国际主义态度，（下转第23页）

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輯 (五)

关于基輔公國的封建分裂

耿淡如 黃瑞章 譯注

十一——十二世紀，基輔公國的封建關係已經達到高度的發展，但與此俱來的是：封建割據、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和外族的侵襲。這些現象，原是封建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後果，而基輔公國在所說時期里表現得特別顯著。因此，到了十三世紀初蒙古人西侵的時候，俄羅斯再也沒有抵抗的力量而被征服了。下引各項文件，說明基輔在蒙古人西侵以前的國內分裂混亂情況。

文件(Ⅰ)說明1068年基輔起義的經過。當時，俄羅斯由於諸侯內訌，國勢衰弱，波洛佛茨人時常侵襲，劫走人民，擄去牲畜，使基輔國內雞犬不寧。諸侯王公不能協力御敵，而勞動人民雖有抵抗敵人的決心，但公侯們害怕民眾起義，拒絕給予武器。在這樣的情況下波洛佛茨人得在基輔境內橫行無忌。1068年的基輔起義反映民眾對統治公侯的仇恨，也說明了公侯們對鎮壓起義之血腥手段。

文件(Ⅱ)說明1093和1096年波洛佛茨人兩次侵襲基輔的實況。俄羅斯公侯偷生怕死，不能抵抗敵人，臨陣逃脫，使老百姓被俘受苦，使瑰麗寺院化為灰燼，使繁華城市變為廢墟。由此可見：當時基輔勞動人民，已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文件(Ⅲ)、(Ⅳ)說明在波洛佛茨人侵襲的嚴重危機下，公侯們也召集過會議，企圖捐棄嫌隙，共抗敵人。1093年柳別契城大會上，公侯們信誓旦旦，要團結御侮，保衛領地；1103年多洛布湖大會上，雖然有人還想退縮，而公侯們大多協力出征，打敗波洛佛茨人，贏得了勝利。從這兩個文件看來，基輔公侯們只要能夠團結起來，就可戰勝敵人。但是，由於封建分裂的關係，這種團結是一時的，偶然的，而不是持久的，常規的。最足使人痛心的，是他們之間，為了自己間的內訌，常有乞援波洛佛茨人以對抗自己的勁敵者。甚至英明王公莫諾瑪赫也不能例外〔見文件(Ⅴ)〕。

文件(Ⅴ)摘錄基輔公莫諾瑪赫的“訓子篇”，說明國內封建分裂和外禍的嚴重性，同時也反映出他對這種局勢的頑強鬥爭。他是一位基輔公國的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在任基輔公的時期(1113—1125年)，他力圖統一國內，消除外患。他風塵僕僕，東征西討，單就大出征而言，就有八十三次，和波洛佛茨人簽訂的和約有十九次。但是，他所作的努力畢竟不能挽救基輔公國已開始了的瓦解局面，主要原因是：在高度封建化的封建社會里，由於自然經濟占着統治地位，基輔國內各地之間缺少密切的經濟聯繫。“訓子篇”不僅反映出基輔國內的混亂，也反映出莫諾瑪赫的生活的嚴肅和緊張。他企圖以自己所經歷的實例來昭示子孫。——譯者

(Ⅰ) 1068年的基輔起義(節錄“往年故事”，按照“拉夫連季抄本”)

本文件以及下面文件摘自“俄羅斯編年史”。它是屬於基輔時期的最重要的史書。遺留下來的編年史有兩種抄本：

“拉夫連季抄本”和“伊巴特抄本”。“拉夫連季抄本”是由蘇茲達爾的僧侶拉夫連季於1377年抄寫和修纂而成的，內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往年故事”。原文是用古體俄語寫的；下面各文件是從現代俄語譯文譯出的。——譯者

1068年有很多外地人——波洛佛茨人①侵入俄羅斯境內。伊茲雅斯拉夫、斯維托斯拉夫和佛塞伏洛得②率兵往阿里特河抵抗他們，在夜里敵我互相廝殺。由於我們的罪孽，上帝放出異教徒來進攻我們：俄羅斯公侯臨陣逃脫，波洛佛茨人贏得了勝利……

伊茲雅斯拉夫和佛塞伏洛得回基輔城，斯維托斯拉夫逃到契爾尼戈夫。當時，基輔各地民眾奔赴基輔城，在“廣場”上③召開民眾大會，向公侯們說：

“波洛佛茨人流竄我國境內，公侯們，請發給武器和馬匹；我們願再和他們一決雌雄。”伊茲雅斯拉夫置諸不理。民眾開始發言反對基輔市長科斯拿奇克，馬上離開會場，往“山區”④走，到達科斯拿奇克的邸宅，但沒有找到他。他們停留在布拉契斯拉夫⑤的邸宅，宣布：“往牢獄去，釋放自己的同志吧。”他們分成兩隊。其中一半向牢獄走去，(另)一半走過橋，來到公侯的邸宅。伊茲雅斯拉夫同自己的親兵坐在幕帳里。民眾開始和公侯爭辯。他們站在下邊，公侯從小窗內探望，親兵侍立在公侯的周圍。那時，楚丁的弟兄吐基⑥向伊茲雅斯拉夫說：“公侯，您看，民眾怎樣呼號奔走；叫人去看管佛塞斯拉夫⑦吧。”

① 屬突厥族，住在黑海北岸草原上的游牧部族。——譯者

② 三人是賢王雅羅斯拉夫之子，分任基輔、契爾尼戈夫、彼勒雅斯拉夫的公侯。

③ 指基輔城內進行貿易的廣場。——譯者

④ 指基輔城內公侯和貴族的住宅區。

⑤ 波洛茨克的公侯，佛塞斯拉夫的父亲。

⑥ 基輔的貴族。

⑦ 波洛茨克的公侯，在這個時候是伊茲雅斯拉夫的俘虜，被禁錮在獄中。

正在他說完了這句話的時候，其他一隊去開釋囚犯的群眾從牢監那邊走過來了。一個親兵向公侯說：“他所提的辦法是不好的。叫人往佛塞斯拉夫那邊；誘騙他靠到小窗口，然後把他一劍殺了，豈不好嗎？”公侯也不予理睬。那時，群眾一邊大聲叫嚷，一邊朝向佛塞斯拉夫所在的牢房湧去。伊茲雅斯拉夫見勢不佳，就同佛塞伏洛得一起從邸宅逃出。九月十五日民衆從獄中引出佛塞斯拉夫，並使他住在公侯的邸宅里。同時，他們劫掠了公侯的邸宅，所得金銀貨幣，不可勝數。伊茲雅斯拉夫逃往波蘭人那里……佛塞斯拉夫駐在基輔城……

1069年伊茲雅斯拉夫和波列斯拉夫（波蘭國王）^①同來進攻佛塞斯拉夫。佛塞斯拉夫出去抵抗（他們）。他走到貝爾戈羅特^②，在夜里他瞞着基輔人，從那里逃到波洛茨克去了。翌晨，民衆發覺佛塞斯拉夫已經潛逃，乃返基輔城，召開民衆大會，並派使往謁斯維托斯拉夫和佛塞伏洛得說：“我們行為不好；曾驅逐自己的公侯；現在他率領波蘭人來進攻我們了；請進入父祖的城市吧；如果你們不願的話，那末我們將不得不焚燒自己的城市，而逃往希臘境內去了。”

斯維托斯拉夫告訴他們說：“我們將往我們的弟兄那邊；如果他真的用波蘭人來攻擊你們，毀滅你們，那末我們就不客氣以戰爭來對付他；決不容許他來毀滅自己父祖的城市；如果他願意和平的話，那末，讓他帶少數親兵入城。”基輔人遂安心下來。

斯維托斯拉夫和佛塞伏洛得派人去告訴伊茲雅斯拉夫說：“佛塞斯拉夫已經逃走；不要帶領波蘭人返基輔，現在您沒有敵人了；如果您逞一時之憤而要破壞城市，那末須知，我們是愛惜父祖遺傳下來的基業的。”听了這話，伊茲雅斯拉夫留下波蘭隊伍，只帶了少數波蘭人和波列斯拉夫同行。他派了他的兒子姆斯提斯拉夫先往基輔城。姆斯提斯拉夫一到基輔城，就把那些釋放佛塞斯拉夫的七十多人砍成肉塊，其餘的人被挖去眼睛，還有很多未經查明而無辜被殺的人。

在伊茲雅斯拉夫進城的時候，民衆俯首來迎；基輔人承認他是自己的公侯。五月二日伊茲雅斯拉夫坐上了公侯位置。他為了給養問題解放了波蘭人，而民衆偷偷地把他們殺死。波列斯拉夫回到波蘭自己的領土去了。伊茲雅斯拉夫把“廣場”遷到“山區”，還把佛塞斯拉夫逐出波洛茨克。于是他派遣自己的兒子姆斯提斯拉夫進駐在那里。

（譯自列比德夫等編：“蘇聯史文獻”卷一，莫斯科，1949年，頁70—71。）

（Ⅱ）1093和1096年波洛佛茨人的侵襲

節（錄“往年故事”，按照“拉夫連季抄本”，聖彼得堡，1910年。）

在這個時候（1093年）波洛佛茨人侵入俄羅斯領土；他們聽到佛塞伏洛得逝世消息，就派使者到斯維托波爾克^③那里去談和。斯維托波爾克沒有同他父親的老臣和伯父商量過，和（自圖洛夫）同來的人會談後，就把使者拘捕起來，囚禁在木棚中。波洛佛茨人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開戰。波洛佛茨人大批湧來，包圍了托爾契斯克城……

斯維托波爾克、佛拉基米爾和羅斯提斯拉夫準備好應戰的親兵，就分三路進兵：斯維托波爾克從右翼，佛拉基米爾從左翼，羅斯提斯拉夫從中路前進。他們繞過特里波爾，並穿越了堡壘^④。就在這裡波洛佛茨人開始攻擊俄羅斯人；射手站在前面。我們站在堡壘之間，舉起我們的軍旗，射手從堡壘旁邊前進。波洛佛茨人迫近堡壘，舉起他們的軍旗，首先猛攻斯維托波爾克，並摧毀了他的軍隊。斯維托波爾克還堅持着，而兵士抵不住（敵人）軍隊的進攻拔腳逃竄，後來斯維托波爾克也逃了……佛拉基米爾和羅斯提斯拉夫也都逃了……

以實瑪利^⑤的狡猾的兒子們前來燒毀村莊和糧倉，燒毀很多教堂。大家不要奇怪吧，哪里造孽多，哪里就要遭受各種懲罰……〔意即上帝的懲罰，參閱文件（Ⅰ）第一段。——譯者〕

他們犯罪，我們受罰，他們干多少，我們遭殃多少；所有的城市已變荒蕪，鄉村已變荒蕪；我們所經過的草原原是成群的馬、牛、羊吃草的地方，而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都是一片荒涼景象；雜草叢生，野獸棲息……

波洛佛茨人破壞了很多地方之後，回攻托爾契斯克城。城中居民苦於飢餓，向敵人投降。波洛佛茨人佔領了城市之後，燒毀了它，瓜分了它的居民，把他們帶到了自己的住所，送給了自己的親屬。基督教徒受苦深重；憂傷悲憤，苦惱不堪，由於飢寒口渴，他們面龐瘦黑，軀體虛弱。他們陷落在不知名的地方，衣衫破碎，而赤着的腳被荊棘刺得鮮血淋漓；他們語不成聲地彼此含淚相問答，一個說：“我是某某城人”，另一個說：“我是某某村人”——他們就是這

① 波蘭國王是伊茲雅斯拉夫的岳父。

② 基輔城的郊區。

③ 斯維托波爾克·伊茲雅斯拉維奇，賢王雅羅斯拉夫之孫。

④ 指邊境堡壘。

⑤ 有預言以實瑪利者說，“彼將與世界為敵而世界亦將與彼為敵”，見聖經創世紀第十六章第十二節。這裡指波洛佛茨人。——譯者

样地含泪谈话，长嘘短叹地谈着自己的家乡……

这个月（1096年七月）的二十号，星期五，早晨一点钟，博尼亚克^①，那个目无上帝的污穢的强盗，第二次偷偷地突襲基輔，波洛佛茨人刚刚进入城市，他们就放火烧毁了沿河地区，又折向寺院，烧毁了斯志法諾寺院和格尔瑪諾夫村庄。

（波洛佛茨人）来到彼契尔斯基寺院的时候，正是我們晨禱之后在禪房里休息；他們在寺院周圍叫嚷着，并在寺院大門上挂起兩幅軍旗；我們向寺院后面奔逃，另有一部分人躲藏在唱歌队座位間。不信上帝的以实瑪利的兒子們砸开寺院的大門，分散在禪房一帶，打开房門，搬走禪房里所有的东西，然后放火烧毁我們聖母的殿堂，还轉向教堂，先燒了南边那个門，然后燒了北边那个門，又爬上費奧多西亞坟墓上的大門，破坏了聖像……那时“紅院”已經燒了起来，它是由信仰正教的大公建造在一个名叫維多貝契的崗丘上的，該死的波洛佛茨人把它全部化为灰燼。

（同上書，頁75—76。）

（Ⅲ）1097年柳別契城大会（节录“往年故事”，按照“拉夫連季抄本”，聖彼得堡，1910年。）

1097年斯維托波尔克、佛拉基米尔、达維得·伊戈列維奇、瓦西尔科·罗斯提斯拉維奇、达維得·斯維托斯拉維奇以及他的兄弟奧列格，聚会于柳別契城，共謀和平。諸王公們互相說道：“为什么我們要彼此傾軋，使俄罗斯国土淪陷呢？波洛佛茨人蹂躪我們的疆土，正以我們之間的自相殘杀而高兴起来。今后我們要齐心协力，捍衛俄罗斯疆土，讓每个人各保自己的世襲領地：斯維托波尔克保守基輔和伊茲雅斯拉夫（世襲領地），佛拉基米尔保守佛塞伏洛克，达維得、奧列格和雅罗斯拉夫保守斯維托斯拉夫，同时佛塞伏洛得給各人分配了所守衛的城市：达維得守佛拉基米尔城，罗斯提斯拉維奇守彼列米什利·伏洛达尔城，瓦西尔科守捷列博弗利城。”并且在會議上他們吻着十字架，宣誓說：“如果今后誰反对誰，那末，我們將以全力对付他，神其鑒諸。”大家說：“讓上帝和整个国家都来对付他。”宣誓后，各自回去……

（同上書，頁76—77。）

（Ⅳ）多洛布湖大会和出征波洛佛茨人（节录“往年故事”，按照“拉夫連季抄本”，聖彼得堡，1910年。）

1103年俄罗斯王公斯維托波尔克和佛拉基米尔受到上帝的啓示，他們集合在多洛布湖开会。斯維托波尔克和佛拉基米尔各自帶着自己的亲兵，共坐于一个

大帳篷里。斯維托波尔克的亲兵首先想到說：“現在，春天出征是不适合的，这將伤害农民和他們的耕地。”佛拉基米尔說：“亲兵們，我很奇怪，你們只舍不得农民用以耕田的馬匹，而为什么不想当农民开始耕田的时候，波洛佛茨人一来用箭射死他，夺去他的馬匹，繼而进入村中劫走他的妻室兒女和全部财产呢？你們憐惜他的馬，却不憐惜他本人嗎？”斯維托波尔克的亲兵无言对答。斯維托波尔克說：“我这兒已經准备好了”，边說边站了起来。佛拉基米尔对他說：“弟兄，这就是你为俄罗斯国家所做的巨大好事。”他們派人去告訴奧列格和达維得說：“生也好，死也好，要去出征波洛佛茨人。”达維得听从，而奧列格不愿意去，借口說：“我身体不健康。”佛拉基米尔吻別了自己的兄弟，就到波勒雅斯拉夫去，斯維托波尔克、达維得·斯維托斯拉維奇、达維得·佛塞斯拉維奇和姆斯提斯拉夫（伊戈尔的孙子）、維雅契斯拉夫、雅罗波尔維奇、雅罗波克、佛拉基米罗維奇都跟着同去。他們騎馬或乘船到了石灘以下，在河中霍爾提茨島上稍作停留，乃离船登陸，有时乘馬，有时徒步，在草原上走了四天，到了苏敦^②。波洛佛茨人听到俄罗斯人出征，就聚集了无数的人开始商議。烏魯索巴^③說：“我們向俄罗斯人請和吧；他們所以要坚决和我們作战，是因为我們使俄罗斯土地蒙受很多灾难。”

但是最年輕的小伙子向烏魯索巴說：“如果你怕俄罗斯人，那我們可不怕；我們打敗他們之后就可往他們的土地上去，占取他們的城市；誰能從我們手里把他們拯救出呢？”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公侯們和戰士們全体向上帝禱告，他們有的用蜜飯，有的用对穷人的舍施，有的用对寺院的捐款，以求上帝和聖母的保佑。

當他們这样地祈禱时，波洛佛茨人来了，并派出他們中以勇敢出名的阿尔圖諾普充当先鋒。俄罗斯公侯們也派出了自己的先鋒队。俄罗斯先鋒队伏击了阿尔圖諾普，包围了他，打死了他以及他的队伍；連一个也沒跑掉，全部被歼灭，涌来的队伍好像松树林一样，不可能看得清楚。俄罗斯人猛扑它們。波洛佛茨人看到俄罗斯人的进攻，就在俄罗斯軍隊前面紛乱地逃走了。我們追赶他們，斬杀他們。四月四日那一天，借上帝的偉大佑助，我們打敗敌人，贏得了巨大胜利。当时我們打死了（波洛佛茨人）軍隊中的二十个公侯……，而且生擒了別尔裘茲……还擄获了許多牲畜：綿羊、馬匹和駱駝，許多帳篷以及战利品和奴

① 波洛佛茨人的“汗”。

② 波洛佛茨人的城市。

③ 波洛佛茨人的“汗”。

僕。又擒获了许多别切涅克人和多洛克人连同他们的营帐。俄罗斯人带着很多俘掳，满载荣誉和取得伟大胜利而返国。（同上书，页78—79。）

（V）弗拉基米尔·莫诺玛赫的“训子篇”

（本节录见“编年史拉夫连季抄本”。）

論公侯的行为

居家勿懶惰，应察看一切：勿依靠管事，也勿依靠侍从，使客人对你们的管理家务不致有所譏笑。出外作战的时候，勿懶惰，勿依靠將領，勿溺沉于飲食和睡眠；应亲自指派哨兵；夜間在周圍各地派定守兵后，然后就寢，而起床应早。切勿輕率卸下自己身上的武器：疏忽了，就有人会突然来行刺。謹防撒謊，狂飲和淫乱，因为这些事情对于身心均有損害。在巡視自己的領地的时候，切勿容許自己的或別人的侍从在村庄或田野里为非作惡，使人家不致咒罵你們。在你們路过的地方，在你們停留的地方，应賜給食品于穷人；更应尊重客人，不問来自何方，不問平民或貴族或使节；如果不可能給予礼物，也应給予食品和飲料；因为他們在旅行时，会到处說人家的好話，也会說人家的坏話。

切勿忘記了上面的話；应常常唸着——对我是無所謂，而对你們是有好处的。你們所知道的好东西，不要忘記，而不知道的东西，就应该去學習；这就是我的父亲在家里能掌握了五國語言的方法，也正是他获得別的国家尊重的原因。懶惰是一切（坏事）的根源；已知的东西，忘了，而不知道的东西，也不去學習了。

論公侯的混战和征伐

我的孩子們，現在我告訴你們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十三年以来我怎样努力进行征伐和打猎。起先我通过維亞提奇族的（領土）到羅斯托夫——父亲派我到那里，而他自己往庫爾斯克去；后来，他和G·斯科尔达第克同到斯摩棱斯克；他又和伊茲雅斯拉夫同往布列斯特，而派遣我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我往弗拉基米尔（沃尔斯克）。同一冬季，弟兄們派我到那火燒过的布列斯特遺址去，在那里我保护了他們的城市……。于是斯維托斯拉夫派我抵抗波蘭佬，我越过格洛哥夫抵达契沙森林，我在这些地方来来去去約有四个月……。从那里我到圖罗夫，春天我到彼勒雅斯拉夫尔，还到过圖罗夫。当时斯維托斯拉夫逝世，我去斯摩棱斯克，同一冬天从斯摩棱斯克到諾夫哥羅得；春季到格勒布去支援，而夏季和父亲同在波洛茨克，而下一冬季我和斯維托波尔克同在波洛茨克，而波洛茨克已被燒毀；他（斯維托波尔克）到諾夫哥羅得去，而我在奧得列斯克和波洛茨克人作战，从那里我赴契尔尼戈夫……。我又从斯摩棱斯克，边战边进，穿过波洛茨克人的军队来到彼勒雅斯拉夫尔，而碰到

从出征回来的父亲。同一年，我和父亲以及伊茲雅斯拉夫同往契尔尼戈夫攻打博里斯（維雅契斯拉維奇），并战胜了博里斯和奧列格。我們再到彼勒雅斯拉夫尔，停留在奧布罗夫，而佛塞斯拉夫焚燒了斯摩棱斯克；我会同契尔尼戈夫人在后追逐他，換了一头馬，但在斯摩棱斯克沒有把（佛塞斯拉夫）捉住；在路上追逐佛塞斯拉夫的时候，我破坏了經過的地方，破坏了从盧哥姆尔到洛戈捷斯克一帶地；从那里，我去攻打德魯茨克，也从那里（回到）契尔尼戈夫。那个冬季，波洛茨克人破坏了全部斯大罗杜布城，我同契尔尼戈夫人和波洛茨克人一起前行，在捷斯納河畔我們捉住阿卡杜克和薩烏克兩位侯爵，并歼灭了他們的亲兵；次日在“新城”那边，我們驅散了貝尔卡根的有力部队；夺来了刀劍和全部俘虜。我在維雅提奇过了两个冬季——在霍多特以及在他的兒子那边……。在同一年里，我逐出波洛茨克人于霍洛尔之外；他們曾侵占戈罗兴。同一秋季，我們和契尔尼戈夫人、波洛茨克人、赤底也維奇人同往明斯克；占領了城市，在那里既不留下僕役，也不留下牲口。

所有的大出征計有八十三次，而其余的小出征現已記不清了。我和波洛茨克公侯簽訂过十九次和約，包括父亲时代和我自己时代的和約；我把自己的很多牲畜和服裝賜給了他們，并釋放了波洛茨克貴族公侯：謝魯坎二弟兄，巴何巴尔索夫三弟兄，奧佛青四弟兄，而所有其他公侯被釋放的共計一百人。另一方面，上帝使我們活捉住的公侯有：科尔苏斯和他的兒子、阿克蘭·蒲尔契維奇、塔列夫斯克公侯阿士古魯以及其他著名的年輕战士十五人，我生擒了这些人，把他們杀死，并投入斯拉佛里亞河里；那个时候我还逐漸屠杀了約二百个貴族。

論公侯的狩猎

下面就是我的狩猎工作，这是我在契尔尼戈夫所做的事情：在森林里我用手把每十头或二十头活的野馬联系在一起，此外，經過羅斯河畔时，也赤手捕捉过野馬。两头野牛曾把我連人帶馬扔在角上。一只鹿曾單用角抵触过我，兩只麋曾單用脚踐踏过我，而另一只麋以角来抵触过我，野猪曾冲掉了挂在我腰上的劍，狗熊曾撕碎我膝盖上的鞍褥，猛獸跳到我的腰部，把我連馬一起撞倒地上。可是上帝保佑，我完全无恙。一次我曾从馬上倒下，兩次曾跌伤了我的头顱，在青年时代我的手脚都受了伤，它們之所以受伤，因为我既不貪生怕死，也不憐惜我的头顱。我的侍从所該做的事情，我亲自去做；不論在战争和狩猎里，夜里和白天里，盛暑和严寒里，我从未稍事休息。我既不依靠地方長官，也不依靠傳令吏；我亲自去做應該做的事情：使家內的秩序全由自己去佈置；我亲自保持狩猎队伍，（亲自照管）馬夫以及雛鷹和老鷹。（同上书，頁81—83。）

教 学 问 题

关于历史課貫徹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問題

湖北省教育厅教研室历史組

历史課有它的教养和教育的意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从課堂教学來說，教养和教育是作为一个統一的完整的教学任务来实现的。所謂一堂好的历史課，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在于使学生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識的同时，还使学生受到一定的教育。毫无疑义，历史教学的教养和教育任务的統一，是从兩者內在的本質联系而言的，它是从属于教育方針任务和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的；而且兩者的統一，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来体现它。关于这一点，不独教育理論和历史教学大綱上已給我們教师以明确的啓示，就在我們教师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也都有了一定的認識；但是，不可否認，我們有些教师曾經把教养和教育的統一看作簡單的同一，因而強調把历史知識講清楚就算教育了学生，就算完成了任务，不了解或者不去考虑历史教学中的教育任务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現了以教养任务来代替教育任务——實質上是取消教育任务的傾向。为了克服这一傾向，以便在历史課中更好地貫徹思想政治教育，我們應該进一步認識教养和教育任务的“統一”畢竟不是“同一”，兩者在統一之中还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举一个簡單的例子來說，講授世界近代史上的普法战争，关于这次战争的原因、經過以及兩個阶段的战争性質轉变等的闡述，基本上属于教养任务；而在闡明这些具体内容的同时，引导学生認識无产階級在不同性質的战争面前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積極参加和支持正义的自衛的战争，坚决反对侵略战争，并讓学生領会无产階級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样使学生从思想政治上受到一次階級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就是講授普法战争这一課題的教育任务。很显然，教养和教育作为課堂教

学的兩個方面的任务來說，兩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而有它們之間的相对独立性。但在教学过程中，兩者却是統一进行、同时体现的；即以上述普法战争为例，要想完成其教养与教育的任务，教师必須以明确的无产階級的立場、观点来講述战争的原因和經過，分析其性質。具体說，在講授这些历史事实时，教师必須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必須貫穿当时在馬克思領導下的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兩次宣言的精神，用以揭露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分析这次战争的兩個阶段的性質轉变，以及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群众随着战争发生和战争性質轉变所采取的态度等等。这样，学生就既能掌握普法战争的原因、經過和战争性質等历史知識，而在掌握这些知識的同时，由于認識到战争的真正原因、战争性質的轉变，以及无产階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过程中，与資产階級所持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是抗敌爱国，一个是叛国投降）等，自然也就会受到一場深刻、生动的階級教育、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由此可見，在教学过程中，教养任务与教育任务是統一进行、同时体现的，是血肉相連而不可分割的。因此，我們說，教养和教育任务有其相对独立性，但是在統一的过程中来实现的。那种認為先进行知識教育、后进行思想教育，將教养与教育割裂，或以教养代替教育，將教养与教育混同起来的看法和作法，都是不对的，都不能真正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二

从历史課的特点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应该成为历史課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內容。我們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事实本身所內涵的，它貫串在全部历史課程的各个單元和各个課題当中，我們在历史教学中，不論講授有关經濟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历史

教材，都不能也不應該脫離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來教育學生。也只有這樣，依據教材向學生進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才能逐步形成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這也是歷史教學大綱的一個基本要求。

歷史唯物主義的涵義相當廣泛，它可以包括一切，但是不能代替一切。因為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包含的方面固多，而最後所要解決的卻是世界觀這樣一個根本性質的問題，它需要隨中學歷史課的全部進程來逐步形成、逐步鞏固。其它像勞動教育、階級教育、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品德教育等等，雖然與培養學生共產主義世界觀是分不開的，而且它們也必須符合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的要求，但是，勞動教育、階級教育、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品德教育等等，仍各有它們自身的教育意義，也都是歷史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

如果說，由於歷史課全部教材的各個章節都有着歷史唯物主義教育的因素，因而每個課時的教學毫無例外地要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那麼貫徹勞動教育、階級教育、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品德教育等等，就要依據不同章節的教材來確定，看哪一方面的教育因素比較顯著，教育內容比較豐富，就着重貫徹哪一方面的教育，用不着課課等量齊觀。比如說，我們講到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要突出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講到歷史上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要明確統治階級用以統治廣大人民的實質；講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創造和發明，講反侵略的對外戰爭，就需要把一些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民族英雄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艱苦奮鬥精神和英勇事跡突現出來，以激發和培養學生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這些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也是教材本身所含有的深刻的教育因素。因此，在歷史課貫徹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掌握不同教材的不同教育因素，而不應該囫圇吞棗。也只有這樣，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才是切合歷史教材的，才能收到可以預期的教育效果。

以上所述，我們可以歸結到這樣幾點：

（一）歷史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是豐富的多方面的，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是一個基本內容，這不僅因為歷史課的教學任務如此，它也完全符合歷史事件和歷史教材本身的要求，因此，我們在課堂教學中要隨時意識到這一點用來教育學生。

（二）在不同章節的歷史教材中，有不同的教育因素，如勞動教育、階級教育、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品德教育等方面的因素，我們應當依據不同教材來確定一個課題或一個課時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

（三）歷史課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主要取決於

教材本身；任何脫離教材單凭主觀願望的作法，都是不妥的，都難于獲得一定的教育效果。

三

聯繫實際是各科教學，也是歷史教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對歷史課貫徹思想政治教育來說，這一原則顯得尤其重要。

我們知道，人類的全部歷史是有規律地發展着的，同時歷史的發展是曲折複雜而又互相關聯着的；如果我們孤立地講授歷史，就不可能真正闡明歷史現象，揭露它的本質。正因為如此，在教學中對歷史事件要按照它的規律性和關聯性來注意多方面的聯繫，這一點在貫徹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來看是很有意義的。還有，我們歷史教師的一個主要任務，是要教導學生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道路上和方向，只有通過具體史實讓學生認識人類從哪里來和怎樣來，將走向哪里去和怎樣去，明確歷史發展的規律和方向，才能更好地啟發和鼓舞學生積極獻身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而這正需要我們教師運用聯繫實際的原則來貫徹思想政治教育。歷史教學必須為當前的政治鬥爭和生產建設服務，這就賦予聯繫實際貫徹思想政治教育以更現實的意義。

那麼，歷史教學聯繫實際的目的是什麼呢？我們認為聯繫實際的目的，一般的在於幫助學生更深刻地理解歷史事實本身，更好地認識歷史發展的規律，從而受到更深刻的教育，以堅定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治方向。至於在具体教材的講授中，聯繫實際應有它更為明確具体的目的，要解決什麼問題，使學生受到什麼教育，都要充分考慮。總之，聯繫實際貫徹思想政治教育應該是有目的的；如果缺乏明確的目的性，聯繫實際就將打亂教材系統，徒然增加頭緒，教育效果也會是不好的。我們在教學中出現過為聯繫實際而聯繫實際的現象，正是由於不明確聯繫實際的目的性的結果。

這裡應該明確指出：聯繫實際的原則，不只是運用於教學方法的問題，也是直接有關教學內容的問題。我們根據聯繫實際的目的，先要考慮聯繫什麼，然後再考慮怎樣聯繫。所要聯繫的內容和教材內容不能分開，而且從廣義來說應該把它構成教材的有機部分，那種把聯繫實際視為單純方法問題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其結果將導致我們脫離教材，忽視內容，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流於形式。

至於從哪些方面聯繫實際，以及應該怎樣聯繫實際，在目前還沒有一致的看法，也缺乏比較成熟的經驗。不過，一般說來，聯繫實際大体上可分兩個方

而，一是联系学生实际，一是联系社会现实。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联系社会现实（或称联系现实）在于通过历史教学以当前的政治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实际来教育学生。联系学生实际，在实质上也就是联系社会现实，因为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说，所谓学生实际，主要的是指学生的思想实际（当然也包括了学生的生活实际和知识实际），而它正是社会现实的集中反映。我們把它提出来作为联系实际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不仅为了要大力改变过去存在的无的放矢的现象，因而强调联系学生思想认识的实际来教育学生；而且还因为学生的思想实际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我們教师有必要掌握学生思想的主流，并分析其本质，通过教学来加强教育，使历史教学更好地为当前政治斗争和生产建设服务。

联系实际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问题还在于我們如何依据教材内容进行联系才能恰当。对待这个问题的作法是很多的，通常有下列两种：

一种是同性质的事件相联系。比如講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这一段历史时，联系到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这样联系也是完全应该的。同性质的事件相联系，从教学方法上来看属于“类比法”，也正如瓦庚在“苏联中学高年级历史教师的备课”中所说的，是“从相同的史料中引伸出来”的一种联系。

另一种是不同性质的事件相联系，比如講古代雅典奴隶主的民主或講近代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联系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又比如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联系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些联系都要指出事件的本质差异，加里宁在“論共产主义教育”中所说，“把已往事物来与现今的实际情形相比拟，并说明过去与现今事物间的区别”，就是这种不同性质的事件的联系。在教学方法上一般叫作“对比法”。

在联系实际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还有下列两点值得注意：

（一）联系实际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围绕历史教材的中心和教材内在突出的思想教育因素来考虑，看它和哪一方面的现实生活相联系最能说明问题教育学生，尽量避免离开教材中心另立一套或泛泛联系实际的作法。因此，有必要在课前充分准备联系什么及如何联系，并把它纳入课题计划或课时计划中去，所谓凭灵感来联系实际，终不免在课堂教学中犯错误。

（二）联系实际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尽可能具体，但这不等于说要用大量材料或费很多的语言来联系实际，主要的是在讲授时对教材中的历史事件

或历史现象作好必要的分析，分析得愈具体愈深入，就愈有助于联系社会现实，也愈有助于比较精煉地把所要联系的内容明确起来。我們教师常说，貫徹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用“画龙点睛”的办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任何一种办法都不可一概而论，不能說比较精煉地联系实际就是唯一的好办法，好的办法总是从具体教材和具体情况出发的。比如說，講郑成功的事迹时，把台湾的前前后后作比较系統而簡明的叙述，用以說明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对于教育学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們不能說这样講是多了。又比如講明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有一教师考虑到劳动教育特别是向学生进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教育很为迫切，因此对于明初的农业生产为什么能够恢复和发展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而其中强调說明农民的艰苦创造和辛勤劳动是明初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并指出沒有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就沒有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发展等等。教师并没有用一言半語提到要学生認識农业生产的重要，要学生热爱农民或要学生在将来积极自觉参加农业劳动，但是我們从这一堂课的思想性和教育效果来看仍然是比较好的。

四

历史课堂教学方法，为了达到不同的教养和教育的目的，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們不准备一一論列，只想就课堂教学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談講授方法的两个要素，一是講授的邏輯性，一是講授的感染性。

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合乎唯物辯証法則，这是客观存在，不以人們的意志为轉移。通过课堂教学，联系实际来教育学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按照史实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邏輯进行講授，我們通常所說的课堂教学要講清楚，講透徹，讓学生不仅知道“是什么”，而且懂得“为什么”，这对貫徹思想政治教育來說，要求亦复如此。而这也就需要我們教师的講授具有严密的邏輯性。也只有这样循循善誘、以理服人，学生所受的教育才可能是比較深刻和牢固的。比如說，元的統治和元末农民战争，就是适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們知道，在元朝統治时期，中国人民遭到蒙古貴族和蒙汉地主官僚的殘酷剝削和压迫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中国人民的反元斗争，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中，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終元之世，大小无虑千百次，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構成元朝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民起义与元的統治相始終，而元末匯集的农民战争洪

流，最后結束了元的統治。在講授這個問題時，必須用具体史實說明當時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相互交織在一起，一方面指出民族壓迫的嚴重，一方面揭露民族壓迫的實質是階級壓迫，民族壓迫愈嚴重，愈加深了階級壓迫，而階級壓迫愈深，愈突出了民族壓迫的嚴重。整個元朝統治時期的歷史，正是如此。當然，我們也要讓學生知道，在元的統治下，民族壓迫之所以嚴重，主要由於蒙古部族當時正處在由落后的經濟制度向初期的封建制度開始轉化的階段，給他們本身帶來了掠奪性，而且隨着私有制的发展，又大大的刺激了他們的統治階級進行瘋狂的掠奪。這樣，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相與俱來，中國各族人民的反元鬥爭也就愈演愈烈，而廣大農民的起義和農民戰爭，就成為反元鬥爭的主流。我們在講授中，如果不把元朝統治時期的民族鬥爭放在一定的地位，就將無從說明除了蒙漢地主官僚以外，其他各族、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廣泛的反元鬥爭。同樣，如果不從民族鬥爭分析到階級鬥爭，就無法使學生認識元朝統治的實質和元末農民戰爭的歷史意義。以上只是粗略地說明這一課題所具有的嚴密的邏輯性，在講授中應如實反映出來。毛主席教導我們，對於一切事物，“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別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別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別的原因，或特別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由上面的一個例子看來，這個原理是完全可以運用於講授歷史事件的。從這裡我們還可以認識到，講授的邏輯性是與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正確地領會和掌握教材有直接聯系的，而不單純是方法問題。

歷史是廣大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在過去漫長的历史時期中，勞動人民進行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出現過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跡。我們為了教育學生，就應該把一些重大事跡，生動地，有感情地展示在學生面前。也就是說，讓有血有肉的历史重現在課堂教學之中，使學生有所感受、有所激動，知道愛什麼，也知道恨什麼。這樣不僅在幫助學生的感性認識上有作用，而且思想政治教育可收潛移默化之功。比如說，講北宋時的金軍南侵，我們如果平鋪直叙地講几件史實，用來分別說明北宋一小撮統治者的屈辱退讓，賣國投降，應受到历史的譴責，為萬世唾罵，以及北宋廣大軍民和愛國將領的英勇頑強抗擊金軍，值得我們景仰，這樣講固然不錯，但教育作用可以估計是不大的。我們應該考慮，按照北宋末金軍先後兩次大規模的南侵，在講授時讓學生跟着形勢的發展，把思維引向這一历史環境中，正當金軍蠢蠢欲動，企圖大舉南侵時，北宋最高統治者徽宗聞風讓位欽宗而遠

避其鋒，金軍第一次南下包圍開封時，北宋的腐朽政權即已接受賣國投降條件，所謂割三鎮納幣及人質等，并曾罷去為相的主戰派李綱，北宋軍民和其他愛國者面臨大敵當前，自始即主張堅決抗金，在金軍第一次南下時，各地又軍風起雲湧，阻擊金軍，在開封還出現過大學生陳東等赴宮闕上書，和人民歡呼李綱復職，各路援軍也接踵而至，在這種形勢下，金軍被迫撤除包圍北走。金軍一走徽宗又重返汴京仍以太上皇自居，未料金軍卷土重來，再度包圍開封，這時北宋以太上皇和皇帝為首的投降派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却信所謂神兵，卒至城破，兩帝被擄而去。在金軍兩次南侵中，太原軍民的保衛戰，一直堅持了二百五十多天，最后全部壯烈犧牲。只要我們把上述這些有血有肉的具体史實能夠生動地，有感情地講出來，就可以揭示北宋軍民和愛國將領的英勇頑強的反侵略的鬥爭精神，同時也使北宋朝廷投降派的丑惡無耻暴露無遺。只有這樣，通過學生認識北宋統治者和廣大人民在民族鬥爭中截然不同的態度，是非愛憎之心油然而生，從而使學生受到一次階級教育和傳統的反侵略的愛國主義教育，因此，我們認為講授的感染性，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這裡還必須指出講授的感染性並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看我們教師自己对教材的感受如何。如果我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和历史事實的是非愛憎有了共鳴，那么在講授時，我們自身就會處在历史環境中，也才可能把學生帶到历史環境中，使他們受到感染，受到教育。所謂“教育者必須先受教育”，由上述這一點看來，確實是顛扑不破的真理。

历史講授的邏輯性主要導源于教材本身的邏輯性，它和講授的感染性，往往相互為用，彼此不能分開；特別是感染性，如果不合乎邏輯，必然缺乏力量；又，講授的邏輯性，與干巴巴的經院式的教學毫無共同之處；講授的感染性，也與矯揉造作或庸俗說笑不能同日而語。此外，我們也不要由於考慮講授的邏輯性或感染性而把历史課與政治課或文學課等同起來。所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五

历史課貫徹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必須具有鮮明的正確的立場和觀點。這是勿待多言的。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從現階段的教學情況看，有一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要防止和克服在教學中的客觀主義態度。不能設想，客觀主義的教學如何能夠貫徹思想政治教育，而事實是自覺不自覺地以客觀主義態度對待历史，却又往往容易出現。舉一個例說，講唐和亞洲

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一课题，七至八世纪唐帝国是亚洲各国，特别是亚洲东部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帝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在当时世界的最前列。这是历史事实，无论从当时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情况，从唐帝国经济文化繁荣的本身，还是从唐帝国对中亚、对印度、对新罗、对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来讲，都是无可辩驳的。以这样一段教材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的确再恰当不过。可是有的教师由于对民族自豪感和大国主义思想的本质区别认识不足，害怕这样讲可能助长学生的大国主义思想，因而对于这一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的教材，讲来显得软弱无力，这就使自己所采取的态度不自觉地成为客观主义的。

列宁在揭露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本质时，曾对客观主义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教导我们要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客观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78—379页）当然，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一脉相通，其本质是相同的，同为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因此，我们在防止和克服教学中的客观主义的，同时必须注意纠正主观主义的教学。

我们还应该认识，要完成历史课的思想教育的任务，正如瓦庚在“苏联中学高年级历史教师的备课”中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思想面貌，他对史实的党性态度，……以及他本人世界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所达到的深刻性和彻底性”。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教师的教学思想观点愈明确，思想教育的效果也就愈显著，而这正需要我们历史教学工作者相互勉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

× × ×

历史课贯彻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是目前改进历史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首要问题。这一问题有它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我们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按实际情况从多方面来探讨，来研究，来改进。只有这样，历史教学质量才可能获得有效的提高，才可能真正完成历史课的教养教育任务，也才可能使历史教学

更好地为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历史课堂教学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作法，是否正确和恰当，既系于我们教师的思想观点，系于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如何，也直接关联到我们教师对教材科学性、思想性的钻研和领会的程度如何，只要我们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思想工作者，担当着共产主义教育任务，只要我们经常认真地深入钻研和领会教材内容，并考虑如何依据教材内容联系实际，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教养和教育，那么，历史课贯彻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就能够基本上得到解决。

当然，历史课堂教学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只是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历史课的课外活动方面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值得我们今后注意。

最后，我们想以凯洛夫院士答教师报记者问中的一段话，录供参考。他说：“政治思想教育首先应在课堂教学中贯彻，这一点必须加以肯定。这就是要求教师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教材，从事物发展过程中来解释各种现象，通过教材的讲解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热爱自由和劳动，遵守纪律等。”又说：“但不是所有的科目都能完成或在相同程度上完成上述任务，例如历史和文学更有利于完成上述任务，地理中的一部分教材也如此。而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关键，是教师能够按照唯物主义观点来讲解教材，紧紧抓住教材和生活的联系。同时，还应该指出国家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用正确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发展的事实。”（见1957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师报”）

更正

（一）本刊1957年十月号第19页右栏第四行的“1882年”应为“1893年”；第22页左栏第六行的“王翰”应为“陈熾”。

（二）本刊1957年十二月号目录上“叶玉华”的“叶”误排为“叫”。

在历史課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几点体会

湖南长沙四中历史教研组

历史課本來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目前正当祖国社会主义事業飞躍发展，迫切需要学校輸送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劳动者参加建設的时候，我們历史教育工作者更有責任在教学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我組同志在这方面努力做了一些工作，由于理論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限制，成績还不很显著，甚至有許多缺点和錯誤，但我們很願意把如下一些膚淺的体会提出来，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指正。

（一）关于进行社会发展規律的教育

掌握历史知識并运用历史知識指导社会实践，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是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在历史教学中使学生認識社会发展的基本規律則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步驟。当然分析和說明社会发展的規律，必須根据历史課特点，也就是說要在按照年代的順序具体講述重要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但这只是进行社会发展規律教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們認為在課堂教学中，凡所講的史实与当前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具有內在联系，能体现社会发展規律的，或者从史实中总结出来的社会发展規律与当前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系的，都应该及时指出它們之間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逐步培养学生运用社会发展規律知識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生活的能力，使他們的認識發揮指导行动的作用。否則，学习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

例如，講高中世界近代現代史的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英国的对外侵略政策时，我們联系了当时正在发生的英法侵略埃及的战争，目的是使学生認識教材所講是埃及人民受英法侵略压迫的开始，而今天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抵抗侵略的斗争，則是要爭取結束这一罪恶的血腥的統治，实现完全独立。同时也指出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事情，前者是資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力量还相当强大的时代，而今天則是社会主义日益兴旺，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漲和資本主义面临总崩潰的时代了，目的是使学生进一步認識埃及人民必然胜利和英法侵略者必然失敗的发展前途。

再如，講初中世界历史的东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以軍事侵略方式进攻西欧的日耳曼国家，企圖重建古代羅馬帝国时，指出当时西欧日耳曼族各国的封建制度正在发展，而查士丁尼想恢复羅馬帝国的奴隶制度是違反社会发展規律的，所以人民的起义終於粉碎了查士丁尼的反动政策，而东羅馬本身后来也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二）关于联系党的方針政策，闡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进行社会发展規律的教育，使学生明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现实生活中重大事件的本質，划清敌我界限，提高認識，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但要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还必须联系党对各項工作的方針政策和目前随祖国社会主义革命事業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各種制度向学生进行教育。当然，这种教育需要在講清教材科学内容的基础上进行。

例如，在講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課中的1942—1943年党的整風运动时，就結合了党在当前进行的整風运动。我們在課堂上就以旧知識为基础，首先提問学生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领导和后来的“左”傾机会主义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什么重大損失，接着要学生指出他們对中国革命問題的認識为何都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然后教师总结指出他們都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而沒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其錯誤思想的根源就是主觀主义。在講完新課后，教师就进而联系目前党为什么号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觀主义，指出这次整風运动的重大意义。

又例如在講高中中国历史的东汉时期的边境各族时，我們首先从兩方面闡明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一方面指出我們祖国經濟文化的发展是各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結晶，边境的土地是瑤人、滇人、哀牢人、羌人等用血汗开发的；另一方面指出我国各族人民有共同的革命斗争傳統，在反抗統治階級压迫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的血液是流在一起的。然后根据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決議的精神，联系今天党和国家对少

数民族问题的政策，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对待民族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根本不同，我们强调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反对民族压迫和互相歧视。我们相信各族人民的爱国积极性，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努力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共同的繁荣、进步。对妨碍互相团结共同进步的错误思想倾向——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要进行批判和斗争，要彻底消灭剥削阶级统治时期所残余的坏影响。这样联系，会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学生思想中残存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三）关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为培养学生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还必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我们认为进行这方面教育时，首先要注意教育的内容必须符合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其次内容要具体生动，能够从思想感情上感染学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学生起提高认识指导行动的作用。

例如，在高中二年级，讲到司马迁和祖冲之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方面所创造的伟大成就时，正好是党提出我国科学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之后，学校行政也在校会上对学生提出“学生应具有崇高理想，要有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学习的伟大抱负”的号召，我们就结合党和学校的号召，除指出司马迁和祖冲之的刻苦钻研辛勤劳动的精神外，并着重指出青年一代生长在今天这样幸福的时代里，学习和研究的条件又比前人优越得多，只要我们有他们那样学习和钻研的精神，是一定能够完成党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同时，也指出不应该把向科学进军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对立起来，那种只埋头学习科学知识而不重视政治的思想是错误的。

又如在初二讲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的斗争时，我们首先用谈话方式使学生从历史事实里认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然后导入新课讲述台湾军民英勇壮烈地反抗日本侵占台湾的斗争史实。在讲解过程中结合现实提问学生关于台湾的现状和我们支援解放台湾应有的责任，最后教师扼要地小结，并鼓舞学生以努力锻炼自己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行动来支援解放台湾的斗争。

在高三讲到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志愿空军为支援我国抗日战争而英勇牺牲的事例时，学生深受感动。我

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及时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党的八次代表大会，指出有几十个国家的兄弟党都派代表出席大会的事实。这一事实一方面可以说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都把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作自己的胜利，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坚强的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保证。

在讲授世界近代现代史中1848年匈牙利革命被沙皇俄国出兵镇压时，我们就指出这是国际剥削阶级的狼狈为奸，同时联系最近苏联人民不惜牺牲生命地出兵援助匈牙利人民把反革命暴乱镇压下去，而保卫住了匈牙利的革命胜利果实的事实，并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两个事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认为上面所述的例子是有现实意义的，对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也有很大帮助。

（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注意的事项

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应注意下列几点：

（1）必须根据历史课的特点和教材的科学内容，否则就会产生牵强附会和空洞无物的毛病，而不能在教养的基础上达到教育的目的。

（2）要根据教材联系现实。因为我们历史教学的任务不仅是叙述史实说明世界的过去，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把学习历史所提高的思想认识运用于现实生活中，成为改造世界的动力。

（3）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历史课思想内容丰富，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地方很多，若不选择适当时间和典型史实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很容易顾此失彼减低教育质量。当然强调计划性，并不是要机械地执行，还必须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所提出的要求。

（4）不仅要防止抽象空洞和牵强附会，也需要克服孤立片面的毛病。因为历史现象非常复杂，有主流的和本质的，也有次要的和派生的，内部是有有机联系的，必须细致分析和缜密组织才能使学生的知识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进行联系对比时，必须注意各事件的社会条件，阶级本质及其本身的特征，否则容易使学生理解错误。

（5）必须适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文化水平，对政治思想教育的要求应该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扩大而相应地有计划地提高起来，否则必然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我們搜集和运用乡土历史材料的点滴收穫

浙江黄岩中学历史教研组

加里宁說：“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認識自己故乡开始的。”在历史教学中，引用乡土历史材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会获得很好的效果的。我們最近才开始重視这项工作，曾搜集到和运用了一些材料，下面簡單地談談我們在这方面的点滴收穫。

（一）在义和团运动发生以前，自1862年开始，北起河北、山东，南到福建、台湾，内地包括四川、贵州等省，到处都普遍地发生了反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的外国教会和傳教士的斗争，黄岩县也曾发生激烈的斗争。当我们講到中国近代史义和团运动一章时，就曾介紹了1899年黄岩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压迫的斗争事迹。这些事迹的材料，是我們訪問本校的老年教师和海門的一位魏老先生的談話中搜集到的。

黄岩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压迫斗争的經過是这样的：天主教势力进入黄岩以后，外国教会傳教士就在这里横行不法。如海門天主堂神父法国人李思聰为表示威風，出入乘四人大轎，轎夫戴着清朝官員的紅纓帽。至于霸占田产、包攬詞訟等为非作歹的事情，更是不胜枚举。外国教会和傳教士的这些活动，激起了人民的强烈憎惡和反对。四甲应地方有个流氓阮小本，入教后做了当地教堂的“坐堂先生”，在1899年，他假借教会势力强占了一个寡妇的养老田，迫使这个孤苦的寡妇无以为生。这件事，激怒了当地的人民群众，他們在一位果敢有为富于斗争精神的領袖应万德領導之下，赶跑了阮小本，并挖掉了他的眼睛以示懲罰。海門天主堂神甫为了支持阮小本，就請清朝政府派出大兵捉拿应万德，但政府軍隊被当地人民用土槍土炮打散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队伍也愈来愈扩大。海門天主堂知道依靠武力不能取胜，就采取分化的卑劣手段，用金錢收买了一个叛徒。由于叛徒的出卖，应万德被捕了。清政府和教堂囑于人民力量的强大，不敢把应万德公开关在牢獄里，而把他秘密地囚禁在海門江上的一艘兵船上。人民群众知道应万德被捕以后，每人手持一支香向清政府請願，要求釋放应万德。从四甲应到海門二、三十里長的路上，排滿了請願的队伍。清政府官吏和外国傳教士是一鼻孔出气的，他們为杀害应万德制造借口，竟不惜捏造事实，把人民一人一支香的請願事件，向他們的上級谎报为

“一人一支槍”的劫獄行动，并在一个夜晚杀害了应万德。黄岩人民轟轟烈烈的反对外国教会压迫的斗争失败了，可是斗争的光輝事迹却永远長存在人民的記憶里，黄岩人民还唱出了一首長詩来紀念它。

通过这一事件的介紹，使学生比較深刻地認識了外国教会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的本質，进一步認識当时全国各地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广泛性和正义性，为理解这一节教材提供了生动的事例。

（二）明朝从初期到中叶，倭寇的侵擾是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的最大禍患之一，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产事業带来了很大的損害。浙江省是倭寇活动的主要地区，我們所在的黄岩县就是經常受到他們騷擾的地方。当我们講到明朝抗倭斗争的时候，曾引用了一些乡土历史材料。

我們翻閱了县志，上面說，明朝洪武、永乐年間，倭寇屢次騷擾楚門、楓浦，嘉靖年間，更猖獗到几乎每年都要侵擾黄岩、溫嶺一帶地方。为了防御倭寇的侵略，人們在当时曾从海門到黄岩，每隔十里建筑一个烽火台，台的遺迹一直保存到今天。我們講課时，引用了上述的材料，并在課外帶領学生參觀了烽火台的遺迹。学生在參觀烽火台遺迹时，兴致很高，并摹仿臆想中的当时放烽火的情景收拾枯枝野草在台上放起烽火来。我們又訪問了当地的老前輩，搜集到一些材料，知道在黄岩下梁有梁七、梁八兩兄弟。他倆在倭寇入侵时，曾團結全村人民，用搗臼柄、扁担作武器，歼灭了一股倭寇。在他們居住的地方，有一条河流，直到現在人們还怀着紀念的心情管它叫做“絕倭瀝”。我們也訪問了黄岩洪家場附近的“倭塚”并拍了照片。相傳这个地方是抗倭英雄戚繼光歼灭倭寇的地点。这一帶有一个流傳至今的神話般的故事，故事說当倭寇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陣大風，竹林里的竹叶紛紛飄墜下来，变成一口口鋒利的宝劍，砍下了許多倭寇的头顱，“倭塚”就是埋葬这些倭寇屍体的地方。我們在課堂上把照片和这些抗倭斗争的英雄事迹介紹給学生，大大地丰富了教学內容，引起了学生學習历史的兴趣，增強了他們愛祖國愛家乡的情感。

（三）元末农民大起义是 （下轉第31頁右欄）



問：北德意志联邦成立的年代究竟是 1866 年还是 1867 年？（福建 吳各周）

答：北德意志联邦成立的正确年代是 1867 年。北德意志联邦是在普鲁士控制下由美因河以北德意志諸邦組成的。存

在時間是从 1867 至 1871 年。在 1866 年的普奥战争（亦名“七星期战争”）结束后，普鲁士乘着得胜的机会，于 1866 年九月二十日下令并吞了四个在战争中曾經支持过奥地利的德意志邦（法蘭克福自由城，納薩公国，黑森——卡斯尔侯国，汉諾威王国），因之普鲁士的領土增加了兩万七千余平方英里，人口約增加了五百万，擴張后的普鲁士占除奥地利外的全德意志領土和人口的三分之二。

其余在美因河以北的未被普鲁士直接并吞的二十一个德意志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于 1867 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柏林开始举行立宪會議，討論在会前各邦代表所起草的联邦宪法，經過討論，最后通过。联邦宪法遂于七月一日正式施行。

在美因河以南的德意志四邦（巴伐利亞王国、瓦登堡王国、巴登大公国、黑森——达尔斯他特大公国）沒有加入北德意志联邦。普法战争期間，在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麦代表北德意志联邦于 1870 年十一月間跟美因河以南的德意志四邦訂立了联合的条約。1871 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国的凡尔赛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南部四邦才正式加入了帝国。（暢）

問：普魯士在德意志帝国中的領導地位表現在哪些方面？（广州 梁 英）

答：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中的領導地位可以从下列几方面观察：

（1）德意志的統一运动是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的。在統一后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中，普鲁士自然会占着特殊的重要地位。

在統一德意志这一問題上，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最强大的德意志邦国发生过長期的領權。1815 年維也納會議上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邦的主席是奥地利，所以德意志諸邦的領導权是属于奥地利的。德意志联邦虽然在 1866 年普奥战争后正式解散，但是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的領導权是非常薄弱的，設在法蘭克福的联邦議會的作用也不大。实际上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經濟和政治的影响与日俱增，在領導德意志諸邦間

題上，要与奥地利分庭抗礼。1834 年普鲁士倡議“关稅同盟”，当年加入“关稅同盟”的邦国共有十七个（計普鲁士），后又增加至二十三个。这一經濟联合的措施增長了普鲁士成为領導核心的作用。无怪在 1849 年法蘭克福議會起草帝国宪法后，竟邀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利赫·威廉四世作帝国的世襲皇帝。当时普王惧怕国内外革命运动的发展，又惧怕奥地利的反对，才謝絕帝位。1848——1849 年革命运动失败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德意志諸邦領導权上的角逐有增无已。至 1862 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总理后，普鲁士即加紧备战，准备通过武力手段，打倒它的敌手——奥地利。

普奥战争后，普鲁士扩大自己的版圖，并强迫奥地利解散德意志联邦；次年，成立了北德意志联邦，取得美因河以北德意志諸邦的領導权。

普法战争期間，于 1871 年一月解散了北德意志联邦，吸收美因河以南的德意志四邦，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实际上这就等于把北德意志联邦加以扩大。

德意志的統一是在普鲁士通过兼并、通过战争由上而下地完成的，所以在統一后的帝国中普鲁士便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

（2）普鲁士的領導地位由帝国宪法中最容易看出。普鲁士在帝国的特殊地位由法律条文确定下来。

依据宪法，普鲁士国王是帝国的世襲皇帝。他操縱着帝国軍政大权，身任海陆軍司令，有权任免高級官吏，有权宣布战争和議和。

帝国宰相由皇帝任命，直接向皇帝負責，通常由普鲁士內閣总理兼任。帝国宰相兼任上議院的主席，在上議院中代表普鲁士投票。他不仅是普鲁士国王在帝国事务中的代办者，而且成为普鲁士与帝国間的联系人物。在普鲁士和帝国中，他有权提出法令草案，有权任命行政官員，有权公布和实施政府的法令。

在上議院中，普鲁士代表有十七票投票权，其余各邦最多者有六票，最少者有一票。关于补充宪法以及有关修改稅务、海軍、陆軍等議案，若有十四票反对，即不得通过，换言之，在这类議案上，普鲁士有絕對否決权。

就宪法条文言，联邦是不容破坏的。帝国政府不能由联邦驅除任何邦，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联合，也不能重新划分邦界。总之，帝国政府必須保持联邦的現狀。同时，加入联邦的各邦也无权实行分离，无权变更在联邦中所承担的义务。假如某邦違背其所承担的义务或拒絕承認帝国的权力，在上議院贊同下，皇帝可以动員联邦的軍队，进行征伐。

（3）在軍事上，普鲁士也控制着特殊重要的权

力。宪法规定，帝国的军队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必须服从帝国的法令，并由皇帝直接统辖。通过条约方式，普鲁士允许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瓦登堡三邦可以维持地方军队。其余二十一邦的军队训练和召集权，通过帝国政府，操縱在普鲁士手中。

(4) 在帝国中，普鲁士的人口和领土面积与其他二十四邦相较最为庞大（见附表）。普鲁士的人口和领土面积均占帝国的三分之二。这也会增强普鲁士在帝国事务中的作用。

附表：

德意志帝国的各邦	面积 (平方哩)	人口 (1910)	各邦在上议院 投票权的票数	各邦在下议院的 代表数
普鲁士王国	134,616	40,165,219	17	236
巴伐利亚王国	29,292	6,887,291	6	48
萨克森王国	5,789	4,806,661	4	23
瓦登堡王国	7,534	2,437,574	4	17
巴登大公国	5,823	2,142,833	3	14
黑森大公国	2,966	1,282,051	3	9
麦克稜堡——什温大公国	5,068	639,958	2	6
萨克森 (萨斯——威玛) 大公国	1,397	417,149	1	3
麦克稜堡——斯特利兹大公国	1,131	106,442	1	1
奥尔登堡大公国	2,482	483,042	1	3
不伦瑞克公国	1,418	494,339	2	3
萨斯——美宁根公国	953	278,762	1	2
萨斯——阿尔吞堡公国	511	216,128	1	1
萨斯——考堡——哥得公国	764	257,177	1	2
安哈特公国	888	331,128	1	2
什瓦兹堡——桑德斯豪森侯国	333	89,917	1	1
什瓦兹堡——路道尔斯德特侯国	363	100,702	1	1
瓦尔达克侯国	433	61,707	1	1
瑞斯侯国 (长系)	122	72,769	1	1
瑞斯侯国 (幼系)	319	152,752	1	1
绍堡——利普侯国	131	46,652	1	1
利普侯国	469	150,937	1	1
卢贝克自由市	115	116,599	1	1
不莱梅自由市	99	299,526	1	1
汉堡自由市	160	1,014,664	1	3
亚尔萨斯——洛林皇家领地	5,604	1,874,014	3 (1911年后)	15
总 计	208,780	64,925,993	61 (1911年前为58)	397

(如)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 (三十八)

南北朝的雕塑艺术



圖一 南朝女俑

江苏南京幕府山南朝墓葬出土陶俑。采自“陶俑”。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 (三十八)

南北朝的雕塑藝術



圖二 北魏塑佛像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保存大量的北魏塑像，在中國藝術史上有重要的價值。采自“麥積山石窟”。

